

# 目录 Contents

总第18期  
湖北钱币专刊

## 钱币学研究

### 03 王禹偁谢御书钱表与两宋样钱

王纪洁

### 06 几张清代汉口民间石印钱票

——罕见汉口钱庄纸币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 11 从出土与传世钱考察张献忠铸币

王伧阎

### 15 蒙阴县钱票

李天聪 李银

## 货币史研究

### 19 一枚见证了武则天政治试水的钱币

王永生

### 21 我对太平天国黄金货币的认识过程

——兼及认识历史上货币的若干方法问题

赵德馨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湖北省优秀期刊

# 武汉金融

W U H A N F I N A N C E

主 编 李 斌

副 主 编 童展鹏

执行副主编 陈 波

主 任 高文丽

值 班 主 任 熊 源

广告部主任 吴俊伟

法 律 顾 问 瞿森垓

技 术 编 辑 邓雅娜 胡松林 蒿倩文

#### 本刊声明

■ 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征集稿件,刊发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

■ 本刊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网站有合作,作者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如无特别声明,均视为同意接受以上网站的数字传播与发行。

■ 本刊版权属《武汉金融》杂志社所有,其他媒体转载本刊文章,须注明“摘自《武汉金融》”字样,否则即侵权。

■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文责自负。

#### ■ 本期封面图片:

湖北汉镇利生厚记钱号票(左图)

湖北汉镇衡康隆钱号票(中图)

湖北汉镇义元钱庄票(右图)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武汉金融》杂志社

本刊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王 信  
主 任 王玉玲  
编 委  
邓 红 文行赤 王 浩 王恭敬  
叶圣利 白 凯 卢祎萍 冯鹏熙  
刘方明 刘元瑞 刘志高 刘秉文  
许 伟 朱渝杭 邹 飞 张小春  
张中尧 张 奎 张瑞怀 李少民  
李 民 李亚华 李秉恒 吴少新  
杨 伟 陈任武 陈金焱 陈婉青  
陈新民 宋清华 汪 博 周诚君  
单增建 胡世财 段银弟 徐小建  
徐长生 徐晓华 郭 伟 唐华建  
陶建全 黄旭东 黄 宪 黄 鹤  
谭梦湘 魏 超

出版单位：《武汉金融》编辑部  
发行单位：武汉长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354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593/F  
封面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钟鸣天理事  
印刷单位：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许可证号：4201004001161  
增刊备案号：421593202001  
每册定价：23.00 元  
编辑部电话：(027)87327462  
发行部电话：(027)87327153  
广告部电话：(027)87327290  
本刊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69号  
邮 编：430071  
投稿平台：<http://yhqy.cbpt.cnki.net>

29 元代对纸币的管理制度、治理措施及启示

苏利德

33 三国时期钱币铸行及通货膨胀成因探究

雷玉宁 胡永峰 丁安国

36 清末铜元滥铸与物价波动

田牛

泉海杂谈

42 晚清安徽首笔地方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刘杰

48 简述中国古代与现代钱币上的传统民俗文化

骆宏漠 骆事畴 骆衡雁

56 古钱币上的崇龟习俗

叶真铭

62 从底纹看纸币

郑悦

# 王禹偁谢御书钱表与两宋样钱

■ 王纪洁

(中国钱币博物馆)

## 一、前言

“样钱”作为钱币学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是金属铸币母钱翻砂工艺的产物,泛指翻铸普通流通子钱的样本、范本或样板。在我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变更年号,为宣誓政权,大部分都要更铸本朝新钱。铸造新式钱币,必须由中央或地方钱监(钱局)首先铸造出一些“样钱”,目的是向下一级铸钱机构颁发或供上级机构审核。

由于文献资料记载的匮乏和钱币实物界定标准的不统一,我们很难对样钱的型制有一个客观的描述,现在可以见到并能准确判断出为样钱的主要还是清代钱币。

北宋名臣王禹偁曾写过《谢赐御书字样钱表》和《为宰臣谢御书钱样表》。在这两份谢表中均提到“样钱”二字,本文主要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两宋时期一些史料,探讨两宋时期样钱的产生和用途,以期为钱币学界同仁对样钱的判断和研究提供帮助。

## 二、王禹偁其人及谢表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在朝野为官二十余年,主要仕途在太宗一朝。此外,王禹偁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其主要成就是散文和诗歌,对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宋史·王禹偁传》称其,“词学敏赡”。南宋沈虞卿在《小畜集原序》中说,“其文简易醇质,得古作者之体”。司马光对其评价很高,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说到“王公以文章独步当世”。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因文采出众开始受到太宗宠爱,授其右拾遗、直史馆,并赐其绯衣、文犀等物。王禹偁虽在仕途上大起大落,但对太宗的抬爱之情、知遇之恩,不盛感念,内心常怀谢恩之心。因勤奋好学,王禹偁一身著述颇丰,现存《小畜集》《小畜外集》共四十三卷,是研究其思想的直接资料。通

过阅读《谢赐御书字样钱表》,可以领略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底。

公元990年,宋太宗改元“淳化”,命钱监鼓铸“淳化元宝”钱,其用楷、行、草三体亲自书写钱文,中国历史上首枚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御书钱正式发行。宋太宗看到新出炉的“淳化元宝”三体钱,有感太平盛世、治理有方,遂将第一批样钱分赐给身边近臣。王禹偁当时任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书,位于近臣之列,故有幸领到了御书钱样。欣喜之余,为表达对皇恩浩大的感激之情,他遂提笔而作《谢赐御书字样钱表》。全文如下:

“臣某等,今月二十三日于学士院分赐得御书三般字样‘淳化元宝’钱者。洪炉新样,通行将遍于万方;御笔摘华,神妙互分于八体。颁宣非次,传习知荣。

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留意货泉,精心笔札。书纪年之大号,用焕钱神。逞上圣之多才,爰彰墨妙。尽返鹤迴鸾之法,掩天龙地马之名。庄山、厉山之金可齐重宝,开元、乾元之字莫比神踪。将大济于兆民。

仍分霑于两制,臣等名惭夷甫,才谢鲁褒。实赵囊而空荷君恩,探禹穴而难穷圣作。周太公之图法,自合包羞。欧率更之笔精,从兹扫地。永言感遇,空极兢荣,臣等无任云云。”<sup>[1]</sup>

同一时间同一件事,因当朝宰相政务缠身,无暇提笔撰写谢表,王禹偁还代替宰相草拟了一份《为宰臣谢御书钱样表》。全文如下:

“臣等伏蒙圣慈,赐御书三体字样钱各一贯文者。五铢新样,货泉将布于人间,三体成文,笔札互彰于天纵,出炉冶而首蒙颁赐,望冕旒而共积兢荣。

伏惟尊号皇帝陛下,道极至玄,学探众妙,宸居多暇,书九府之钱刀;御笔摘华,夺三辰之文彩。尽真草隶行之法,在方员肉好之中,通流将遍于溥天,固殊当百。锡赉先霑于近位,其数且千。臣等传玩为荣,收藏至宝,荷天光而悚惕,对圣作以兢惭,臣无任云云。”<sup>[1]</sup>

表是臣子向帝王上述陈情、谢贺、进献、庶政等所用的一种文体。《宋代官制辞典》记载,“凡官员升迁除授、滴降贬官,至于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等,均有谢表。”

王禹偁的这两份谢表因刻意奉承、取阅太宗,虽辞藻华美,但通篇充盈媚气,不乏夸大其词之处。但文章主要是描写王禹偁和宰相得到宋太宗赏赐的御书钱之事,故细读之余,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些和当时钱币生产相关的信息。

### 三、谢表折射出的铸币信息

以前钱币学者提及王禹偁的这两份谢表,多从宋太宗亲笔书写“淳化元宝”御书钱文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研究。在这里,本文主要从钱币铸造过程、钱币铸造工艺技术涉及到的“样钱”这一概念出发,论证相关概念。

《谢赐御书字样钱表》提到样钱,有一处:

“洪炉新样,通行将遍于万方。”

《为宰臣谢御书钱样表》提到样钱,有两处:

“赐御书三体字样钱各一贯文者”“五铢新样”。

这两份谢表折射出三条信息:第一,“洪炉新样”,表明样钱是铸造出来的。第二,这里的“新样”“样钱”,个人理解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初铸样钱这一概念。第三,王禹偁两份谢表名称不一,分别为样钱和钱样,但表述内容相同,故我们有理由断定在北宋时期“样钱”和“钱样”应是同一称谓。

王禹偁所处的北宋时期,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行业都有了显著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贸易显现出繁荣景象。宋太宗时期,全国共有六百八十六万余户,首都开封地区的人口达到十八万户。全国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到四百万贯<sup>[1]</sup>。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就达80万贯,以后逐年增加,铸钱额是唐朝的数倍。

北宋铜钱型制规整,孔方周围,字迹清晰,棱角分明,铜质致密,表面光洁,较之前代工艺水准有明显提高。从技术角度看,这是铸钱工艺步入规范化的结果。两宋时期,朝廷加强铸币管理,特设置专门机构——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对全国二十六处钱监进行有效管理。据史料记载,淳化元宝钱铸地有升州监、饶州监、鄂州监。为保证货币正常流通,朝廷统一铸币规格、型制、重量,制定钱币原料配比和铸造方式,各地钱监可以如法炮制。“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sup>[2]</sup>从法律角度进行保障,禁止私铸和伪造货币,

大严私铸之令,铸者依法加二等,私造交子者,罪以徒配<sup>[3]</sup>。这一时期,货币种类丰富,金属铸币与纸币并行,铸钱工艺是采用母钱翻砂技术。它以金属母钱为模,细砂为造型原料,不需要使用泥料<sup>[4]</sup>。

### 四、史料中样钱的记载

两宋时期,对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制造,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为保证产品质量,官府实行颁样和看验制度。铸造样钱目的在于使官府铸钱趋于规范化,杜绝恶钱及民间私铸钱。

颁样制度是由官府制订出各种产品的法式,颁布各种制成品的样品,以便工匠如法制造。颁样不仅使产品的质量有统一的标准,而且使产品的型制有统一的规格。

颁样制度即颁布制成品的样品——“元样”,有关手工业必须“如样制之”<sup>[5]</sup>。主要是为官营手工业生产提供标准,使工人制作各类产品时有据可依,如法制造。因铸钱涉及到国家民生大业,在管理上也极为严格,亦实行颁样制度。

钱监铸钱之后,在起运之前,还实行非常严格的看验制度,即依照元样式样检验铸造出来的钱币是否符合标准。为此,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了“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缙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及乌背,书画分明。”<sup>[6]</sup>此种当十崇宁钱,边侧整齐,曾经磨光,背肉乌黑,这是判断此类钱币铸造是否符合要求的参照品或标准器<sup>[7]</sup>。可以说,“赤仄乌背,书画分明”是此类样钱的基本特征。

看验制度是建立在记录、物勒工名和颁样制度基础上的检查制度。不同产品的检查方法各有差异,但至少有一个方法是相同的,即依样看验,一般是核点产品的数量,并对照样品检查产品的质量和规格。铸币生产亦是如此。

而且,为保证铸币质量,朝廷对各钱监铸造输纳至中央政府的钱币实行抽样检验制度。南宋宁宗责成编纂法令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其中卷三二《鼓铸》中规定了对铸币具体的检验程序:

“诸铸钱监所铸钱,每贯熟重四斤五两,转运提点铸钱司巡历所至,依样校验。”

“诸受纳新铸钱而粗怯不如样者,退换;若数多,即申所属。”

“诸钱监铸上供钱,并依元样,州差官看拣讫,方得起发,内抽取一贯,申纳尚书省。”

“若不如样者,申所属验实,据数发回元铸钱监验认,送所属究治。”

上述几条提到的“样”“元样”即指中央政府颁发给各地方钱监的、用于看检时的样钱。

母钱和样钱是母钱翻砂工艺的产物。两宋时期的母钱具体是什么样式、什么材质,目前我们还不甚了解,只在一些零星的史料中略有表述。如,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后续》卷六〇中,记载大观二年:

“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宋乔年)今勒崇宁东监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足。”

又如,《宋史·食货志》记载:

“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

故有学者认为,当时颁发给诸路钱监的母钱材质应为锡<sup>[9]</sup>。

大观年间,为限制劣币和私铸钱的流通,向百姓普及铸币型制,官府将官铸样钱张榜于肆。“……其令监司相度,以官钱为样,垂之市肆,告谕民户。有不如样,限一季投纳,以一偿五。限满不纳,加罪一等,仍以所纳钱更铸补还。出榜告谕,使众知之。”<sup>[10]</sup>将官铸样钱张榜于街头,这种榜文强化了国家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彰显了国家集中造币权的权威。

## 五、铸造样钱的目的

在我国古代社会,铸钱是一件大事。“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也……故钱必自官鼓铸。”<sup>[11]</sup>为保证铸币质量、维护铸币信用,才产生了样钱的概念。钱币质量的高低、金融秩序的好坏关系到民生大计。因此,制定铸钱标准,对铸钱质量的严格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

铸造样钱,主要是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整顿币制、统一规格。实行样钱查验制度,是货币政策内容之一。北宋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统一铸币规格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朝廷在货币发行方面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二是加强钱监内部管理。保质保量完成铸钱任务是国家头等大事,防止有人利用工作之便,损公肥私,暗地里铸造一些量轻质差的小钱。三是作为对钱监官员考核的主要依据。宋代对钱监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就是铸钱数额的高低以及质量的好坏,并把这两者量化成数个等级,作为奖惩的依据。四是杜绝恶钱,打击私铸。因为私铸破坏了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地位,私铸币与官铸币混乱流通,挑战了国家铸币的公信力。样钱的出台,使得百姓容易识别私铸币。

## 六、结语

综上所述,样钱是通过试铸造,经过批准而作为正式生产产品的标准,以确保铸币质量的一致性并以此对铸币质量进行检查,同时也用于对民间私铸钱币的鉴别。样钱按规定程序和手续分发各钱监存档,以备查验。

通过王禹偁草拟的《谢赐御书字样钱表》和《为宰臣谢御书钱样表》,结合《宋史》等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准确地断定:第一,北宋时期已有“样钱”这一概念;第二,样钱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第三,样钱是炉座铸造出来的;第四,样钱的型制特征与广泛流通的钱币一致;第五,样钱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检验钱监铸钱质量的好坏,即样钱是标准器。

清中期乾嘉学派往往注重对先秦古钱的收藏和研究,民国之后对宋钱的研究才开始重视起来。现在我们收藏和研究宋钱,对“母钱”“样钱”的界定,一定要有确凿的科学观点作依据,有足够的学术史料作支撑,有准确的工艺技术作标准,有可靠的考古发现作实证。■

### [参考文献]

- [1] 王禹偁.小畜集[M].卷二一.
- [2] 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J].保山学院学报,2015(1):77-81.
- [3] 马端临.文献通考[M].卷九.
- [4] 宋史[M].卷一八〇,一八一.
- [5] 周卫荣.中国传统铸钱工艺初探[A]/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 [6] 宋史[M].卷一九七.
- [7] 宋史[M].卷一八〇.
- [8] 屠燕治.南宋钱样考[J].中国钱币,2002(1):25-30.
- [9] 华觉明,张宏礼.宋代铸钱工艺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1):38-47.
- [10] 宋大诏令集[M].卷一八四.
- [11] 张方平.乐全集[M].二六卷.



# 几张清代汉口民间石印钱票

## ——罕见汉口钱庄纸币

■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湖北省钱币学会)

清代乾隆、嘉庆诸朝,由于商业贸易、市面流通及找零等需要,许多民间团体、商号甚至个人自行发行的钱票开始增多起来。这些民间钱票俗称私票、市票或花票等。咸丰朝以后,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连年战争,商业受阻,货币流通不畅,这些纸币的发行范围及数量逐渐扩大。到了光绪时期,形成民间钱票发行的又一个高潮。

光绪朝以前,这些民间钱票多为手写式或木刻板纸币。随着南方地区现代石印技术的发展,光绪中后期,石版印刷的民间钱票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步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历代政权更迭,多年地方战争及地方政府收缴销毁,清代民间钱票现已十分少见。

与邻省相比,光绪年间湖北汉口地区的现代印刷业出现较早,且比较发达。光绪末年时,汉口已成为国内南方地区印刷业的高度发达地区,也是民间钱票印刷业高度集中地区。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制的民间钱票,遍及湖北及湖南、江西、四川、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山西及陕西等省许多县市村镇。然而,所见大多是民国时期印制的,清代钱票颇为少见。

2009年2月,笔者在江南一位藏家处,集得三张十分罕见的清代汉口民间石印钱票,均为汉口当地钱庄所发行,分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利生厚记钱号”铜元壹佰枚票、“衡康隆钱号”铜元壹串文票和宣统年间(1909—1911年)的“义元钱庄”铜元壹佰枚票。该票图案精美,印制规范,票幅巨大,既是清代汉口钱庄票的典型代表,又能充分反映出当时汉口民间印刷业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其中,前两张,系首次面世,为新发现品种;后一张,所见仅二、三枚,都是颇为稀少而难得一见的湖北民间纸币。据说,该纸币来自国外,系最近回流之物。

为此,本文就此三张清代汉口钱庄票及其发行背景作简要分析与介绍。

### 一、繁荣的汉口钱庄业及其纸币的发行

汉口钱业,历史悠久。明季即有以钱为业者。

清初就有钱店制度。

乾隆、嘉庆时期,汉口地区的钱庄业已很发达。道光年间,仍然十分兴旺,银号、银炉、钱店有百余家。

道光三十年(1850年)出版的《汉口竹枝词》一书中就有多处谈及汉口钱庄业的繁盛情况:

“近日银号兑换无多,专持放票,店本六千至一万不等,放票或至十万余,利轻害重,非乾嘉时期比矣。”

“银铺生意一毫争,钱店尤居虱子名,本小利轻偏稳当,江西老表是钱精。钱店百有余家,惟江西人最得法。”

此段叙述,说明道光时期,汉口的银号以放款为主,而且其放款业务比乾隆、嘉庆时期更加兴隆。而钱店的业务以兑换为主,数额虽小,但经营十分稳妥。在一百余家钱店中,江西人经营最为精明。显然,道光时期,汉口钱业就以江西帮占主导地位。

同治末年,湖北地方政府在武昌和汉口分别设立了公济益官银钱号和协成、有成两家官银号,并开始大量发行银两票和制钱票。从此,汉口钱庄、银号群起仿效。光绪时期,湖北民间形成了发行钱票的又一个高潮。

这一情况,在民国时期的《湖北省金融》地方金融志中有所记载:

“咸、同时代,发生内乱,频年用兵,度支浩繁,令各省招商设立官银钱号,发行银票、钱票。提当杂各商生息帑银及库存之卯钱,拨交官银钱号,充票本。是时,湖北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于武昌;设立协成、有成两官银号于汉口,发行银票、钱票。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银票、钱票,政府不加干涉,为湖北发行纸币之滥觞。”

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由于汉口茶叶贸易遭受沉重损失,信用产生危机,大茶行多有倒闭,但许多小茶行快速发展起来。为了对这些小茶行融通资金,诸多小钱庄应运而生。此时,汉口及附近地区的小钱庄,多达500余家。

随着庄票的大量发行,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时,汉口地区因众多钱庄乱发钱票,致使钱价低贱,加之经营不善,三怡钱庄(即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家钱庄)因亏损款项达二百余万两而首先倒闭。其中户部银行被短欠十八万两,该行总办以事关公款,将契据抄送清政府道厅立案,并请追究查办。这一事件又牵连到诸多大小钱庄和行号,也因此相继关停或倒闭,并波及整个湖北省及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和地区。

三怡钱庄破产后,引起清政府对钱庄经营情况的注意。宣统元年,汉黄德道发布严禁钱庄商号乱发钱票的命令。宣统二年,度支部划一币制,咨行各省,所有民间钱票,一律限六个月收回。在湖北地方政府严格督办下,汉口各钱庄所发钱票大都收回,从此极少发现汉口钱庄再度发行钱票之事。

此外,历史上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宁汉之争以及湘鄂、川鄂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湖北地区。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清军火烧汉口三天三夜,将商店林立繁荣昌盛的汉口十里长街变成废墟,成百上千家商号、票号、钱庄及居民住家等房屋建筑被烧成灰烬。

汉口地区是清代票号、钱庄及商号高度集中的地区,也是发行手写钱票、木刻版钱票以及石印钱票最多的地区,此次大火使汉口商业和钱庄业损失惨重,其发行的各类清代民间钱票及其钞版也大部分被烧毁。加之,民国时期湖北历代地方政府多次更迭,又严加收缴与销毁,这些都是造成汉口地区民间钱票较为稀少的重要原因。

因此,所集得的这三张汉口钱庄票就成为光绪、宣统时期汉口钱庄票中的典型代表,颇为珍稀。

## 二、“利生厚记钱号”当十铜元壹佰枚票

“利生厚记”钱号当十铜元壹佰枚票,单色(黑色或红色)竖式石印钱票,宽98毫米,高230毫米(图1)。

钱票正面图案和文字,均为黑色。图案印制,特别庄重,

大气,精美。上部为一幅横式“双龙戏珠图”,其下有波涛海浪衬托,上印“龙家巷口”四字,即利生钱号所在地,汉口龙家巷口。

下方是一幅多层框格图,外层内,绘有一幅竖式“双龙戏珠图”,其下亦有波涛海浪加以衬托。

双龙戏珠,是两条龙戏耍(或抢夺)一颗火珠的表现形式。从汉代开始,双龙戏珠便成为一种吉祥喜庆的装饰图纹,多用于建筑彩画和高贵豪华的器皿装饰上。双龙的形制,多种多样,因画幅大小和形状而定。不管双龙是何种排列,火珠均在中间,显示出活泼生动的气势。双龙戏珠图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钱票上常常采用的典型图案。通常,多为竖式,此票有两幅双龙戏珠图,在民间钱票中较为少见。

内框空白处,上下分为两个。上格俗称天头,内印“利生厚记”四个篆书大字,即庄号名。下格俗称地格,其右侧为书写编号位置,其编号为“玉字第五壹号”,上盖“利生厚合和仙人”红色抬头章一枚和“利生”红色篆书骑缝章一枚(半边)。编号下,印“过细验明,谨防假票”常见说明文字;中部为书写面额



图1 湖北汉镇利生厚记钱号票正(背)面



处:“票发当十铜元壹佰枚整”,上盖方形“利生”和圆形“利生厚记”红色庄号名押款章;左侧系书写发行年月处,上有“光绪丁未年吉月吉日”诸字。其下,“票”字前,盖有一枚“利生”红色庄号名落地章。

光绪丁未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系该票的发行时间。由此可知,此票是一张行用票,俗称流通票。

钱票背面图案和文字,均为红色。上部为一幅人物图,其背景的房内陈设,颇为豪华,且十分讲究。下部为一幅多层框格图。其外层框格内绘制的是“神话故事图”,人物众多,形态逼真。其上端,表明庄号地址:汉镇龙家巷口。汉镇即汉口镇,当时隶属于汉阳县。

龙家巷,今仍在,分大龙家巷和小龙家巷两条街巷。大龙家巷位于汉口江汉区黄陂街西北侧,东南起黄陂街,西北接小龙家巷。清末成巷,巷道弯曲狭长,俗称扭子巷。民间有神话传说:昔有青龙从天而降,卧地成龙,龙头即大龙家巷,龙尾称小龙家巷。实际上,为早期居民龙姓居多而得名。

其内层框格中书写有一篇古文,其文字末端特别指明了印刷厂家:“汉臬回龙寺周仿古石印”。也就是说,此票为汉口镇回龙寺街“周仿古石印局”印制,此票是该石印局印制的民间钱票中最为精美的钱票之一。

回龙寺街,今仍在,称回龙巷,距龙家巷不远,位于汉口江汉区大兴路与民权路交汇处西北处,有四条巷道。清末成巷,昔日有回龙寺在此,故得名回龙巷。

中部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天头”内,印“利生钱号”四改大字,即钱号名。下格“地格”内,其内上下有两幅图案组成,上为“蝴蝶西瓜图案”,内印“厚记”二字,即钱号全称为“利生厚记钱号”;下为一幅

“花鸟图”,一只高冠长尾美丽大鸟,高卧枝头。

背面左上方有一枚圆形“利生钱号”红色骑缝章(半边),右侧下方,也有编号“玉字第五壹号”和一枚长方形“利生厚记钱号”红色篆书骑缝章(半边)。加上正面的一枚方形骑缝章,此票骑缝章共有三枚,均用作兑现时的凭证或依据之一,可见其校验措施的严密程度。

此外,票上还有一些流通时留下的书写文字和印章。

从背面整个图案布局来看,实际上是一张民间钱票的正面图案经稍加变化而成的。如果中部的图案改用文字,就能成为另一张正面钱票。

### 三、“衡康隆钱号”铜元壹串文票

“衡康隆”钱号铜元壹串文票,为单色(黑色或红色)竖式石印钱票,宽107毫米,高233毫米(图2)。

钱票正面图案和文字均为黑色。图案为长方形多层框格图,上框中是一幅“牡丹图”,朵朵牡丹花,竞相争艳;外框内上部,印有醒目文字:“汉镇蔡家巷



图2 湖北汉镇衡康隆钱号正(背)面



正街”，即商家地址。

蔡家巷，今仍在，有大、小蔡家巷两条街巷，位于汉口江汉区民权路与民生路之间，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起黄陂街，西北至花楼街。据《夏口县志》记载：此巷形成于清同治年间，以蔡姓居多而得名，有大、小蔡家巷之别。此处蔡家巷正街，即大蔡家巷。

外框内四周，绘制的是“二十四孝图”，图案清晰，人物刻画，精细传神，颇为精美。“二十四孝”反映的是我国古代儒家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孝道”是我国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为核心的敬老爱幼思想，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十四孝图”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钱票中常常选用的典型图案。

外框内的“二十四孝图”，自右侧上部起，顺时针方向分别是，虞舜孝感动天，仲由为亲负米，刘恒亲尝汤药，顺拾木椹供亲，闵损单衣顺母，郯子鹿乳奉亲，江革行佣供母，董永卖身葬父，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鲤，郭巨为母埋儿，黄香扇枕温席，老莱戏綵娱亲，孝昌弃官寻母，庭坚涤秽事亲，陆绩怀桔遗亲，杨香扼虎救父等十八幅孝道故事图。

内框中，书写的是一篇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治家格言》，文笔通俗易懂，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作者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江苏昆山三贤“朱柏庐、归有光、顾炎武”之一。

《治家格言》文字末尾，指出了印刷厂家：“汉镇汪日升书局石印”。

汪日升书局，地址在汉口洪益巷，是汉口稍有名气的印刷厂家。目前所见，该局印制的民间钱票有多种。

中部空白部分，天头内，有商号名“衡康隆”三个篆书大字，书法精美规范；地格中，右侧编号为“犹字第叁拾号”，其上盖有一枚“衡康钱号（篆书）”合和仙人抬头章。

中部为书写面额处：“憑票发铜元壹串文整”，其上盖有一枚“衡康钱号（楷书）”方形庄号押款章；

以上两处的“衡康钱号”抬头章和押款章，颇为重要，由此可证明，“衡康隆”商号是一家钱庄。

左侧系书写发行年月处，上有“光绪丁未年吉月

吉日”诸字。其下，“票”字前，盖有一枚“衡康”红色庄号名落地章。

由此可知，该票发行于光绪丁未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亦是一张行用票。“丁未”为印章所盖。

钱票背面图案和文字，均为红色。上部为一幅“帆船图”；下部是一幅主要有文字组成长方形框格图案。外框中，书写的是唐代大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也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钱票中常常节录的古代文学作品。

“豫章（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文字末尾注明：“时在癸巳莫春节录滕王阁序於海上”。

癸巳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莫春”指农历三月，这说明该票制版印刷时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至少说，该票背面的制版时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而此票的发行时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需要指出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制版的钱票是目前所知湖北制版或印刷时间最早的石印纸币。

中部天头内，写“蔡家巷口”诸字；地格内书写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背面左上方，有一枚方形红色骑缝章（半边）；右侧下方，也有编号“犹字第叁拾号”和二枚红色骑缝章（半边），其中一枚为长方形“衡康隆钱号”商号名篆书骑缝章（半边）。从骑缝章所在位置看，此票与上一张利生厚记钱号票基本相同。

此外，票上还有一些流通时留下的书写文字和印章。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知的武汉地方文献中，未见有衡康钱号的记载，但当时却有一家名叫“恒康”钱庄，仅一字之差，民国初年该庄号地址分别在汉口永康里口和大新码头两处。

#### 四、“义元钱庄”当十铜元壹佰枚钱票

“义元钱庄”当十铜元壹佰枚票，为蓝、黄双色套印竖式石印钱票，宽108毫米，高231毫米（图3）。



图3 湖北汉镇义元钱庄票正(背)面

钱票正面图案和文字为蓝色,空白处底色为黄色。图案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早期“火车图”。车头部,印有“铁路火车”和“义元钱庄”诸字。义元钱庄系此票的发行者;火车之上站立众多人物,西装革领,栩栩如生。

下部为一幅长方形多层框格图。

外边框,为波纹图案;外框内上部,有一幅“白云伴日图”,内书“汉镇”和“小关帝庙”诸字。指明了义元钱庄的地址在汉口镇小关帝庙街。

其左右偏下处,分别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蝴蝶。该蝴蝶具有明显的衔接作用,既是对上面“白云伴日图”的一种衬托,又引导出下面左右两侧的水果图案。

边框左右两侧,分别绘有各种美味可口的水果图案,右侧自上而下分别是,西瓜、佛手、菠萝、无花果、桃子、橙子;左侧自上而下分别是,石榴、香圆、枇杷、柿子、葡萄、梨子等。其下部为海水图。

民间钱票上,采用水果作为主要图案,这在清代民间纸币上,独树一帜,颇具特点。

内框中,分上、下两格:上格天头中,印有“义元”两个大字,即庄号名。

下部地格的黄色底纹中,有“义元钱庄”四个露白大字,特别醒目。其右侧为书写编号处,印有“字、第、号”诸字,未填写,说明此票系未发行票。其下有“另换新版,谨防假票”说明文字,指出此票为新换之票,也就是说,此前还曾发行过别的钱票。

中部为面额,“凭票发当拾铜元壹佰枚整”,即面额相当于制钱一千文。左侧有“宣统、年、月、日、票”等字,也未填写年月,为盖落地章,再次证明此票为未发行,但“宣统”二字,指明了钱票的印制时间在宣统年间

(1909—1911年)。

钱票背面,图案和文字均为红色。上端印有一段商家的告白文字:

“窃维本店设票,便于市面行用,前被匪徒伪造等弊,今特更还花样新版,以免鱼目混珠,诸公嗣后,凡授受者,务须记清来历,以为至要是幸,汉镇小关帝庙义元主人谨白。”

说明,前不久,义元钱庄发行的钱票,曾被伪造,为此特换新版纸币,并提醒客户注意真伪。

其下部已有一幅多层框格图,外层内,边框四周绘制的是古典人物故事图,人物众多;层内中部是一幅“五路财神图”,画中有松柏、山石、聚宝盆及五位财神等,人物绘制十分精美。

“五路财神图”,最早出现在湖北清代民间钱票之上,是湖北清代民间钱票中的典型图案,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由此分析,此票应为汉口的一家印刷厂家印制,遗憾的是,票面中并未指明。

五路财神,指的是赵公明及其四位义兄弟(或部将)。旧时民间,以赵公元帅、招宝、(下转第64页)



# 从出土与传世钱考察张献忠铸币

■ 王伶俐  
(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6—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重大成果已撷英500余件文物,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的文物表明,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张献忠铸币包括大顺通宝铜钱、西王赏功金、银钱及银锭等几种。

## 一、张献忠铸币考察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之前,前述几种铸币均有面世,但来源、多寡不同,比较多的是大顺通宝铜钱,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见于记载的考古发掘品主要有如下几次:1939年川军将领幸蜀峰主持锦江淘金公司进行挖宝,在成都望江楼下游长50米的锦江河道内挖出十几枚;1975年四月成都市望江楼附近锦江靠岸处发现的约十余公斤(1500余枚);1976年成都南郊永丰公社太平五队于距地表1.5米处发现的大约25公斤(这批钱交由成都市文物管理处保存)<sup>[1]</sup>;201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府新区成都七中工地内一处明代平民墓群中发现的2枚。2017年、2018年“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出水<sup>①</sup>等。从可获得图片资料的钱币看,发掘的“大顺通宝”铜钱直径基本为2.7厘米,面文“大顺通宝”,“顺”字“川”旁有较直、弯曲两种形式,“通”字“辶”作双点;背分穿下“户”字、穿下“工”字及光素无文三种版别。传世大顺通宝铜钱直径在2.5~2.8厘米,直径2.7厘米者居多,且与考古发掘品的基本特征相同,但“通”字“甬”字头有三角(图1)、菱形(图2)两种形式。除与前述考古发掘品相同的特征、版别外,并有一种背穿上“川”、穿下“户”二字者(图3),精整程度逊色于直径2.7厘米者,这种背文钱币初现于民国时期<sup>②</sup>,数量极少。西王赏功金、银钱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以2005年以来,特别是2016—2017年、2017—2018年“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品为大宗,数以百计(图4,图5);屈指可数的几枚传世西王赏功初现于清末民初时期成都,不仅有金、银质者,



图1



图2



图3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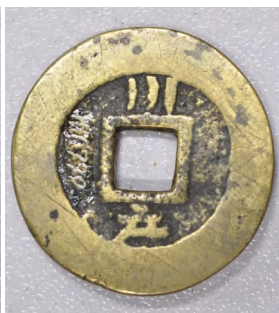


图3背面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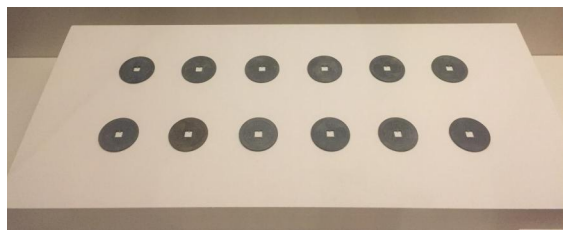


图5



还有铜质者,数枚已为国家所有的钱多流传有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金质西王赏功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后期时任重庆邮政局账务主管的钱币收藏家蒋伯坝获得并长期收藏品,1963年转手上博;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银质西王赏功于四川富顺县胡氏老房中发现后,被赠予有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誉的宋育仁(芸子)收藏,1933年春天被罗伯昭以重金自宋育仁侄予宋孝齐手中购得<sup>[9]</sup>,后于1957年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述外,国家博物馆尚收藏1枚铜质币,同为罗伯昭捐献;上海博物馆尚收藏1枚银质币、2枚铜质币,银质币为罗伯昭后人捐献,铜质币1枚为蒋伯坝藏品,与金质币同时售与上博,1枚为收藏家孙鼎所捐;天博物馆亦收藏1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征集所得铜质币。西王赏功金、银、铜钱直径在5厘米(江口出土钱基本为5.04厘米)左右,有表面光滑、外缘有牛毛般打磨纹两种加工形式,钱文风格一致,但总体细节有所差异。银锭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以2005年以来“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品居多(包括由四川考古研究所发掘与民间盗掘被收缴品),已经公开发表的多五十两者(图6、图7),从铭文看,体现为张献忠铸币的有几种表示形式:一是明确为张献忠大西



图6



图7

国铸,如“西朝双流县银匠黄杨”“西朝温江县五十两银”“西朝绵竹县伍十两银”;二是国号加年份如“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粮银伍拾两一定”;三是国号加年号加年份如“西朝眉州大顺元年分大粮银伍十两正”;四是年号加年份如“安岳县……解大顺元年半征银银锭伍拾两”“德阳县解完大顺二年军饷银伍十两”“汉州解完大顺二年军饷银伍拾两”“简州解完大顺元年分边仓银伍拾两”“新凡(繁)县茂卫大顺二年屯粮银五十两”;五是只有年份如“元年粮银”“元年崇庆州解大粮银伍十两”。从银锭铭文可以看出其书写极不规范,有“二”“贰”“伍十”“伍拾”“五十”等多种写法。

关于张献忠铸币的记载,基本围绕大顺通宝,散见于清以降的著述与钱谱,著述主要有:清人彭遵泗(约公元1740年前后在世)《蜀碧》卷二: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清人陈莱孝(1728—1787年)《古钱目录》:大顺钱皆作当二钱,背穿下有“户”“工”等字。清人刘景伯(1851—1860年)《蜀龟鉴》卷二:“献忠铸钱,取藩府古鼎宝玩杂诸寺铜像为钱文曰大顺通宝”,“钱光润精致,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清人徐鼐(1810—1862年)《小腆纪年附考》卷八:“设铸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民国赵式铭《云南金石考》十九:“石林寺铜钟有铭,高五尺,径二尺四寸,钟身有大顺通宝钱一文。”钱谱如清人倪模(1750—1825年)《古今钱略》卷十七:“右张献忠大顺通宝,钱径一寸一分有奇;右张献忠大顺通宝,钱径一寸二分,幕穿下户字,右大顺通宝,钱径一寸二分,幕穿下工字;右大顺通宝,钱径一寸二分,两面重文……张献忠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此钱殆其时所铸。”清人李佐贤(1807—1876年)《古泉汇》利集卷十八:“附张献忠大顺通宝小平钱,背平,户在背下,工在背下。”清人沈学诗(?—1903年)《历代钱法备考》卷八:“大顺通宝,明季张献忠僭伪号称成都为大西国,即西王位,伪号大顺所铸,大顺通宝钱皆作当二大钱,背穿下有户、工等字。”值得注意的是,著述先后所言张献忠铸币情况,明显为相互借鉴引用之说;倪模辑录的“两面重文”合背钱尚未见实物。

## 二、关于张献忠铸币的几个问题探讨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实物,为判断张献忠铸

币提供了可信依据的同时,也为研究张献忠铸币种类、时间、地点、关于张献忠铸币著述的可信程度、与文献资料的互补佐证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籍目前所见实物及著述,发现关于张献忠铸币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仅就发现的几个问题加以初步探究。

大顺通宝的等值:关于“大顺通宝”等值,从前面提及的清代著述与钱谱可以发现,清人多认为大顺通宝为折二钱。由于目前面世钱有直径小到2.5厘米,大到2.8厘米的,因而有小平、折二两种与小平、折二与折三三种观点。据实物考察,大顺通宝多为直径2.7厘米即所谓折二者,这种钱铜质优良,铸工精整,不乏金光灿灿者,由公布的“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品可以确定,相当数量通字的“甬”字头为三角形、直径2.7厘米的钱为著述记载的张献忠建大西国后,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所铸钱;由于公布的出土品尚无菱形“甬”字头者,且这种特征及钱的总体风格与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率大西军占领贵州、云南后所铸兴朝通宝基本相同,可以推测这类钱为孙可望铸造,这种猜想目前可以为依据的只有孙可望所铸兴朝通宝铜钱,而有待更多“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品面世。直径2.5厘米的小平、2.8厘米的折三钱相对少,这两种尺寸钱表面显现的铜质、铸工多逊色于直径2.7厘米钱,应该不是著述记载的张献忠建大西国后,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所铸钱,其确切铸造时间、地点有待进一步考察。

关于西王赏功的铸造时间与铸造地点,学界有不同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崇祯)“十六年春……陷武昌。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宫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的记载,认为西王之宝或为西王赏功,铸于武昌;另一种观点也是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十七年春陷成都,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成都曰西京”的记载,认为是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占领四川,建大西国后于四川铸造,有学者并细化到铸造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sup>[3]</sup>。因有明确来源的西王赏功基本发现于四川,且钱的风格特征与大顺通宝近似,今多认同西王赏功为张献忠建大西国后铸于四川。但通过“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实物,结合文献资料记载进行分析,西王赏功铸于武昌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如下,第一,所有相关著述中,明确张献忠自谓“西王”者,都集中于崇祯十六年攻占武昌后,虽然对他在武昌所

铸“西王之宝(也有西王致宝之云)”是玺印还是钱币尚无定论,其时的“西王”之谓当无疑问。从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分析,既然张献忠占据武昌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体系,必然拥有象征身份地位的玺印、物化奖惩制度。既然铸有西王之宝御玺,自然有可能铸西王赏功用以鼓励士气。第二,关于张献忠占领四川、建大西国后的称谓有多种记载,如称帝(《明季南略》),即王位(《茶岩逸考》),僭号大西国王(《明史·流寇传》),改称秦王(《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引4年)等,均没有“西王”之谓,而关于张献忠称皇帝之说,不乏实物、文献资料可证,如出土金册残页刻文“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宫九御”已经证明为张献忠所立的圣谕碑,碑上部刻以“圣谕”字眼,“圣谕”当然是皇帝之谕。计六奇《明季南略》载:1645年,张献忠准备娶陈演之女为皇后;大顺二年滥杀手下兵马过半后,曾感叹:“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蜀碧》载其所发圣旨也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篇……。即认为是钱铸造时间大约在张献忠入蜀之初仍称西王至称帝以前,也可说明钱出于张献忠称西王时,当始铸于武昌。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张献忠具体称帝时间定论,该钱是否有铸于四川者有待商榷。当然,从钱有两种版别或可以推断钱铸于不同时期与地点,关于此尚待深入研究。第三,西王赏功金、银钱币皆出自四川不应是钱仅铸于四川的理由。首先,张献忠铸西王赏功的目的是用于奖励军功,本身铸量不会大,自武昌至四川一年余的征战过程中是否奖励、奖励过多少有功之人尚无法考察,也许受考古发掘有限等诸多因素限制,奖励给部下的钱尚未有在川省外发现。其次,通过文献资料记载看,张献忠对部下的政策一向是惩罚大于奖励,有否曾将西王赏功金银币用于奖励有待深入探讨研究,也许钱铸造后一直集中管理,直到入川建国。再次,文献资料明确记载张献忠入川后严格限制民间藏有金、银,据刘景佑《蜀龟鉴》:“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凡金银、器物、首饰沉井窖屋,发觉者连坐一营;告捕者赏以其家器物。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如此严酷政策下,西王赏功金、银币也许失去军功章的荣誉,一并当做金银器物上缴。最后,有明确记载的西王之宝尚未发现,也可以佐证西王赏功金、银钱币未在张献忠行军线路上发现不等于没有。所以,西王赏功金、银币的铸造时间和地点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有两种:一种铸于武昌,集中带入四川或入川后被集中收缴;一种是始铸于武昌,入川初期也有铸造。遑论何种情况,最终钱币都被集中收缴为张献忠财

富。由于张献忠据有武昌仅三月余,即使入川初仍以西王称谓铸币,也只能是建立大西国的第一年,如果按明史记载大西国建于元年11月的话,铸币存在时间只有月余<sup>③</sup>,不会超过大顺二年,两相相加,西王赏功的铸造时间不及半年,加之其为奖赏军功而铸,铸量必然很小。

关于西王赏功,特别需要探讨的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中的西王赏功钱范(图8)。在目睹钱范实物前,曾经看到钱范与附着其上的钱币的照片,由于拍摄角度问题,看到钱上仿佛有流铜口痕迹,当时认为如果这是一件钱范,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为明代已经采用翻砂法铸币,应该不会遗留钱范,如果采用范铸法铸钱,只有所铸钱为母钱一种可能,如果这枚钱为母钱,不但丰富了农民起义钱币品种,也将是研究西王赏功铸造工艺等的珍贵实物资料。文物展出后,经过仔细观察钱范与钱币,发现钱范似乎由多重物质层构成,不类铁(由于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尚未出版,有关详情待确定),范表钱模整体偏浅,关键的是与范结为一体的钱币显然是已经加工完毕的成品,从而基本可以认定先前认为的钱范应该是因钱被周遭物体长期挤压积累下来的附着物。当然是否如此,还假以日后相关检测数据等的公布。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张献忠铸币不仅令学界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关于张献忠建大西国后年号的使用时间问题,曾有学者推测大西政权的“元年”无“大顺”年号,至二年始有“大顺”,而出土银锭“安岳县……解大顺元年半征银银锭伍拾两”、“西朝眉州大顺元年分大粮银伍十两正”的铭文明确



图8

证明大西政权建立的元年既有大顺年号;又如出土的大顺通宝钱表明清人关于大顺通宝只有折二钱的说法符合实际,部分钱还足可说明《蜀碧》“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记载的真实性。

随着“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文物的增多,出土文物各种资料的公布,关于张献忠铸币的问题会日益清晰,以铸币证史、补史缺的可能也会更多。■

#### 注 释

- ① 因“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尚未出版,具体出土数量不详。
- ② 戴葆庭、孙鼎、罗伯昭、沈子槎等人先后藏有,其中罗伯昭、沈子槎二人藏品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 ③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记载均说明大顺二年张献忠已经称帝。

#### [参考文献]

- [1]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郊发现“大顺通宝”[J].考古,1977(9).
- [2] 罗伯昭.谈西王赏功钱[N].晶报,1935-01-28.
- [3] 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07.

(上接第32页)货币工作的国际交流范围及合作,不断开展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反假交流,逐步扩大交流合作范围,构建人民币反假国际合作机制,最终形成反假人民币全球合作网络。

(五)积极推广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减少现金流通量

大量使用人民币现钞结算无疑给假币滋生提供了方便,因此积极推广非现金结算,缩减公众现钞使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假币的滋生与蔓延。目前各种非现金结算工具已在城市得到了广泛地使用,而在农村牧区、偏远地区人民币现钞仍是最主要或唯一的支付手段。因而,不断优化非现金支付结算环境,尤其是在农村牧区、偏远地区加大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的推广力度,将有助于减少人民币的现钞

流量,可有效控制假币的使用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宋濂.元史(卷85百官一)[M].中华书局,1976:2129.
- [2][4][7][8][9]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册)(户部卷之六、钞法)[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770、791、798、798、774.
- [3]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人民出版社,1984:269.
- [5] 宋濂.元史(卷105刑法四)[M].中华书局,1976:2668.
- [6] 宋濂.元史(卷32文宗一)[M].中华书局,1976:710.
- [10]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348.
- [11] 魏源.元史新编(卷87食货上·钞法)[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443.
- [12][13] 宋濂.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M].中华书局,1976:2485.
- [14][15] 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20赏令“获伪钞贼”)[M].中华书局,2001:580、581.



# 蒙阴县钱票

■ 李天聪 李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连云港支行)

蒙阴县位于山东中南部,沂蒙山腹地,东与沂水、沂南县相邻,南依蒙山与费县、平邑县交界,西接新泰市,北靠沂源县,处于东汶河上游。西汉初始设蒙阴县,因在蒙山之阴而得名,隶属兖州泰山郡。王莽篡位后,改称蒙恩县。三国时期魏复设蒙阴县,属徐州琅邪郡。西晋末因战乱废。南北朝时期,北魏于蒙阴地设新泰县,属南青州东安郡。东魏时,东安郡之新泰县复更名为蒙阴县,仍属东安郡。北齐将蒙阴县并入东泰山郡之新泰县。直至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原蒙阴地均属新泰县。南宋景定三年,蒙阴地又由新泰县划入沂水县,称新泰镇。元皇庆二年(1313年),重建蒙阴县,属益都路莒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属青州府。清雍正八年(1730年),改属莒州。雍正十二年(1734年)属沂州府。民国二年(1913年),蒙阴县属济宁道。民国十四年改属琅邪道。民国十七年废道,直属省。民国二十五年,属山东省第三行政区。民国三十年9月,原蒙阴县的大部分地区被划分为新蒙县、泰宁县、博莱县。蒙阴县属鲁中区二专区。民国三十二年3月,蒙阴县撤销。同年9月恢复,仍属二专区。

蒙阴以务农为主,商业不甚发达。民国九年全县有私营商号400余家。泰安、章丘等县商人在本县所设商号资本比较雄厚,在商业界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兵灾匪患,商业萧条。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因时局稍平稳,商业比较发达。民国二十五年是解放前蒙阴县经济全盛时期。县城有商号70余家,摊贩135户,饮食服务业36户。较具规模的有和盛号、泰源涌酒店、义盛和布庄。和盛号主要经营烟酒糖茶、糕点、作料、酱菜等零售批发业务,兼营钱庄,并收购蚕茧、花生。泰源涌酒店为合资经营方式,资本5000元,年销酒5万余公斤,价值3万元。义盛和布庄,民七年成立,资本2500元,年销额8000元。对外贸易方面有蚕丝、花生仁、花生油、畜产品、棉花等。抗战前商人收购蚕丝、棉花、油料、羊毛、羊绒、肠衣等销往青岛、上海、周村等地。外地商人收购皮张,贩运蒙山牛销往青岛、上海。常年外销蒙山牛千头左右,民国二十三年外销蒙山牛2000头、羊毛4500担(22.5万公斤)。抗战时期,县城沦陷,商

号全部倒闭,县城内只有临时性商贩40余户。

民国初期至民国二十年间,本地钱票盛行,凡参加商会的商号,都可申请发行钱票,商会按其呈报资本的1/3,最多不超过1/2核批发行限额,票面盖有商会印章的准许在市面流通。发行钱票者多以县城和重点集镇为中心,仅县城内发行钱票者就有30余家,多以兼营为主。杂钞名目繁多,有“号票”“钱票”“钱贴”“吊票”等,既有木、铜制版印刷,也有手书签章者。发行面额,“吊票”有一、二、三、五吊;“乡票”有一、二、三角,最大面额与银元等值。民国二十五年,北道沟票户赵维一以铜板制票,面额壹角,正面标有“此票每十角正兑换大洋壹元,概不兑零角”,背面有“留神细看,谨防假冒”字样。民国二十年,全省统一货币,地方钱票全部取缔。1936年以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地方钱票的发行又死灰复燃,一些商号乘乱又开始发行钱票,甚至连蒙阴县官方也趁机发行纸币。

蒙阴县商会成立于民国六年,设正副会长。李承祚、齐兆典、白春奎等先后任会长。民国十四年,因匪患商会停办。民国二十年恢复,张廷信任主席。商会受县实业局委托,为私营商业发证,并进行管理。抗战时期,民主政权在根据地内设立了商联会。

钱庄主要经营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和发行钱票等业务。蒙阴县钱庄业始于清末,盛行于民国初年。民国三年有钱庄12家,民国九年有钱庄30余家(多以商业兼营)。山西省与章丘县商人在蒙阴城里开设的专业钱庄有“泰盛坊”“广丰”“恒顺”“岱东”“益丰公”5家,资本雄厚,垄断蒙阴金融业。本县人开设的专营钱庄有“东盛”和“益盛”两家。兼营钱庄的有20余家,以“和盛”杂货店、“恒丰”“泰丰”布庄、“德丰”杂货店、“泰源永”酒店、“东泰涌”油坊放款较多,利息高达3至5分。放款期限多为春放秋收,待蚕茧、花生、棉花、粮食上市收回债款。民国十四年,土匪猖獗,外资钱庄撤出,本县钱庄也日趋萧条,民间借贷以多种形式的高利贷为主,由中人或指地作保。有些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乘机放高利贷,利息最低5分,高者达十几分,到期不还或利作本,利上加利,或利息翻番加倍计息,越滚越多,俗称“驴打

滚”。许多贫苦农民在重利盘剥下倾家荡产、背井离乡。据高都乡试办信用社时调查,建国前,全乡五百户中,每年放高利贷者40户,借债者百余户。利息最低3分,最高达14分。有个唐姓6口之家,因天灾借高利贷款(银元)20元,定期一年不曾还上,三年后只得将十余亩耕地卖光还债,后全家被迫闯了关东。民国十九年前,蒙阴境内货币经营业务中发行钱票者达百余家,县城四关就有23家之多。发行钱

票者虽多,但印刷不正规,经营不长久,多系粗制滥造,币质低劣,朝出夕停。

如今,蒙阴县地方钱票实物留存下来的品种并不多。笔者见过的约有一种官方发行的和9个字号12种民间发行的钱票。

官方发行的仅见“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一种(图1、图2)。该券票幅129×72mm,单面印刷。正面绿色;主图是“万古长春”牌坊;主图上方

表1 1936年蒙阴城商业店号

商号	行业	开设地址	经理	籍贯
兴盛号	杂货	北道沟街	李宝玉	蒙阴县
益盛号	杂货	大东关街	王英文	蒙阴县
德盛和	杂货	大东关街	耿立册	蒙阴县
和盛号	杂货兼钱庄	大东关街	刘秉芝	章丘县
益丰号	杂货	大东关街	李参怀	章丘县
东益盛	杂货	大东关街	王东益	蒙阴县
瑞兴恒	杂货兼布庄	西关街	沈宝田	蒙阴县
荣泰和	杂货	北关街	王富荣	蒙阴县
庆祥号	杂货兼钱庄	北道沟街	刘运学	蒙阴县
长盛永	杂货	北道沟街	刘德忠	蒙阴县
三合成	杂货	北关街	李维晋	蒙阴县
松泉长	杂货	北关街	乔文彬	蒙阴县
恒丰号	布庄兼钱庄	大东关街	宗子安	泰安市
德丰号	布庄兼钱庄	大东关街	李子芹	章丘县
义盛和	布庄	大东关街	芦兴三	章丘县
广兴泰	布庄、成衣	北道沟街	郭传经	蒙阴县
盐店	食盐业	大东关街	官办	
泰源涌	酒店	北道沟街	张廷信	蒙阴县
泰丰楼	饭馆	北道沟街	崔宝亭	蒙阴县
裕盛和	饭馆	大东关街	张锡玉	蒙阴县
鸿升饭庄	饭馆	南阁子街	类可升	蒙阴县
同乐居	饭馆	西关街	类际怀	蒙阴县
德盛馆	饭馆	城里	张殿君	蒙阴县
三义合	杂货	北关街	夏长春	蒙阴县
丰盛和	杂货	北关街	公子丰	蒙阴县
聚兴恒	杂货	大东关街	王克恒	蒙阴县
同和泰	百货、铁器	大东关街	胡宝第	蒙阴县
中和兴	杂货	城里	刘建忠	蒙阴县
义和永	杂货	城里	刘秉钧	蒙阴县
成德永	杂货	大东关街	赵纪魁	蒙阴县
聚兴和	杂货	大东关街	王兴海	蒙阴县
隆盛号	杂货	北关街	崔立明	蒙阴县
瓷器店	陶瓷、铁器	大东关街	王义方	蒙阴县
泰盛坊	钱庄	北关街	白春魁	章丘县
东盛和	钱庄	大东关街	李宗恒	蒙阴县
义盛号	钱庄	大东关街	李长增	蒙阴县
广丰号	钱庄	大东关街		章丘县

商号	行业	开设地址	经理	籍贯
恒顺号	钱庄	大东关街		山西省
岱东号	钱庄	大东关街		泰安市
益丰公	钱庄	大东关街		章丘县
东泰涌	油坊	小东关街	杨濂溪	蒙阴县
水春堂	西药店	西关街	芦守义	泗水县
同善堂	中西药房	城里	乔文干	蒙阴县
德泽药房	中西医药	西关街	边润田	蒙阴县
成春堂	中医药	西关街	王岱云	蒙阴县
广义楼	银器首饰	大东关街	王焕章	章丘县
盖家馆	饭馆	北道沟街	盖金声	蒙阴县
泰丰楼东记	饭馆	大东关街	王焕斋	蒙阴县
同和堂	中药店	大东关街	宋德楷	章丘县
恒仁堂	中药店	北道沟街	刘希仁	章丘县
益和堂	中药店	北关街	李昆章	蒙阴县
春和堂	中药店	北关街	王元昆	蒙阴县
长春堂	中药店	大东关街	刘盛春	蒙阴县
永增泰	中药店	北关街	王殿增	蒙阴县
延龄堂	中医外科	西关街	朱广鼎	蒙阴县
泰来号	西药店	北道沟街	张宗祥	蒙阴县
中西药房	药店兼印刷	北关街	李文华	蒙阴县
启蒙书社	图书业	西关街	王步瀛	蒙阴县
泰东印刷局	印刷业	北道沟街	杨玉坡	泰安市
泰来印刷局	印刷业	北道沟街	张宗祥	蒙阴县
庐山照相馆	照相业	大东关街	李才三	河北省
庆云照相馆	照相业	北道沟街	李长功	蒙阴县
聚宝楼	银器首饰	大东关街	孙书斋	章丘县
顺祥楼	银器首饰	大东关街	于福禄	蒙阴县
三义和	制鞋业	北道沟街	窦惠恩	章丘县
鞋店	制鞋业	城里	段锡福	蒙阴县
泉盛涌	酿造酱油醋	大东关街	王克德	蒙阴县
鸿昶号	酿造酱油醋	大东关街	孙奎明	蒙阴县
双盛和	染坊	北关街	崔立德	蒙阴县
兴盛坊	染坊	北关街	崔立祥	蒙阴县
宋家染坊	染坊	北关街	宋学谦	蒙阴县
刘家染坊	染坊	北道沟街	刘士元	蒙阴县
普利衣庄	缝纫业	城里	刘泽普	蒙阴县
彩石山房	雕刻业	北关街	郭寿朋	蒙阴县

有“公私款项 一律通用”字样,再上方是券名;主图下方是流水编码(分手写和打印两种)和年号;主图左右两边各加盖一枚“县经委会印”印鉴。背面中间盖有一方大印;右边有手写字和骑缝章。手写字第一位是以千字文为序的冠字(图1背面为“玄”字,图2背面为“黄”字),第二、第三位分别是“字第”,其后是和正面相同的流水编码,末尾是“号”字。依据印鉴,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当系蒙阴县经济委员会发行。

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委员会”,笔者仅查到如下资料:郭欣农在谈北海银行的建立一文中提到,“(掖县)县委责成三支队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解决办法”。最初建立的北海银行,其出资人账册上显示,“掖县经济委员会应出股金 65000 元,黄县经济委员会应出股金 55000 元,蓬莱经济委员会应出股金 55000 元”。原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行长张耀曾回忆道,“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冀鲁边区经济委员会研究过成立银行和印票子的问题”。《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1940 年 2 月 1 日),“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均需设置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就是说,共产党机关、共产党领导的一些部队或一些民主政权,曾经设立过“经济委员会”。

民国二十七年 3 月,八路军四支队在蒙阴组建第十二中队,后改为七中队。民国二十九年 7 月,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杨荆石任县长。民国二十

七年 6 月至民国三十二年 5 月,郑小隐任国民党蒙阴县长。民国二十八年 8 月,日伪在蒙阴县设立县公署,蒯连甫任县知事。但是,不清楚蒙阴县委、县大队、八路军四支队第七中队或民主政府是否设立过经济委员会,也不清楚国民党的蒙阴县政府、保安大队及日伪控制的地方政府是否设立过经济委员会。因此,无法断定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的实际发行人。

民国二十九年 7 月,中共蒙阴县委在蒙阴梭庄召开县参议会,公布了《为罢免县长郑小隐蒙阴县参议会告全县民众书》,宣布罢免国民党县长郑小隐(并未实际罢免)。“告全县民众书”中罗列了郑小隐九大罪状。其中第四大罪状是:“四、纵兵殃民,穷征暴敛。郑小隐在一区召子官庄、茶棚一带,五区东高都、托盘沟一带,三区上下峪、常路、坟南、柳沟、西高都一带,强征民粮,抢劫运输,苛捐杂税,强行勒索,私自增加田赋每两银有多至五六十元者。”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有没有可能与“强征粮食,增加田赋”有关?

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印刷粗糙,有可能系本地印刷。据《蒙阴县志》载,1933 年泰安人杨玉坡在县城设泰东石印局。1937 年停办。另有李文华、张宗祥在县城兼营石印业。

笔者见过的蒙阴县民间钱票有:蒙阴桃墟镇福顺号民国十年叁吊,蒙阴坦埠德昌号民国二十五年



图1正面



图1背面



图2正面



图2背面



叁角,蒙阴利丰涌民国二十五年贰角(发行人的性质有待探讨),蒙阴东乡鸿源永油坊民国二十八年壹角(图3),蒙阴城北大板岗庄益盛永叁吊、伍吊,蒙阴东北乡益盛永叁吊(图4),蒙阴城北关恒兴合叁吊

(图5),蒙阴城北刘家峪庄义成永伍吊(图6),蒙阴东北乡高家庄子忠厚成贰吊、伍吊,蒙阴西乡柳沟集复盛永叁千文(图7)。这些钱票的发行地多数在乡下,且无一表上有名。■



图3正面



图3背面



图4正(背)面



图5正(背)面



图6正(背)面



图7正(背)面

# 一枚见证了武则天政治试水的钱币

■ 王永生

(中国钱币博物馆)



开元通宝是唐朝铸造的第一种钱币,因为大小、轻重都很适中,很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因此自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铸造之后,太宗在位的23年一直沿用,没有铸造新的钱币。但是,高宗继位之后,却另外新铸了“乾封泉宝”,公开的理由说是因为民间盗铸开元通宝太过猖獗,市面上的假钱太多。因此,需要改铸一种新钱。实际上,这只是外在的说辞,而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它是想当女皇的武则天的一次政治试水。

下面就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给大家说说“乾封泉宝”背后有关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的祖籍是山西文水,父亲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木材商人,后来弃商从军,跟随李渊成为“从龙”的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被封为应国公。因此,武则天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14岁的时候,因为貌美被召进皇宫,封为“才人”称“武才人”。唐太宗李世民发现她不但貌美,而且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称其为“媚”,于是就有了“武媚”之称,这就是文学作品中“武媚娘”之称的来历。太宗去世后她被安置在“感业寺”出家做了尼姑。不久还俗被继位的高宗纳为“昭仪”,后来又被立为皇后。

武则天为人不但有心计,更有野心。她被立为

皇后之后,政治上还不满足,于是利用高宗患有高血压,经常闹头疼,身体不佳的便利,施展种种手段,插手朝政,培植她的势力。高宗在朝堂上和群臣议事的时候,她就在高宗身后垂起帘子,一起听政。因此,史书中说“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武则天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为了实现她更大的政治野心,进行了一次政治试水。

有关这次政治试水,要从麟德三年(666年)进行的泰山封禅说起。

所谓封禅,是指在高山之处祭祀天地。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封禅之说,但是,实有记载的封禅以秦始皇为最早。因为古人认为天下泰山最高,因此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登临泰山祭天,称为“封”;又在附近的小山梁祭地,称为“禅”。昭告天地统一天下了。此后只有汉武帝打败匈奴、光武帝匡扶汉室,举行过封禅仪式。东汉以后,改朝换代虽然频繁发生,但是没有一个帝王敢于轻易封禅。贞观年间虽然多次有大臣提议封禅,都被太宗给制止了。高宗时期平定西突厥之后,唐朝的疆域远达中亚地区,超过了汉代。又有大臣提议封禅,高宗就同意了。武则天于是就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了一次政治性的试探。

大家可能要问,武则天想试探什么?

实际上,她是想试探一下,虽然她已经与高宗皇帝并称“二圣”了,但是还不知道天下臣民是如何看待她的?她想看看进一步称帝当皇上有无可能?

那武则天又是如何进行试探的呢?

首先是从封禅的仪式上。因为当时武后与高宗并称“二圣”,于是,她就对封禅仪式提出异议。说古代封禅,在禅地时配祀的是太后,为女性。但是行礼的却都是公卿,为男性。将妇女排除在外,“礼有未安”。所以,这次她要“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自古以来祭祀天地从来没有女性参与,但是,这次武则天



不但要参与,还要率领大批妇女参与。以此向天下说明,她要与男子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为她下一步称帝做试探。

其次是从封禅所使用的礼器上。按照古代的礼仪,封禅所用的礼器,铺地应该用黍秸,就是小米的秸秆,祭祀应该用陶器。但是,武则天却要求改用褥垫铺地,用铜罍、铜爵祭祀。高宗先祭,称为初献;她后祭,称为亚献。等高宗祭祀结束后,武则天就将全部人员撤下,换上宦官打起锦绣帷幕,再由她带领皇宫里的嫔妃、宗亲的命妇们,献上祭品,唱祭神歌,全部都用宫女。不但场面宏大,而且华丽张扬。一改上古崇尚自然、节俭的传统,但是,却没有一人敢于提出异议。

最后是改元“乾封”并铸新钱。封禅之后,并称“二圣”的高宗与武则天大宴群臣、大赦天下,既给官员赐爵,又给百姓免赋,宣布当年改元“乾封”,用以纪念泰山封禅之举。四月封禅队伍回到京师,拜谒太庙,告知祖先封禅的大事已经完成。随后武则天就于五月铸造了新钱“乾封泉宝”,想用铸造一枚新钱的方式,来树立她新“圣”的权威。

武则天被称“圣”之后,借助泰山封禅这样一场大型的祭祀活动,所进行的三项政治试水,有两项,即仪式和礼器上都达到了她的预期目的,只有铸钱这一项失败了。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新铸造的“乾封泉宝”为什么失败了呢?

“乾封泉宝”是唐高祖李渊铸造开元通宝钱之后,铸造的第二种钱币,却是唐朝的第一种年号钱。它轮廓周正,铜质纯净,铸工良好,在唐代钱币中属于上品。它与开元通宝钱币相比,有三点不同。

一是钱文的读法不同。欧阳询当年为开元通宝定名的时候,钱文是先上下直读,再右左横读,简称为“对读”。但是环读意思也通,因此民间有人就环读为“开通元宝”。武则天铸造乾封泉宝,按照民间的读法改成了环读,违背了开元通宝所创设的体例。

二是钱文不用“通宝”而是另外创造了一个“泉宝”,这与将钱文改成环读一样,显然也是反映了武则天不愿遵守开元通宝所开创的体例,而要另搞一套的用意。

三是尺寸、面值不同。乾封泉宝直径约27毫米,比开元通宝略大,面值是开元通宝钱的十枚。计划是两种钱币先按一比十的比价并行流通一年之后,再废除开元通宝钱,只用乾封泉宝。

乾封泉宝之所以铸造成面值为当十枚开元通宝的虚值大钱,武则天除了有要压过开元通宝钱的主

观愿望之外,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高宗继位之后,盗铸开元通宝钱的现象非常严重。武则天当政之后,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私钱流通,曾经明令取缔私铸。显庆五年(660年)朝廷曾经下令以一比五的兑率比例用官钱收换私钱。但是,民众认为不值,就将私钱藏匿起来进行抵制。朝廷不得已,又改成以一换二的方式收购,效果依然不理想。因为老百姓都将私钱藏匿起来,导致市面上流通的钱币减少,交易窒息,市场萧条。朝廷又被迫取消禁令,准许私钱流通。

武则天这次利用封禅改元之机铸造乾封泉宝,之所以铸造成以一枚抵开元通宝十枚的大钱,本来是想以此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减缓钱荒的矛盾,使私铸失去存在的条件而不禁自绝。但是,却事与愿违,乾封泉宝一上市,民众便纷纷藏匿开元钱,市面上只剩下当十的乾封泉宝。直接造成物价飞涨,大钱贬值,甚至低于当一的开元钱。私铸者于是改铸乾封泉宝,重量大减,有的甚至不到官铸的一半。官铸大钱空耗人力物力,而私铸者却坐收渔利。万般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得在第二年正月,流通还不到八个月,就下令停铸,已流出的乾封泉宝与开元钱按一比一等值流通。

这次铸钱的失败,使得武则天获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政治与经济是不同的,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控制了皇权,政治问题都好搞定。但是涉及基层民生的经济问题,必须要尊重市场规律并听取臣下的意见,不能过于主观。因此,在她后来以皇帝的身份亲自“封中岳嵩山”的时候,虽然曾经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并改年号为“万岁登封”,但是却没有敢铸“登封”钱。甚至在她自己当皇帝的23年间,虽然先后使用了18个年号,竟然再没有铸造过一枚年号钱!这应该就是武则天的高明之处! ■



# 我对太平天国黄金货币的认识过程

## ——兼认识历史上货币的若干方法问题

■ 赵德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叙述我对太平天国黄金货币的认识过程,既是对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做一次学术回顾,也涉及在这个问题上的资料与知识的学术积累<sup>①</sup>。这对学界在此问题上取得共识和应该怎样去认识一种历史上的货币现象,或许也会有所助益。

### 一、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习什么是货币和中国历史上金币诸形态的知识

我对太平天国金币的认识过程,始于学习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金币(黄金货币的简称)。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中原大学经济学院期间,学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1953年到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期间,除了学习政治经济学外,还学了哲学、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等课程,认真地读了《资本论》。它们使我知道了什么是货币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古今中外,世界上所有的货币,其本质是相同的,而其具体形态则千姿百态。关于货币的本质,当时是以货币的职能下定义的,即货币是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的特殊商品,在价值形态上是一般等价物<sup>②</sup>。至于货币的形态,无论是货币的物质载体(币材)还是具体形状(币形),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多样的。在币材上,正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黄金在具有货币功能之时,或者说黄金在被作为货币使用之时,黄金就成了货币,金币就产生了<sup>③</sup>。在历史上,金币的具体形态各国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里,各个阶段也不相同,它是变化的。在中国,它的最初形态是黄金熔液凝固时所形成的块(饼)状、板(片、叶)状、条状等等。进而象征或仿效某种具有吉祥意义的物体形象。再进一步便是为了昭示信用,在上面加上文字(或刻文,或印文,或铸文)。

楚国的金币,已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如龟壳、龟板形式的金板、金叶和圆形的金饼),并盖有印文。汉代有马蹄、麟趾形式的特种金币和饼状的一般金币。至唐宋有金铤。近代多用金条。由于上述这些形态(金板、金饼、金铤、金块、金叶、金条等等)的黄金都有货币功能,所以都被称为金币或金钱。

### 二、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与太平天国金币的传统形态

1961年9月,我参加高等教育部组织的高等学校文科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在编写组中,分工负责太平天国财政经济部分。这年冬,我读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看到不少与太平天国有关的黄金的记载,其中卷十《贼粮》中的两条记载引起我的重视。

第一,“伪圣库馆截至癸丑年底,实存银二百六十三万两,银首饰一百二十五万两;赤金叶、条、饼、铤、首饰,实存金十八万四千七百零两;钱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串。”<sup>④</sup>

第二,“难民曾述有卒长,管百人,係某功勋统下,亲见其卒长每月向伪功勋领取买菜钱,多至金一、二两,银首饰数十两,其卒长悉数易钱买猪鸡以供众啖。”<sup>⑤</sup>

当看到上面的第一条资料时,立即联想起上文所说的,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商品货币经济阶段之后,金、银就具有货币的功能,其实物形态有金板、金叶、金条、金饼、金铤等等<sup>⑥</sup>。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关于太平天国圣库里的“赤金叶、条、饼、铤”,即金叶、金条、金饼和金铤,是中国古代国库里的常见的几种黄金货币形态,或者说中国黄金货币的几种传统形态。第二条资料进一步证明,太平军圣库中所存的黄金,是作军饷使用的;卒长领到黄金后,

用于购买食物,是当作货币使用的。在市场上,相对而言,黄金价值量大,猪鸡价值量小,交易时不便以金为单位计价,所以要将金“易钱”后再用“钱买猪鸡”。这说明在太平天国境内的市场上,存在着金钱比价和黄金交易的。下文引征的《蕲湖笔记》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金一、二两”,未说明金的具体形态,从以两为单位而不是以枚或元为单位,可以推测是金叶、金条、金饼、金锭等形态中的一种。

这两条说明太平天国圣库里各种形态的黄金具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等货币职能。太平天国是使用黄金货币的。

### 三、《湘军志》中记载湘军官兵从太平军那里获得金币

1962年春,我翻阅王闳运的《湘军志》,在《筹饷篇第十六》中,发现他记载湘军掳掠、官兵吞没财物情况的文字。其中有一处与太平天国金币有关:“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sup>[1]</sup>当我看到这个记载时,很是高兴。因为它明确记载了“金币”是湘军官兵从太平军那里获得的。记载者王闳运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曾国藩幕,亲见湘军的作为。王闳运入曾国藩幕期间,虽因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但事后在言行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王闳运是湘潭人,与许多湘军将领私交甚笃,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湘军志》这本书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的。这一点甚为重要。从王闳运一生的全部著作来看,他的治学态度严谨。他如果没有看到过湘军卤获的、不可胜计的太平天国的金币、珍货,是不会作此记载的,也不便作此记载的。据此,王闳运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顺便说一句,1963年,中山大学的谭彼岸先生<sup>[2]</sup>来到我所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科书”编写组。闲谈中得知他对中国近代货币颇有研究,我将这条资料抄送给他,并向他请教。他认为这是个重要的发现,可以据此认定太平天国制造过金币。我同意他的判断,王闳运是我所知道的在私家史书中记载太平天国金币的第一个中国人。

### 四、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它征引的外国人的记载

我在学习有关太平天国的前人研究成果时,读了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sup>[3]</sup>。在这本书的第十篇(泉币考)里,著者将他所看到的中外文记载和

他本人的调查集中在一起,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其中,重点介绍了耿爱德(Edward Kann)所著两本书中关于太平天国金币的记载。

第一本是《中国货币论》(Currencies in China):“定都金陵时,曾发行金币一种。形似中国之古钱,币面不标明价额。估计似为银二十五也。”<sup>[4]</sup>简又文对此记载的态度是:“此种金币,余未尝得见真品。闻英国博物馆亦藏有。”既不否定,也不完全肯定。

第二本是《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它提供了两种太平天国金币正背面图及其说明。

一种是大型的。说明文是:“1860年。二十五两太平天国金币一品(无年期),圆径31毫米;重37.3克。”“面:中有方孔。文:右‘金’,左‘寶(宝)’。直‘太平’,横‘天国’”。耿爱德说,1944年,他在上海见过一枚这样的金币,是Allan从李鸿章的一位后裔处得到的。有些中国钱币学专家见此摇头不置(摇头不止,摇头不置可否),以为是贗品或仿制品。耿爱德认为此币“当待考证”。简又文经过一番考证,认为这种太平天国金币是贗品。

一种是小型的。说明文是:“1860年(大约年期)。五两太平天国金币一品(无年期),圆径27毫米。”“面:中有方孔穿透。文:横‘太平’,直‘天国’。背:中有方孔穿透。文:右‘聖(圣)’,左‘寶(宝)’”。耿爱德提到“芝加哥的高祁氏(A.C.Keefer)藏品有此”<sup>[5]</sup>。William Mesny在其所著的书里,谈到本人看到这种金币,说是太平天国政权于公元1860年后在南京所制造,一枚值银五圆(元)。不少外国人有这种金币。一个名叫Jersey Eilmill(按:拼写有误,应为Filicule)的人,拥有这种金钱二百余枚,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王爷赠予的。“所有太平军的领袖人物皆有多少,各囊之钱袋中,以餽赠为其功劳者。”金钱的大小和形状,与一般的太平天国流通钱币相似,惟分量较重,装饰较优。耿爱德指出,William Mesny 1860年正在中国。耿爱德认为上述A.C.Keefer藏的实物和William Mesny的记载都是可信的。简又文考证后的结论是:“此种金币大概可信为真的,姑备录于此,留待详考”。耿爱德和简又文的治学态度都是严谨的。对于小型太平天国金币,我接受他们的结论。

### 五、侯厚培、陈安仁和魏建猷等人的书持肯定态度

我在阅读有关太平天国金币的前人成果时发现,对耿爱德在《中国货币论》记载的估计值银25两

的太平天国金币,中国学者的态度有两种。第一种是“否定派”,第二种是“肯定派”。

“肯定派”的代表有侯厚培、陈安仁和魏建猷。

侯厚培在所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中有如下文字:“至清时,黄金大多作饰物或用以窖藏。流用于民间者,殆不多见,史籍中亦无考者。唯金币之铸造,则亦有之:一,太平金币。为洪秀全定都南京时所发行,(1850—1864)每元值若干两,币面并未刻出。唯据估计,大约每元代表银二十五两上下。二,新疆金币。……三,西藏金币……”<sup>[6]</sup>。在这段文字之后,侯厚培没有直接注明资料出处,但在书末列出的“重要参考书”中,有 Edward Kann, *Currencies in China*。将侯厚培的这段文字与 *Currencies in China* (《中国货币论》)的文字予以对照,侯厚培的叙说可能是以耿爱德的书为依据的。曾泽禄在《太平天国金币》(见下文)一文中也是这样推断的。但也有可能另有依据。

陈安仁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中的记载与此类似:“太平金币,为洪秀全建都南京时所发行。每元值若干两,币面没有刻出。唯据估计,大约每元代表银二十五两上下”<sup>[7]</sup>。

魏建猷在《中国近代货币资史》中写道:“据《中国货币论》的作者耿爱德说:太平军‘定都金陵时,曾发行金币一种,形式似中国之古钱,币面不标明价额,估计似为二十五两。’这种金币的真实形式究竟怎样,因未见实物,暂时还不能作具体的说明;它的性质是通行的货币呢,抑是纪念币呢?也无从推断。或者是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把没收来的黄金铸成金币,作为对外通商贸易之用也未可知,所以外国人后来还看到这种金币。不过,这种金币想来铸造不会很多,使用也不会很广。”<sup>[8]</sup>魏建猷的度是谨慎的。

侯厚培、陈安仁和魏建猷认为值25两的金币,即大型金币的记载是可信的。

## 六、马定祥和罗尔纲等人的书持否定态度

“否定派”的代表除上文介绍的简又文外,还有太平天国钱币专家马定祥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

耿爱德在他的书里说,对1944年Allan在上海从李鸿章的一个后裔处得到的一枚金币,一些中国钱币专家摇头并倾向于认为是赝品或假冒币。这些专家中就有马定祥。在马定祥的生平事迹中记载,1949年,为耿爱德所藏金银币作鉴定,获允拍摄留存该批即将流失海外的珍币资料。马定祥对大型金币持否定态度,一直到他去世。他去世后,1994年

出版的、由他与其子马传德联合署名的《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中,重申这种认识,并作了详细的说明<sup>[9]</sup>。马定祥不仅对大型金币持否定态度,对小型金币也是持否定态度。马定祥、马传德父子在其合著的、198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中写道:“耿氏相信当时曾居中国的威廉氏所言是实。”“太平天国官局没有正式铸造过金质钱币。故耿氏所言之金钱不会是什么赏赐钱,因为它的文字制作还不如铜钱的规整。所以上面耿氏所谈的那些金钱,事实上都是太平天国晚期权贵富户们所造的金质冥钱,作为殉葬之用。”<sup>[10]</sup>马定祥去世后,在1994年出版的、由他的儿子与他联合署名的增订本中,则更改为麦士尼“所记述的这些情况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我们认为太平天国金币仅作为赏赐和馈赠之用,并非流通于市场的钱币”<sup>[11]</sup>。

罗尔纲在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七《食货五货币》中写道:“据外人记载,太平天国还铸有金币,其形制也与铜钱相同。惟所述论据是否可信,所见金币是真还是赝,都有问题,而至今也还没有发现太平天国文献有关金币的记载。”<sup>[12]</sup>他对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太平天国金币一律予以否定。在1997年去世之前,他没有改变过观点。

## 七、清廷军机处档案中关于从被杀死的太平军官员身上得到的“有太平通宝等字样”的金钱

199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993年,我在其中的第六册看到漕运总督杨殿邦的一份奏折,其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又据冯景尼禀报,同日派勇出队,各有斩获,并砍毙黄缎补服头目一名,搜出金伪钱一枚,有太平通宝(宝)等字样。”<sup>[13]</sup>这段文字字数不多,却解决了有关太平天国金币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此件出自清廷军机处档案,是一手资料。它是漕运总督杨殿邦给皇帝的奏折,其真实性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从奏折上的文字看,杨殿邦、冯景尼等人是见过此金币实物的,杨殿邦没有必要在这种小事上说谎来犯欺君之罪。

第二,杨殿邦给皇帝上奏折的时间是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这就是说,太平天国开始制造金币的时间是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之前,也就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后不久或建都南京之前。杨殿邦的这份奏折把太平天国开始制造金币的时间提前到1853年5月或5月之前。



第三,以往发现的太平天国金币,无论是实物,还是文字记载,币文都是太平天国圣宝,而杨殿邦的这个奏折上说的是太平通宝(寶)。这就是说太平天国制造的金币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太平天国制造金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或两次以上。

第四,杨殿邦给皇帝报告中说这枚“太平通宝”是从被砍毙的穿黄缎补服的太平军头目身上搜寻到的。这证实了前文 William Mesny 说的“每个太平天国的王首领都有一些金币,他们把金币放在随身携带的小袋里,作为礼物给予为他效劳的任何人”<sup>[14]</sup>。

此外,杨殿邦给皇帝上这个奏折时,他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阻击太平军。佚名《蕲湖笔记》记载,咸丰三年六月,在江苏省扬州,太平天国将领“邓前数日换金子一千六百两,丹徒镇金价陡贵。”<sup>[15]</sup>这说明此地此时是有黄金交易的。此文没有记述太平天国将领换金子的目的或用途,从太平天国此前已开始制造金币来推测,收集制造金币的材料是可能性之一。

从上引文字记载看,亲眼见过太平天国金币实物的,外国人有米士尼、耿爱德、菲利克等,中国人有杨殿邦及其部下,很可能还有王闳运等人。

## 八、曾泽禄的文章与存世的太平天国金币实物

1995年,我在《中国钱币》杂志该年第3期上,读到美国人曾泽禄写的《太平天国金币》一文。该文的主要贡献是列出了一部分现存太平天国金币的收藏者与收藏处。结合前文的记载,关于太平天国金币实物有如下线索。

第一,1944年,时在上海的Allan从李鸿章的一位后裔处得到一枚太平天国金币。

第二,芝加哥的高祁氏(A.C.Keefer)藏有一枚太平天国金币。

第三,伦敦大英国博物馆藏有一枚太平天国金币,是一位加拿大钱币商在1974年间(或以后)售给博物馆的。曾泽禄估计,“这一枚金币可能是耿氏的原藏品”。

第四,纽约美国钱币协会博物馆藏有太平天国一枚,是在1900年左右由一位美国藏家捐赠的。

第五,1992年前,日本一位藏家从台湾转手购得一枚金币。

第六,曾泽禄于1990年代初得到一枚。

上述六件,第一件是大型,其他都是小型。这样一来,存世的小型太平天国金币实物已经不是孤证了。对这六件实物,人们还可以逐一地予以考证。

## 九、可以做结论的和有待今后探讨的问题

通过学习上述文献资料,对于太平天国的黄金货币,我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一)太平天国的黄金货币(简称太平天国金币)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是从战国时期到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历代政府和市场上都作货币使用和具有货币全部职能的金锭、金条、金饼和金叶。第二种是仿效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铜钱(制钱)形式而制造的、上有“太平天国”字样的金币。前者可称之为传统形态。后者可称之为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比较,现代形态的特点是规范化:币材统一,币形统一,币重统一,币文统一,币值统一,因而更便于使用。“太平天国的黄金货币(太平天国金币)”这个概念的内涵,广义的,包括传统形态和现代形态两种;狭义的,专指现代形态这一种。无论就经济学意义,还是历史学意义,都以广义的内涵更为科学。但在钱币学界和太平天国史学界,通用其狭义的内涵。因此,下文所说“太平天国金币”,除说明者外,均指现代形态。

(二)太平天国使用过传统形态的金币

对此,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三)太平天国制造过现代形态的金币(下文简称“太平天国金币”)

在这方面,有使用过太平天国金币的外国人 William Mesny 的记载,有在太平天国境内生活过并握有太平天国金币的外国人 Filicule 的证词。有与太平天国同时代的中国人(王闳运)的私人记载。有清廷档案里藏的清政府官方文书,其中叙说了清军军官(杨殿邦、冯景尼)缴获因而见过的太平天国金币,这是最有力的文献证据。存世的太平天国金币有多枚,这是最有力的文实物证据。

(四)太平天国制造的现代形态金币的币形与重量(币重)

文献资料和实物都说明,太平天国制造的现代形态金币,其具体样式,如上文所述,是仿效明、清两代的制钱,也就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铜钱,外圆内方,其方孔有穿透和未透之别。

太平天国金币按币的重量区分,有轻重两种。

轻的,伦敦大英国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重12.42克。曾泽禄收藏一枚,重12.80克。这两枚太平天国金币的图片与耿爱德书中的图片相对照,它们的形状、大小与币文等等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说明:第一,它们都是可信的;第二,这些金币可能是用模子铸造的。重量上的微小差别,是手工铸造金属货币

常见的现象。小型的币形与重量应无疑义。

重的,耿爱德所著之书提供了一种太平天国金币正背面图片,其说明文是:“(约)1860年。太平天国金币二十五两(无纪年),直径31毫米;厚2.125毫米;重37.3克。”耿爱德对此币“持保留态度”。马定祥父子持否认态度。耿爱德在《中国币图说汇考》书中还介绍了钱币学家何道华(Woodward)所说的太平天国金币实物,重一库平两(37.32克)<sup>⑦</sup>。两枚大型金币重量的平均值是37.31克。

重的形体大,轻的形体小,按形体区分的则为大小两种。

#### (五) 太平天国金币上的文字(币文)与币名

1.小型的,币文有两种。第一种是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品与曾泽禄收藏品,二者均有图片,正面“太平天国”,背面“聖寶”。耿爱德的书中也有相同的图片。第二种是漕运总督杨殿邦奏折中写的“有太平通宝等字样。”这个“等”字说明他没有将币文全部写出来。因为“天国”称国是忌讳。完整的币文应该是“太平天国通寶”。

以往发现的太平天国金币,无论是实物,还是文字记载,币文都是太平天国圣宝,而杨殿邦的这个奏折上说的是通宝。太平天国制造的货币,无论是铜币抑或银币,其币文,在初期是沿用“通寶(宝)”,后来才改成“聖寶(圣宝)”。这个“圣”字,如同“圣库”“圣粮”“圣兵”等称谓中“圣”字一样,带有拜上帝教的宗教内涵,是太平天国独有的称谓。

2.大型的,币文只有一种。即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中提到的“太平天国金寶”。

小型的币文应无疑义,大型的币文还可进一步探讨。

#### (六) 太平天国金币开始制造的时间和制造次数

太平天国金币的币文,既有“太平天国通寶”,又有“太平天国聖寶”,可能还有“太平天国金寶”。这说明太平天国铸造金币至少有两次,还可能是三次或三次以上。其制造开始的时间,“太平天国通寶”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之前;“太平天国聖寶”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之后;“太平天国金寶”据耿爱德书中的说法,是在1860年之后。

以上几项证明了太平天国金币是太平天国官方制造的。

#### (七) 太平天国金币的货币单元

对太平天国金币,一般都以“枚”计量。如漕运总督杨殿邦的奏折:“并砍毙黄缎补服头目一名,搜出金伪钱一枚,有太平通宝(通寶)等字样。”这是中国清朝的官方文献。简又文的著作《太平天国典制

通考》及其中的相关译文,是以“枚”计量。这是中国人的私人著作。钱屿和钱卫翻译的《中国币图说汇考(金银镍铝)》,是以“枚”计量,这是中国人的译作。曾泽禄的文章《太平天国金币》,是以“枚”计量,这是美籍华人的论文。外国人的私人记载亦如此,如耿爱德写的《中国币图说汇考》。

在前引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中,有如下文字:“赤金叶条饼锭首饰实存金十八万四千七百两”“领取买菜钱,多至金一、二两”。这条资料证明,太平天国圣库对传统形态金币(如金条、金锭等)储藏量的统计和使用(支付)量的记账,沿袭清代用金币以两为单位。太平天国文献中,使用金币以两为单位的事例不少,如:“私藏金一两、银五两者皆有罪。”“先是传伪谕,令人进贡给单,使贴门墙,则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这类资料在赵德馨著《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中收录甚多,无需列举。

在前引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中,有如下文字:“太平金币。为洪秀全定都南京时所发行,(1850—1864)每元值若干两,币面并未刻出。唯据估计,大约每元代表银二十五两上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每元(圆,下同)”中的“元”字,涉及到太平天国金币的货币单位或计值单元。

太平天国对银元宝、银锭等传统形态的、称量使用的,沿用传统称谓“两”和“钱”。对所铸银元则称元,一枚银币称为一元。对所铸大型的铜钱也称元。如:天朝九门御林忠王宗爵天义李明成给英国翻译官福礼赐的两封信中都提到送钱的事。第一封是天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信中写道:送上“银钱貳拾元,青钱拾元。”第二封是天历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信中写道:送上“大花钱壹元”“圣钱壹元”<sup>[16]</sup>。信中所说“青钱”“大花钱”“圣钱”都是铜币。形体大如银元或比银元还大。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对其所铸银币称为银钱,对大如银元或重一两的银币的货币单位称之为元(曾泽禄在《太平天国银币》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的银币有大和小两种。李明成送给福礼赐的当是大的一种),银币一枚称之为元。对其所铸大如银元的大型铜钱亦称元。据此,对大如银元或重一两的大型金币也称元,是合乎它的习惯的。

在1850年代至1860年代,在政府层面和市场上,使用白银的计值单位是“两”,从国外流入的银元,折合成银两计值。在民间,也有称银元为元的,但不普遍。至于称铜钱为元或称金钱为元的,就目力所及,尚未见过。太平天国称所铸银币为元,称所

铸大型铜钱为元,称所铸大型金币为元,这是一种新情况。大型银币重库平两半两(见曾泽禄《太平天国银币》),为什么不称半两而称为元?大型金币重库平两一两,为什么不称两而称为元?这里是否蕴涵着将货币单位改为“元”和计数使用的可能性。金属铸币由计重使用到计枚使用,计值单位由重量到计数单位,便于使用,是货币演变的历史趋势。

#### (八)太平天国金币的价值

1.市场上的金银比价。上文所用文献资料都用金银比价来说明金币的价值,这是正常的情况。因为,在太平天国时期及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截至1934年),无论在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或市场层面,对金的价值都是以银计值和以两为单位的。金币的价值是用金银比价来表达。所以讨论太平天国金币的价值,首先要弄清楚太平天国时期的金银比价。侯厚培在其书中的记载是,咸丰年间,平均1比15.30;同治年间,平均1比15.50。曾泽禄在《太平天国金币》一文中也说:“在1860年间,市面上金与银之兑换率为1比15”。太平天国境内的金银比价也与此大体相同。佚名《避难纪略》中的记载,江苏省常熟县,同治元年(1862),“惟金尚可。每金一两兑制钱二十七、八千文至三十千文。宝银每两兑制钱一千七、八百文。”据此计算,金银比价是1比16.324(30/17与27/18的平均值)。

2.小型金币的价值。耿爱德在《中国币图说汇考》提到,William Mesny在其所著的书里写道:“金钱……一枚等于值五两银子或五枚西班牙本洋。”Filicule说:“这种金钱在太平天国十三年(1863年)时可值五两银子。”前文已提到,这种小型金币,伦敦大英国博物馆藏的一枚重12.42克。曾泽禄收藏的一枚重12.8克,约为三分之一两。1860年,市面上金与银之兑换率为1比15~16,所以太平天国金币重三分之一两,恰好可换5两银或5枚银元,留传下来金币与史料契合。这就是说,小型的太平天国金币的重量12.61克(伦敦大英国博物馆收藏的一枚与曾泽禄收藏的一枚的平均值),其价值是以它的黄金重量为准的,它是一种贵金属铸币。

3.大型金币的价值。上文提到的两枚,一枚重一库平两(37.32克),值25两白银,一枚重37.3克。“币面不标明价额,估计似为银二十五也。”这两枚金币的价值都是25两白银。此外,耿爱德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货币论》中已提到的太平天国金币,其价值也是25两白银。

4.小型与大型两种金币之重量与价值的比例。两枚小型金币重量的平均值为12.61克,两枚大型金

币重量的平均值为37.31克,大型是小型的3倍(12.61克 $\times$ 3=37.83克)。按黄金实物的价值,小型金币的价值为5两银子,则大型金币的价值应该是15两银子。为何何道华、耿爱德、侯厚培都说其价值是25两白银?对此的解释可能有两个:一是何道华、耿爱德、侯厚培的笔误或疏忽。从他们的学识和治学态度来看,不应该发生此类事故。从逻辑上推敲,不同国籍、不同年代的三个学人,在同一的数据上发生同一的笔误,可能性极小。二是太平天国的规定。若此,则大型金币是为了敛财目的而发行的虚额货币。是否如此,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问题。

#### (九)太平天国金币的性质

太平天国金币的性质,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币形、币文、币重、币值与使用方式来看。二是从货币的职能来定性。在这个方面,有不同的判断。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具有购买功能或流通手段职能。

马定祥和马传德合著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在1983年第一版中认为:“耿氏所谈的那些金钱,事实上都是太平天国晚期权贵富户们所造的金质冥钱,作为殉葬之用。”在1994年增订本中则更改为“用作赏赐和馈赠之用,并非流通于市场的钱币。”2001年,“南大历史系茅家琦教授现认为,太平天国铸造金币是肯定的,但有流通和非流通之分。看太平天国金币照片应是非流通的收藏宝物。”<sup>⑧</sup>

前引《贼情彙纂》表明,太平天国将金、金首饰、银、银首饰与铜钱一起放在圣库里,都视作货币。文献还表明,太平军官兵用金、银首饰换成钱购买日用食品。用黄金购买食品,要先换成铜钱,是因为黄金是贵金属,价值量大,食品价值量小,直接交换不方便。如若用黄金购买的商品价值量大,则可以直接成交。早在战国时期,《管子》中有用黄金买粮食的记载。出土的楚国文物中有用黄金买粮食的记载。1948年至1949年,有用金条若干购买房产和棉纱若干包的记载。因此,将黄金先换成铜钱再去购买食品的情况,并不否定黄金具有购买功能。

上文所引《避难纪略》中的记载说明在太平天国境内黄金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铜钱。《蕲湖笔记》的记载太平天国占领下的江苏省扬州是有黄金交易的。Filicule的记载说明出让一枚太平天国金币取价五两银子。这些资料说明在太平境内存在着黄金交易市场,黄金随时随地可以换成白银或铜钱,以便购买价值量小的商品。William Mesny记载一些外国人将太平天国金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作为应急之用。”杨殿邦的部下从一名被砍毙的穿着黄缎补服



太平军头目身上搜出金钱一枚,是这种“为应急之用”的证据。如若金币没有购买功能,它们就起不到“为应急之用”的作用。

耿爱德在 *Currencies in China* 这本书中,将“太平天国之金币”归属于“近代实际流通之金币”一类。曾泽禄在上引文中认为,太平天国金币不仅可作为赏赐馈赠之用,也可以用来作货物买卖交易之用。William Mesny 在 1862 年被太平军俘虏过,在南京住了一年多。在 1866 年写的文章中说道:“我曾亲见中国金币,虽然这些金币并不是很普遍地使用流通。这些金币……由太平天国政府在南京铸造,一枚金币等于银五两或五枚西班牙本洋银元……在 1863 年,他们要我用银五两来换一枚金币。”太平天国金币“不是很普遍地使用流通”。这是因为它属于贵金属货币中最贵的一种,价值高。因此,一方面,不是多数人拥有;另一方面,也不适用于日常小额交易。从 William Mesny 的经历以及上引资料来看,他的这个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十)一点困惑与反思研究方法

在我认识太平天国金币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长期想不通,即在史料记载如上文所列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学者,特别是太平天国史的权威性学者和太平天国货币权威性学者,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金币持否定态度。这涉及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广义的太平天国金币,即包括中国传统形态的金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史记》记载的楚国“三钱之府”,是楚国的国库。“三钱”即三种颜色的钱。黄色之钱为金钱,白色之钱为银钱,赤色之钱为铜钱。出土的楚国货币已证实,楚国确实有这三种货币<sup>[17]</sup>。其中的黄金货币有板(叶)状和饼(块)状。战国时期的金币已具有货币的全部职能<sup>[18]</sup>。

《史记·平准书》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分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汉兴)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金布律》竹简证实秦的货币有三种:黄金、布(疋)和(铜)钱。《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这些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都明确指出黄金是钱,是币。出土的秦汉金币,除汉武帝时铸造的特种金币用马蹄、麟趾形式外,皆为饼状。可见,至迟从战国时期开始,历代的政府都将金钱与银钱、铜钱一样,认定是货币。在国家的国(钱)库里,将它们放在一起。秦汉之后,金币的形态有演变,唐宋有金铤。近代多用金条。但它们都是货币。这就是说,

在中国历史上,金板、金叶、金饼、金铤、金条都是黄金货币的具体形态。对于这一点,自古无分歧。今之中外钱币学者、货币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也未见异议,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或常识。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是一般的史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没有不看它的。《贼情汇纂》中对太平天国国库中的货币记载以及太平军用黄金购买食品的记载,很具体,很明确。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长期以来不承认有太平天国黄金货币呢?此中的原因,我推测(只是推测)是对中国黄金货币形态演变的历史缺乏了解。这是可能的,因为种种原因,某些历史学家的知识太专了,只熟悉自己专注的那件事物及其年代,对该事物的前身后世不甚注意。看来,研究历史上的问题,求通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

第二个层面是狭义的太平天国金币,即按明清铜钱形态制造的黄金货币。如上文所述,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记载太平天国金币的文字,中国人写的,最早的是 1853 年清朝官员杨殿邦向咸丰皇帝写的奏折,他称之为“金伪钱”。这个“钱”字指明了币形。“有太平通寶(宝)等字样”,则记载了币文。二者都很具体、明确。后来有王闿运写的、1885 年出版的《湘军志》,明确地指出是湘军官兵从太平天国那里夺取的“金币”。外国人写的,有 William Mesny 在 1866 年写的文章,对太平天国金币描述得相当具体。从这些记载到“对太平天国是否铸造过金币”仍作为谜团的 2001 年,相距已一个世纪至一个半世纪。为什么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一些学者不承认它的存在呢?细心地考察其原因,便能发现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对待前人的记载或研究成果,不是在大胆怀疑的前提下,小心求证,以辨别其真伪,而是在未辨明其真伪的前提下,大胆地说“不”,说“非”,说“无”,说“没有”。以对 William Mesny 的记载为例,不是从考察他的经历入手,看看他有无亲身接触太平天国金币的可能,他一生所记有无说谎话的事实(记事的态度),他在记载有关太平天国金币一事上有无说谎的必要(动机),而是首先来个“不见中国人的记载”来予以否定。说出“不见中国人的记载”这种话是很大胆的。“中国人的记载”这么多,在我们没有看完之前,怎能说出“没有”二字?前引杨殿邦的奏折,不是中国人的记载吗?王闿运的《湘军志》,不是中国人的记载吗?事实是,不是没有中国人的记载,而是我们没有用功夫去找它们,或者找到了,看过了,却视而不见。再以对太平天国金币性质的认识为例。某些学者,先是以“没有太平天国金币的实物”否定太平天国有过金

币。事实上,不是没有太平天国金币的实物,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此其一。其二,对历史上的事物,不能都要求见到实物才承认它的存在着。如若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实物便否定它的存在,不是求真的态度。对别人亲眼看到的或拥有的实物,在没有提供充分的反证情况下便予以否定,也不是求真的态度。在太平天国金币的实物摆在那里,无法否定时,又说它没有流通职能,得出它不是真正的货币的结论。马定祥、马传德父子先是认定耿爱德“所言之金钱不会是什么赏赐钱”“事实上都是太平天国晚期权贵富户们所造的金质冥钱,作为殉葬之用。”后来改为“我们认为太平天国金币仅作为赏赐和馈赠之用,并非流通于市场的钱币”。这种更正认识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先前的太平天国金币“都是太平天国晚期权贵富户们所造的金质冥钱,作为殉葬之用”之说,实在是太大胆了。因为至今尚未发现过那位太平天国晚期权贵富户的墓中出土了作为殉葬之用的太平天国金钱。“太平天国金币仅作为赏赐和馈赠之用,并非流通于市场的钱币”,以及茅家琦教授从英国博物馆所藏有太平天国金币照片上看出太平天国金币“应是非流通的收藏宝物”,也是很大胆的判断。因为,上文所引文献资料记载得很明确,太平天国金币是有购买功能的。以上的事实证明王力教授等前贤说的,做学问“说有容易说无难”,是很有见地的。我将它列为学者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之一<sup>[19]</sup>。在此,还必须说一句,对待前人的记载或研究成果随便地说“不”“非”“无”的这种思维方式,非常不利于学识的积累,也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多而科学发现少,很可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系。■

### 注 释

- ① 作者在编辑《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一书时,由于疏忽,太平天国金币小目下,用的是删下来的部分(重复的,未经考证的),而不是定稿部分,遗漏了一部分有关资料,现通过此文补上。
- ② 另一种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根本上是所有者相互之间的约定。
- ③ 作者在《论战国时期金币的性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战国时期,金币有多种形态,都不是铸币,可是履行了货币的全部职能。
- ④ 在1948—1949年4月,因法币恶性通货膨胀,上海等“大城中的大宗交易多以黄金美元计算”价格(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M].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503)。
- ⑤ 谭彼岸先生1991年移居美国,仍从事著述。
- ⑥ 芝加哥高祁氏 A.C.Keefer,或译作“芝加哥的基弗氏 A.C.Keefer”,有的译作“唐.C.基弗氏 Don.C.Keefer”,待考。
- ⑦ 耿爱德指出,何道华引用了詹美生(R.Alexander Ja-

mieson)论文,而论文中说的却是太平天国没有铸造过金币。可“何道华的研究一般是非常准确的”。这是一个悬案。我估计是在引文出处上发生了错乱。何道华说太平天国金币实物重一库平两(37.32克),价值25两白银,说得很具体,必有所据。只不过所据不是詹美生的论文。

⑧ 直到2001年在广东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太平天国有无铸金币仍是作为历史谜团(太平天国有史上三大谜团之一)在讨论。现英国博物馆还藏有该金币实物。但国内尚未发现太平天国铸金币记载,也未见实物,史学界一直存疑。南大历史系茅家琦教授现认为,太平天国铸造金货币是肯定的,但有流通和非流通之分。看太平天国金币照片应是非流通的收藏宝物(《专家对太平天国三大谜团作出新解》,龙虎网,2001-12-13)。

### [参考文献]

- [1] 张德坚.贼情彙纂(卷十《贼粮》)[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三册)[M].神州国光社,1952:278-279.
- [2] 张德坚.贼情彙纂(卷十《贼粮》)[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三册)[M].神州国光社,1952:277-278.
- [3] 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M].光绪十一年成都墨香书屋刻本.
- [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583.
- [5] 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33:268.
- [6] 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M].世界书局出版,1930:32.
- [7] 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33.
- [8]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黄山书社,1986:68.
- [9] 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43-146.
- [10] 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32-133.
- [11] 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08.
- [1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册)[M].中华书局,1991:953-954.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六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79.
- [14] 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金银镍铝[M].钱屿,钱卫译.金城出版社,2014:645.
- [15] 罗尔纲,王庆成.太平天国(第五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 [16] 赵德馨.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84.
- [17] 赵德馨.楚国的货币[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54+325.
- [18] 赵德馨.战国时期金币的性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84(1):89-96.
- [19] 赵德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

# 元代对纸币的管理制度、治理措施及启示

■ 苏利德

(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

元朝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东西方贸易和海陆交通都比较发达,为了适应和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巩固其自身统治,元朝政府在总结宋、金纸币发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纸币管理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统一的纸币作为基本货币的朝代。而且纸币的使用也打破了地域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而且还输出到周边邻国。这不仅在中国是个开创之举,对世界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为了维护纸币的良好信誉和合法性,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及方法防伪,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元代纸币造假仍泛滥成灾,纸币最终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虽然由货币制度引起而最终造成了元朝政治财政上的失败,但其制度上的进步性不容否定,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 一、元代对纸币的管理制度及措施

(一)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制定和完善钞法的法律条文

中央由户部主管,下设的纸币管理机构主要有:至元二十五年,设宝钞总库,主管纸钞的贮藏;中统四年,设印造宝钞库,主管纸币的印造;至元元年,始置昏钞库,二十四年,又分立烧钞东、西二库,主管纸钞的销毁;此外还设有行用六库,专门负责纸币兑换<sup>[1]</sup>。地方也设有各路平准库、诸路宝钞都提举司等机构。主管纸钞的印制发行、金银兑换和平准物价。

元政府以诏令形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管理措施。至元十九年(1282年)出台了《整治钞法条画》九条,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拟定《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条。它们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制纸币流通,规定无论是政府税收还是民间交易,均“以宝钞为则”“无得该写斛、粟、丝、棉等”;禁止民间或私下金银交易,“买卖金银,赴官库依价回易倒换,如私下买

卖,诸人告捉到官,金银价钞全行断没”<sup>[2]</sup>;强调国家的金银储备,定期检查平准库的准备金储存情况;严惩富商大贾高抬物价以及管理官员通同作弊的行为。这些“条画”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元代的纸币管理制度的全貌,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完备的币制条列<sup>[3]</sup>。

### (二)严惩伪钞犯罪行为

至元五年七月,博州路聊城县一个叫石治民的人,用瓦片雕成“司天台印一颗”,在木头上雕出“至元年月日”等字样,又先后雕成五百文、五十文、二十文伪钞板印各一副,两次自行印造伪钞数累计达“二十一贯四百九十文”<sup>[4]</sup>。至元七年十一月,石治民被依律处死。这是元代史料中时间较早、记载颇为详细的一个伪钞案。伪钞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元朝政府,它严重损害了纸币的信誉,扰乱了金融秩序。元朝在大肆奖赏检举、揭发者的同时,更采取了近乎严酷的措施来防范和惩处伪造行为:

其一,对于伪造纸币者,元朝统治者一开始还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来科刑:如果伪钞“堪以行使”,则为首处死。其他从犯处以杖刑;如果伪造的纸币技术低劣,“不堪行使”,则为首的处“流远”,其他从犯也处以杖刑。至元七年二月,德州一地司都喜、苏瘦儿等七人涉嫌伪造纸钞,涉案金额达九百五十贯之多,最后因“不似真钞,难以行使”而都处以流刑。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统治者认识到“所定法轻”,以致出现“经断不改之人”“伪造之人甚多”,便加大了惩治力度,规定无论是“首谋起意”之人,还是那些从事“雕版抄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之人<sup>[5]</sup>,一律处死,并没收其家产。同时规定了严格的连带责任制度,对于涉案地的“坊正、主首、社长”以及“巡捕军兵”“捕盗官”“巡捕军官”都给以相应的处罚。

其二,对于购买并使用伪造的纸币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



其三,对于收藏伪造货币者,“减一等”论处。

其四,对于变造货币者,即“诸挑剥裨褻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则流放辽阳、高丽等荒远之地。

此外,元朝统治者还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对于那些尚未归案的伪钞案犯,“依强盗立限缉捕”;规定伪钞案犯不得适用赎刑等;天历元年,大赦天下,但诏书中特别说明,“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sup>[6]</sup>把伪钞犯排除在赦免的范围之外。可见,当时朝廷已经把伪钞犯罪摆到与“十恶”同等的地位了。

当然,元政府在强调重典治罪的同时,在实践操作中也不乏灵活的一面。伪造之人,如有悔过、自首表现的,可以免罪。如果确实属于犯罪未遂的,也可以考虑从轻处罚。至大四年十月,袁州路宜春县戴荣、甘元亨两人伪造“至元二贯伪钞印版一片”<sup>[7]</sup>但最后因“不曾印造”而只处以杖刑。

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元代惩处纸币造伪的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当时出现的各种伪造纸币的现象,诸如对雕版伪造、挑补伪造、买使伪钞、买使挑钞、知情不报、渎职官吏等犯罪行为,以及涉案的主从犯的处罚,均有具体明确的处罚规定。中统二年(1261年),元政府颁行了《元宝交钞体例》,规定:伪钞者斩。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颁布了《整治钞法条画》、《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等法令,明确规定宝钞是法定货币,只能由政府发行,不得伪造等条文。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颁行《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条画》,明确规定:诸伪造宝钞,首谋起义之人并雕板、抄纸、收买颜色、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但同情者,并行处死,仍没家产,会赦不原。《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诈伪》、《元典章》卷二十《户部六·钞法》都对造假、买使伪钞、窝藏造伪者给予各种处罚直至死刑。这些法律条文无论是从制度、政策及纸币管理的思想上看,都是空前的,且达到了成熟的水平。

(三)建立了完备的昏钞管理和管钞官员管理制度

纸币使用时间长了,容易破损昏烂,不利于流通使用。为处理这些昏钞,中统元年元政府在大都设立行用库(后改称回易库),负责经办以昏钞换新钞的业务,百姓可以持昏钞到回易库倒换。当时规定:凡持有昏钞者,如果经钞库官员验明确系真钞,即可直接置换新钞,每贯只需交纳工墨费三十文即可,库官在昏钞上加盖“讫退印”<sup>[8]</sup>以示作废。大德二年(1298年)三月,中书省户部订立了25条《倒换昏钞

体例》,为伪钞、昏钞作了明确的区分与界定,从而使辨伪工作有法可依。元政府规定倒换昏钞,一般“每日于卯时开库”<sup>[9]</sup>。回易库的设立,既方便了百姓倒换昏钞,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伪钞的使用和泛滥,有利于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管钞官员能否奉公守法,是纸钞能否正常发行、流通的重要环节。因此,元政府制定了一套约束、惩治管钞官员的措施。一是制定惩治钞库官员徇私舞弊办法。《元史·刑法志》载:倒换“昏钞”时,库官不守法度,“以自己昏钞,诡名倒换者,答三十七,记过。诸平准行用库倒换昏钞,多取工墨钱,库官知而不曾分赃者,减一等,并解职别叙。主谋而又受赃者,以枉法论,除名不叙”。二是定期检查管理钞库的官员。至元十九年规定,各路“管民长官”每月要对钞库官吏之管钞情况检查一次;至元二十四年,又改令每半月检查一次。三是实行地方官员监管制。元政府规定,各级地方官要对纸币的行用情况进行监管,各行省宣慰司、各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等管民长官,要用心执行关于纸钞的各项“禁约”。

元朝初年,纸币的发行受到严格的制度控制,“印造有数,俭而不溢。”<sup>[10]</sup>从每年的印钞数量来看,“中统元年,中统钞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二年,中统钞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九锭……十年,中统钞一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二锭。”由此可见,元初的十几年内,纸币发行量基本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即十万锭左右,所以,中统钞“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sup>[11]</sup>。当时市场流通顺畅,物价平稳,堪称元朝纸币的黄金时期。但从至元中期起,由于战争、赏赐等名目众多且数额巨大,元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来维持。至元十一年,中统钞发行二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锭。由此开始,一路攀升,至元二十三年,中统钞发行量达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是中统元年发行量的三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进行钞法改革,当年即发行“中统钞八万三千二百锭,至元钞一百万一千一十七锭”,折合计算是中统元年发行量的一百一十倍。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三百六十八锭,折合计算是中统元年发行量的四百九十四倍。越到后来,越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sup>[12]</sup>。这样漫无限制的滥发纸币,使纸币的流通量成倍增加,“楮日多而日贱,金帛珠玉等日少而日贵”,纸币不断贬值,结果是“物价腾踊,价逾十倍”<sup>[13]</sup>。

造成管理失控,滥发纸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生产萎缩,商品供给不足。在货币流通速度不

变条件下,要保持币值稳定,货币发行量应与社会商品总价格成正比。可是,在元代中后期,一方面政府大幅增加纸币发行量,另一方面社会商品生产却陷入萎缩,两者背道而驰。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曾发生天灾513次之多;土地高度集中,租税异常沉重,元后期的税额比元初增加了二十倍以上。这使得民不聊生,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商品供给的不足,出现“物重钞轻”的局面,引起物价上涨。二是财政开支庞大。元代年年用兵,大肆征伐,军费庞大,财政压力巨大。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大举南征,仅自元旦至二月中旬已支付军费五十万锭,即两千五百万贯,等于唐天宝年间全国税收的十倍。财政亏空严重,朝廷却以滥发纸币来填补,结果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三是动用纸币发行准备金。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关键在于具有与纸币发行量等同的准备金。没有准备金或不能以兑现的方式调节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则纸币几乎成为废纸。元政府在前期曾建置准备金,但自至正十三年(1276年)以后,存贮于各处的金银逐渐被挪作他用,发钞无所依凭,钞所以日轻。

## 二、元代纸币管理失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原因及补救措施

元代纸币管理失控及伪钞的大量出现,对元朝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大量伪钞的存在及泛滥,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损害了百姓的利益,也使货币制度混乱不堪。伪钞的存在及泛滥,严重威胁和破坏着纸币的信用,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也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更损害了百姓的切身利益。政府发行纸币虽加以控制数量,但假币大量充斥流通市场,导致纸币购买力迅速下降,物价急剧上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也加速了货币制度的败坏和混乱。

其次,加剧了通货膨胀。元初发行纸币,由于政府采取了得力的货币政策和管理办法,从而保证了币值稳定,使其获得了良好信誉,流通范围迅速遍及全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这种良好局面随着元统治者不断动用钞本,且无限制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后又有大量伪钞进入流通领域,纸钞贬值日甚一日,使元初纸币所建立的良好信用破坏殆尽。

再次,伪钞现象腐化了元朝官吏队伍,加深了社会矛盾。在贯彻和执行“钞法”的过程中,一部分官吏不是去积极维护法律权威,而是见利忘义,贪污纳

贿,与造伪者相互串联,为虎作伥,视国法为儿戏;为了邀功请赏,又经常转嫁罪名,人为制造冤假错案。这种腐败之风严重削弱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加剧了伪钞的泛滥,更加促进了元朝统治的崩溃。

造成元代纸币管理失控及伪钞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纸币造伪有暴利可图。纸钞是元朝政府强制流通的最主要合法货币,百姓持纸钞可以交易万物,购买自己所需的任何物品。正因如此,才使造伪者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铤而走险,变造伪造纸钞。甚至有些官吏和王侯将相也见利忘义,与造伪者相互串联,牟取私利。

第二,政府管理不善,使制度与措施废弛。设立回易库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倒换昏钞,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但由于回易库多设在大城市或经济发达之处,结果就给地处偏僻或经济落后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地不便,也给造伪者以伪充真、以伪换昏提供了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倒换昏钞的作用大打折扣,“回易”制度名存实亡。这种局面造成了市面上“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昏伪混杂,真假难辨”,为伪钞的流通提供了便利。

第三,吏治腐败加剧了伪币泛滥。元代造伪之风之所以泛滥,与官吏队伍的腐败有着直接关系。一是有些官吏收受贿赂,不但放走造伪者,而且为了应付上司追查,竟然张冠李戴,官报私仇,草菅人命。二是有的官吏被造伪者收买,与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成为造伪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有的王侯将相与造伪者串通一气,为他们提供保护伞。三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使国家的货币制度不能顺利执行,防伪措施流于形式。

第四,赋税繁重,百姓被逼造伪。元政府为了保证纸钞的权威性,增加货币需求量,规定举凡酒、醋、盐、铁、门摊等税,以及各种赋税征科上,逐渐由白银、实物改为全部纸币缴纳。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佚的生活,不断增加税收的种类和数量,根本不顾人民死活。人民无可缴纳,或者自杀,或者逃跑;一部分百姓为求一线生机,不得不冒险造伪。

第五,印钞工艺简单、成本较低,技术容易掌握。造伪者屡禁不绝与当时的造伪技术要求不高有很大关系。元初以木板钞版印制的中统钞较为粗糙,质量也较差,纸张使用的是棉质纸,而且不同面值的纸钞图案几乎相同。虽然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用质地坚韧的桑皮纸印制,钞版也改为不易损

毁的铜版,以后又逐步改进印制工艺,使钞票图案复杂化,以防伪造。但由于元代的造纸、刻印书籍业较为发达,纸价低廉,造伪技术也容易掌握,这样就形成了“惟钞用本之轻,故伪造者纷然”的造假局面。

面对全社会的纸币管理失控及造假蔓延之风,为打击造伪者,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元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制定和完善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钞法及纸币造伪惩处的法律条文,对当时出现的各种伪造纸币的现象均有具体明确的处罚规定。

其次,建立了完备的昏钞管理和管钞官员管理制度,为伪钞、昏钞作了明确的区分与界定,从而使辨伪工作有法可依。同时,回易库的设立,既方便了百姓倒换昏钞,又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伪钞的使用和泛滥,有利于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再次,制定各种奖赏制度来调动全社会打击制造假钞的积极性。为有效打击造伪犯罪,元政府实行了对捕获、检举造伪者予以奖赏的制度。捉获、检举伪造纸币者的奖赏,视捉获、检举犯罪者所犯罪行的不同而有区别。至大四年四月,元政府颁布《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条画》,其中规定:“告获印造伪钞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告捕挑剌补凑者,赏中统钞十锭,犯人名下追给。”<sup>[4]</sup>为督促抓差办案官兵尽职尽责,元政府规定如果抓获了造伪者,那么虽为份内之事,但亦可得到常人一半的赏钱。为分化瓦解造伪者,元政府还规定:“诸造伪钞,其事未发自首者,除其罪;能自捕获同伴者,减半给赏。”<sup>[5]</sup>对官吏打击伪钞有功者,可作为政绩而得以晋升。

第四,针对早期纸钞图案雷同,制作粗糙等漏洞,改善了制作工艺,力图使伪造者无机可乘。元早期纸钞的设计单一,无论多少面额格式完全一样,只是在尺寸、面额文字和钱贯、边栏图案上略有区别。后新钞增添了“中统元宝,诸路通行”蒙古文字,还把壹贯文省的图案由原来单雷纹改为蕙草、伍佰文和叁佰文的由斜角雷纹分别改为宝象花和四角雷纹、贰佰文由原蕙草改为抹楼花、壹佰文由原四角雷纹改为万字等等,这些添加的“官造花纹,字样俱极精巧”,加大了民间伪造纸钞的难度。

### 三、元代纸币制度管理的启示及借鉴作用

分析元代的货币制度,尤其是纸币制度的管理,对今人有一定的启示。尽管元政府纸钞防伪收效甚微,但其对钞法的整治,以完善和严密而著称于世,后来还成为许多国家制订纸币管理制度的重要借鉴。研究元代的纸币制度,分析其成败得失,对当代

货币金融制度、政策的完善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一)纸币的发行量必须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纸币是商品经济一定发展的产物,纸币的发行量如与社会生产、商品流通相适应,就能够促进生产和商品的交换。反之,元代后期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只能加速其财政和经济的崩溃,这是元代货币制度留给后代的深刻的教训。鉴于元代最初发行纸币因拥有充足的准备金,因而取得了理想效果。所以,在发行纸币之时,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这恰恰是使货币稳定的基本保障,而且必须做到准备金不被挪用,以免造成纸币贬值,物价波动。同时,币制改革应循序渐进,避免因不恰当的改革措施使得制度与经济情况不相适应,最终造成货币制度的崩溃。

#### (二)保持纸币的稳定性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为使人民币更具竞争力,必须使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增加在世界货币市场中的份额。对于纸币的发行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发行量要遵循货币流通规律,避免发生货币危机。历史上因纸币发行量过大,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也并非元代所独有。鉴于元代“零钞不行,物价自重”的现象,在纸币发行大小面额的安排和各自发行的数量上也要尽量合理,各种卷别适度、适量。

(三)要制订正确的货币政策和纸币管理制度,使纸币在流通中保持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正确的货币政策需要正确的货币理论为指导,而正确的货币理论必须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有利于人民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出发,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 (四)严厉打击伪钞,以维护人民币的信誉

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增强人民币防伪性能。要加大对人民币防伪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大量运用新技术从纸张、油墨及印刷工艺等方面增加人民币的防伪性能,定期翻新人民币版本、调整更新人民币防伪标识,使得伪造人民币现钞的成本和难度增加。二是进一步加大对伪造、贩卖假币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反假局面。三是不断强化国际间的反假交流合作。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制贩假人民币犯罪分子将不仅局限在中国国内,国外伪钞制造者也会因巨额利润的诱惑而加入进来。为维护人民币国际声誉,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分阶段逐渐扩大人民币反假(下转第14页)



# 三国时期钱币铸行及通货膨胀成因探究

■ 雷玉宁 胡永峰 丁安国

(湖北省钱币学会)

三国时期,割据纷争,经济不稳,是中国钱币发展进程的低潮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并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都各自铸造了新的货币。三国钱币具有“一少、二杂、三劣”的特点,并出现了中国金属铸币时期的第三次通货膨胀,社会经济处于萎缩状态。日本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宫崎市定在他的《中国史》中,对三国时代的经济是这样描述的:“货币不足导致的不景气变得严重后,货币更加被贮藏起来,结果不景气加速进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布帛和谷物成为替代货币,出现了社会一变而倒退到自然经济现象。”可见,货币贬值、物价不稳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三国时期的钱币铸造与流通多与战乱有关,揭示三国时期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更可窥见钱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 一、三国时期钱币的铸行情况

据有关史料记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把在逃难中的献帝迎到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东汉政权名存实亡。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于同年10月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立为帝,国号魏,是为魏文帝。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是为蜀先主。再次年,占据江东的孙权称吴王,建元黄武。229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是为吴大帝。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完全形成。

三国时期,货币经济水平低于两汉时代,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式,货币制度被分割为曹魏、蜀汉、东吴三个系统。又因为战时财政的压力而出现虚值大面额铸钱,以致三国时的币制非常复杂。但依循的仍是五铢钱的脉络,同时,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各自都铸造了新的货币。总体来看,三国时期的钱币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曹魏五铢(图1)。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故被称为“曹魏五铢”。曹魏地处北方中

原,人众物博,是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到处战乱,良田变战场,市井化废墟,货币经济倒退至钱货不行,只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境地,人民过着实物经济生活。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为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大力提倡屯田,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曹丕称帝,经济状况有一定好转。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筹集粮草曾恢复使用五铢钱,并无新铸。可好景不长,曹丕再次停用五铢,恢复到以谷帛为市的局面。史书说是因为谷贵。几年后,以谷帛为市的弊端日益显现,魏明帝接受建议恢复钱法,更铸新五铢钱。曹魏五铢承袭汉制,仍以“五铢”为文并作为基本单位。据“魏钱”情况分析,曹魏时,五铢的铸造量是较大的。



图1 曹魏五铢

蜀汉直百五铢(图2)。蜀汉地处西南边陲,民寡国弱,并至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因而它实行一种虚值的“大钱”政策。在这一时期内,可以称为蜀钱的至少有四类。一是蜀五铢。其文字制

作和汉五铢截然不同,容易识别。它们几乎都在四川出土,文字制作或多或少同直五百铢相像,可认为是在四川铸的。二是直百五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光背,成都所铸;另一种背面穿左有一“为”字,这是犍为铸的。犍为是通西南的门户,一个商业中心。为字钱在中国钱币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它是圆钱中最早两面有文字的也是纪地最早的。三是直百,有各种大小轻重,文字制作同蜀五铢和直百五铢不一样。四是直一。文字制作和小样直百完全一样。对蜀汉的钱币铸造问题,据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推想:刘备取得成都以后,就铸造直百五铢,次年取得犍为,又在犍为从事铸造,背面加犍为字。



图2 蜀汉直百五铢正(背)面

东吴大泉钱。彭信威说吴钱的问题比较少,“是孙权称帝以前曾否铸钱的问题以及是否称帝以后马上铸钱的问题。”史书所著录的孙吴钱只有两种,另外两种根据文字制作可以断定为孙吴钱。一是大泉五百(图3),铸于嘉禾五年,初铸大约有十二公分重,后来改为大约八公分。二是大泉当千(图4),铸于赤乌元年,初铸大概近二十公分,后来减为十一公分,最后减成四公分以下。大泉五百是上下左右直读,大泉当千则是环读。另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只有少数出土,而不见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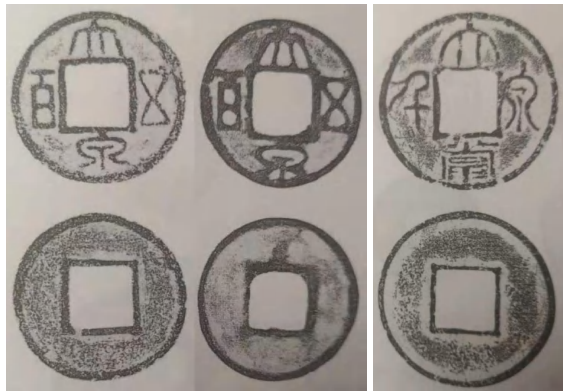


图3 东吴大泉五百

图4 东吴大泉当千

除前面三大体系外,还有几种钱币可以归入三国时期,就是太平百钱(图5)和定平一百(图6)。



图5 太平百钱



图6 定平一百

从三国时期钱币铸行情况看,唐石父主编的《中国古钱币》对三国时期的钱币归纳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少”:指铸量少,存世不多,其品种并不少。三国钱币,不算以“五铢”为面文的钱仍有十多种,然而这些均少见,其中,吴铸“大泉五千”仅有两枚传世。

“二杂”:指本时期钱除轻重大小相差悬殊外,面文亦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纪重钱”“纪值钱”“纪国号钱”“纪年号钱”“背文纪地钱”等五类,这种突破钱文“纪重”传统的情况,对后世钱币发展的影响十分之大。

“三小钱即是大钱”:“小钱”多轻薄劣质,“大钱”则是指钱的面值甚高,动辄“百”“千”,实则是钱值悬殊的减重钱。

## 二、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

三国时期货币通胀的形成,有其特定因素,综合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从三国到隋朝的400年间,是经济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冲击下,曹魏五铢钱遭到重创,货币经济退回到实物经济,谷帛成为重要的交

换手段,表明这一时期货币信用的衰落。从货币铸行来看,曹魏沿用汉五铢钱,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又铸行五铢钱,以屯田积谷为基础,保持了币制的基本稳定。但据钱币专家分析,曹魏从退回实物经济到铸行和再用五铢钱,据说是由于民间作伪,就是把谷弄湿了,使其重;把帛织薄了,使其广。这表明,谷帛为交换时段,也可以贬值。不过曹魏的币制没有动摇,尽管铸行五铢恢复使用货币,其实物经济还是浓厚,收入靠租谷,抚恤赈济也用谷,钱币只见于赏赐。而蜀吴两国的的情形就不同,都曾铸面值很高的大钱,蜀汉刘备所铸为直百五铢,钱重为蜀五铢的3倍,作价缺高达100%,一枚等于百枚汉五铢,并且不断减重。东吴孙权胆子更大,于嘉禾五年(236年)铸行大泉五百,几年后又相继铸大泉当千,二千、五千,通过提高铜钱的名义价值来实行通货膨胀,以致于吕蒙攻取荆州、孙权给予的赏赐达到一亿钱。

二是币制不稳,铸造大钱现象较为普遍。三国时期,各国钱制由于不同经济基础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曹魏立国之初,一度废除旧钱,改用谷帛交易。魏明帝恢复使用形同汉字的五铢钱,货值相对稳定。经考证,历史上,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因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毁于战火,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因为铸工低劣不受欢迎,只能存入库中。此后,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吴、蜀两国则因国力不济实行变相的通货膨胀政策,接连铸行不少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的大额铜钱。位于西南的蜀汉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及董卓之乱的影响,货币经济还在正常运行。蜀国因为势力相对弱小,为加速割据扩大地盘,需要增加军费开支,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有人说,那时粟与金同价。打仗时刘备向士兵约定:破城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刘备占据成都后,果然士兵抛弃武器而取钱财。为此,刘备接受刘巴的建议,就开始铸造虚值的大钱,大概就是直五百铢。东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为丰富,人民亦较富裕。赤壁大战之前就已从事铸钱。后因吴蜀两国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为交战的敌国,并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两国对抗中,蜀国因为实力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

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竞相贬值的情况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被钱币学专家称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 三、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的借鉴意义

一是发展经济扩大内需是解决通货膨胀的基础。三国时期,虽然通货膨胀明显,但也是依魏、蜀、吴各国不同情况而论。相比较之下,起初,曹魏因汉末战乱,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状况,货币经济倒退,谷帛为市,社会经济陷入困境。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在货币经济方面,虽然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生活所占比重非常小。因而,实物经济就像一道防火墙,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也为西晋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可见,曹操大力发展经济的思想,提倡屯田的做法,也对抑制通货膨胀应是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吴、蜀为了扩大疆土,不惜发动战争,影响到经济发展,加之军队供给的所需,不得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最终走向了失败。

二是消除战乱稳定社会是化解通货膨胀的前提。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均与战争有关。三国时期的长期战乱,使社会政治处于动乱状态,民不聊生,人民怎能安居乐业?这样,各方割据势力为了强化统治,扩大领土,必然会发起战争。三国有名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战争扩张的结果。有战争就会有军费支出,军费支出需要经济作支撑,因而在国力较弱的情况下,蜀吴采取的只能是通货膨胀之策了。现如今,要保障社会稳定,也需要良好的和平与安定环境,人民才可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得到稳定。而经济下行、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必然给人民生活造成影响,从而使实际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缺失。

三是货币政策和物价稳定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三国时期,刘备铸造的直五百铢,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100倍。这就意味通过直五百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钱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三国志》记载“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解决了军队给养问题。这就是当时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在魏国,曹丕虽下令“复五铢钱”,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下转第55页)



# 清末铜元滥铸与物价波动

■ 田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铜元是产生于清末的新式货币,对中国物价走向起到重要作用。彭信威指出铜元引起近代价格革命。铜元出现于财政危机较为严重的清末新政时期。为应对财政危机,清朝地方政府凭借下移的财权纷纷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以铜元余利弥补财政亏空,相关研究已有大致揭示。在经济增速相对缓慢情况下,铜元无序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在多元本位的清朝末年,一种主要货币的贬值必然引发相对其他币种比价的波动与该种货币购买力下降。1905年后,铜元对银元比价和购买力下降逐渐明显,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因国际银价下跌,银质货币单位购买力开始低落,但降幅慢于铜元。铜元、银元购买力的下降说明清朝财政权力分散、传统财政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层级性通货膨胀在以经济形势折射出财政权力分配问题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清政府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建设推动的无力。

## 一、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形势逐步恶化与传统制度的延续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财政一度好转,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保持略有盈余状态。1891年,户部统计当年财政收入82349198两,支出79355241两,盈余约300万两。同年户部余银约1000万两,较1890年增加200万两。尽管财政状况与康乾盛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与咸丰时期仅剩不足十万两的窘境相比有所改善。虽然户部统计因财政权力下移难以真实反映全国局面,然则对全国财政状况有一定参考性。

188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勉强的均衡随着战争烟消云散。尽管清政府倾全国之兵迎战,终

因中日军力对比悬殊而失败。在开放通商口岸、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苛刻条件外,清政府被迫赔款2亿两、威海卫驻兵军每年50万两。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清廷再次支出赎辽费3000万两。与此同时,清军主力湘淮军受到重创,清政府为挽救国防危机下令编练新军。新军的组建虽然有利于增强国防力量但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在军费、外债共同冲击下,中央财政已不堪重负。户部总结当时财政情形道“窃维方令用款,外莫大于洋债,内莫大于军饷。洋债一项,近年应还银二千余万,除前借俄法,英德及续借英德各款已派各省分摊,及由七处厘金作抵,并拟另案加拨镑价不敷外。尚有汇丰、克萨各款,未令各省分摊,亦无的款作抵,计每年约短银二百余万。又军饷一项,近年应支银三千余万。各省制兵防勇,由本省供支及外省协济外,惟北洋武卫左、右两军,京旗、虎神、骁骑、护军等营,自添练以来,均在部库食饷。部库按月筹垫,计每年多支银三百余万。此时局孔棘,外交、内政紧要攸关,洋债围不容置为缓图,军饷尤不能听其告匮<sup>[1]</sup>”。

1900年,华北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因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势力占据优势,清政府决定联合义和团排斥西方势力,最终导致8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派兵侵华。清廷在抵抗失败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在要求清军拆除部分防御工事、允许列强驻兵华北之外,强迫中国支付4.5亿两赔款。此项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以1891年财政状况为基数,赔款总数超过清廷10年财政收入。虽然列强做出分期偿还的决定,但庚子赔款与甲午赔款造成的外债同时支付,对清政府财政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以至于户部感叹“款目之巨,旷古罕见……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sup>[2]</sup>。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金城银行应对通货膨胀研究”(2017M623290XB)阶段性成果之一;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研究”(14ZDB047)阶段性成果;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通货膨胀问题研究(1840-1911)” (19czs039)阶段性成果。

依据条约清政府每年应支付赔款约 1800 万~2100 万两。清廷为减少中外交涉,力保残局,除中央政府负担 300 万两外,其余赔款根据各省、关经济实力进行分担。庚子赔款分摊如表 1:

表 1 庚子赔款地方分摊表(万库平两)

省份	数额	省份	数额
直隶	800000	江苏	2500000
湖北	1200000	山东	900000
安徽	1000000	河南	900000
山西	900000	甘肃	300000
陕西	600000	福建	800000
新疆	400000	四川	2200000
江西	1400000	浙江	1400000
湖南	700000	广西	300000
广东	2000000	贵州	200000
云南	300000		

资料来源:胡钧.中国财政史[M].商务印书馆,1920:366

表 1 显示,除西藏、蒙古、东北三省之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皆负有赔款义务。即使长期依靠协饷的贵州、建省较晚且贫瘠的新疆亦未能例外。在大部分省份财政本已困难情况下,骤然负担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两赔款,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挽救财政危机,地方督抚在张之洞带领下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核减摊派。客观分析,中央政府计划数额确实过于巨大。新疆、贵州、广西、云南等省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唯有依靠邻近省份援助方可勉力维持,地方督抚关于加税弊端分析切中时弊。军机处深感国家财政艰难,在核准地方以 70% 数额上报之时,电令摊派盘代表奕劻与各国周旋,试图减少支付。但当奕劻外交努力失败后,军机处被迫将外在压力转化为内敛财动力,军机处立即否决张之洞方案,电令各省“必须如期筹偿……遵照全权户部会议办法竭力筹措,源源拨解,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sup>[3]</sup>。列强对于赔款的欲望客观加剧中国财政危机,清王朝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财政思想和制度已危机四伏。

在经济层面难以满足地方要求后,清中央政府被迫在体制方面做出让步。户部下令各省“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督抚只需“在本省司关道局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即可。户部命令意味中央政府放弃财政、税收政策制定权,太平天国以来内轻外重财政分配格局得到清中央政府承认。财政权力集中不仅是清朝立国以来的国策,而且是后发国家近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中央

政府实现高度集中财政权力方可将有限财力投资于近代化急需部门,逐步推动国家近代化。日本近代史客观说明财政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一味下放财权,虽然暂时维护中外和好局面,为清末新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但与国家近代化要求却背道而驰。

面对列强虎视鹰瞵的窥视,清政府为救亡图存、挽救统治危机决定实行新政,试图在瓜分中国的恶浪中实现救亡图存。清末新政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某些方面甚至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然则,在中国整体社会近代化程度较低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力度较大的改革,必然在部分领域超出社会经济承受能力产生适得其反效果。

清廷为维护国家安全将组建新式军队作为新政重点。根据计划,清政府拟训练 36 镇新军,具体分布为:京师 4 镇,直隶 2 镇、江苏 2 镇、江北 1 镇、安徽 1 镇、湖北 2 镇、浙江 1 镇、广东 2 镇、云南 2 镇、贵州 1 镇、四川 3 镇、山西 1 镇、陕西 1 镇、甘肃 2 镇,新疆 1 镇、热河 1 镇,奉天 1 镇,吉林 1 镇、黑龙江 1 镇、贵州 1 镇、云南 2 镇,总计 36 镇。清中央政府设计体现中央集权与巩固边防双重目标。客观评价,清政府训练新军具有进步意义。然而,军队属于纯消费群体,近代军队耗费大于传统军队,更加需要近代财政支撑。据统计,新军每镇年耗费约 100 万两,贫弱的中央政府自然难以承受,被迫再次向各省摊派。

表 2 各省承担北洋练兵经费数量表(万两)

省份	摊派额	认解额	省份	摊派额	认解额	追认额
江苏	85	苏属 70, 宁属 91	福建	40	2	
湖北	50	103	陕西	30	15	
浙江	50	91.44	云南	20	12	
直隶	110	110	贵州	6	1	
湖南	40	40	四川	80		80
甘肃	10	10	河南	40	20	10
山东	55	19.2	安徽	35	10	15
江西	50	20				

资料来源: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3

表 2 显示,大部分庚子赔款承担省份再次被迫负担练兵经费。进一步分析,大多数省份认解数与摊派数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清中央政府一再追认,但部分省依然拒绝如数负担。在富国强兵、挽救危局成为社会思潮的背景下,部分督抚依旧回绝如额支付,虽然国地经济矛盾成为诱因之一,但财力不足亦不容忽视。

军队建设仅为器物层面学习。清末新政作为社会全面改革,制度层次亦逐渐仿效西方。清廷为促进经济发展,设立农工商部、商部,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扫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障碍。伴随新政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商绅阶级力量逐步扩大,立宪运动此起彼伏。

为适应时代发展,巩固统治,清政府亦注重宪政。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为将来立宪寻求参考。同时,中央、地方政府开始改革官制,咨议局等机构逐渐出现。1908年,清政府公布《钦定宪法大纲》《逐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正式成为国策。预备立宪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意义重大,它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以和平方式实现由专制向宪政的过渡。立宪运动政治意义不容忽视,但对捉襟见肘的财政构成新的压力。据时人统计,1908年考察经费80余万两;巡警部年需经费30万两;京师法律学堂经费4万两<sup>[4]</sup>。全国立宪经费具体难以统计,后人对内地9省进行汇总后发现宪政费用超过4亿余两。

表3 各省宪政经费开支表(万两)

省份	年限	内容	预算经费
直隶	1910—1916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	4411
河南	1910—1916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	1814
广西	1910—1916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清理财政、调查人口	1073
江西	1910—1916	教育、警察、民政、军政、实业	4421
福建	1910—1916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实业	5663
广东	1910—1915	调查、教育、警察、司法、实业	11715.5
黑龙江	1910—1914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	598
湖南	1910—1914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	4807.9
湖北	1910—1916	自治、教育、警察、司法	7364
合计			41867.4

资料来源: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0

表3中部分费用虽然并非立宪费用,但对财政压力却是永恒。从近代化角度分析,清末新政有利于增强中国抵抗外敌能力,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然则,在社会、经济近代化程度较低情况下骤然进行全方位改革,在部分领域超出社会承受能力,改革风险有所增加。恽毓鼎忧心忡忡的说“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用,出入相抵,亏三千余万两,此后追加之数,尚不止此,不知九年筹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若再贪慕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已亡”<sup>[5]</sup>。恽毓

鼎的担心不久变为现实。清末新政恰如时人评论“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sup>[6]</sup>。

甲午战后,清朝政府财政面临近代化程度较低、赔款猛增、新增费用日益增加的夹击之中,长期以来坚持的器物层面变革在逐步遇到瓶颈。清廷刻意回避的制度层面近代化客观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弱化和抵御外来侵略能力的弱小,类似问题并非短期改革所能解决。同时,因传统财政、货币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导致清政府应对方法的狭隘,最终迫使清中央、地方政府不约而同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铸币税收入较多的铜元成为合适的币种。

## 二、财政权力下移制度化与铜元财政性发行

清朝政为解决财政危机一味加重摊派造成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剧增。作为补偿,中央政府采取政策补偿方式,以下移财政权力方式获得财政收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中央政府以各省、关经济实力分配赔款。为保证地方政府按时完成摊派,中央政府再次下放部分财政权力。户部在指出“督抚均有理财之责”后,授予地方“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sup>[7]</sup>之权。户部的规定对财政权力下移进行制度化承认。咸丰之后财政权力的下移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对财政权力的侵夺,国地双方博弈的结果。在赔款压力下户部将地方财政权力给予制度保障,为货币滥发埋下体制隐患。

在制度保障下,地方政府获得自行制定财政、货币政策权力,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必然。较早发生滥铸的并非铜元,而是银元。清政府筹划铸造银元历史较早,鸦片战争前夕,因东南沿海地区流行西班牙银元,部分地区甚至取代银两流通。部分有识之士发现银元优点而力主发行银元,推动货币流通。

189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外国银元流通有损国家主权,中国政府应自行发行银元抵制外国货币。因张之洞事先做好周密筹划,自铸银元币信优良,流通范围逐渐超过两广,甚至九八规元势力范围的上海亦出现两广银元。因广东获得相对丰厚铸币收入,其他各省相继开展铸造银元活动。同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要求制造银元获得中央批准。此后,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陆续制造银元。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继续在湖北铸造银元,两湖地区亦出现银元流通。随着国际银价持续下降,银元余利逐步下滑。据张之洞统计,平均铸10000元,仅可获利210两<sup>[8]</sup>,对财政补充作用相对有限。因此,银元地位逐渐被铜元取代。

1897年,陈其璋上奏请求鼓铸铜元。其列举铜



元8条优势之中着重强调“，以机器制造铜元，工本节省获利较多”<sup>[9]</sup>，财政需要占据主要地位。为减少发行风险，陈其璋主张在两广、两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试铸。发行余利充作铁路经费，缓解财政危机。陈其璋主张制造铜元虽然客观具有学习西方货币制度的积极意义，但其以财政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出发点则折射出清政府思想层面的传统性。次年，刘庆汾再次上奏力主发行铜元。其建议中依旧将“成本较轻，活力增倍”列为首位因素。刘氏指出在铜价上涨引起铸造制钱亏本过重的情况下，以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取代制钱可获利数倍。由此可见，满足财政需要仍占据主导地位。

甲午战争后，虽然财政平衡遭到挑战，但财政危机尚未真正到来，清政府对铸造铜元并不热心。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廷财政压力空前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受到赔款、新政双重压迫，无奈之中具有较高铸币收入的铜元再次进入官员视野。1900年12月，署两江总督德寿要求仿效香港货币体系发行铜元。因广东具有一定独立财权，德寿在6月即向市场投放铜元，经过实践证明，成本、利润基本持平，并无亏折。不久福建擅自设立官钱局专职负责发行、制造铜元。福建做法较之广东影响更加深远，它不仅自行发行，而且对既有制度进行改革，设立专门机关管理铜元，成为清末铜元滥铸的先河。为解决新政、赔款经费，清中央政府被迫承认地方铸造铜元权力。1903年，户部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在体制层面承认地方发行铜元合法性。为解决财政问题，户部要求较早铸造铜元的广东、福建等省“赶紧铸造数十万元，投交户部”<sup>[10]</sup>。户部的政令客观说明铜元发行伊始清中央政府为满足财政需要即放弃货币管理权。可见，铜元在出现阶段即有各省为政、财政性发行等特点，为后来通货膨胀制造制度隐患。

沿海、沿江省在得到中央允诺后，纷纷鼓铸铜元。非沿海、沿江省份因缺乏中央有力约束，在铸造利润诱惑下纷纷开铸铜元。1905年，铜元危机爆发前，部分非沿海、沿江省亦设立铜元铸造厂。1900—1905年铜元厂设置如表4。

表4显示，铜元厂设置逐渐突破沿海、沿江限制，由较早设厂的福建等省向内地逐渐蔓延，地处华北、西南的河南、云南、贵州等省亦出现铜元铸造厂，甚至无明确辖地的漕运总督亦自行设置清江厂。1905年，据户部统计17个省开设铜元制造厂20余个，最多的湖北设立3厂。梁启超在经过对铸造量、全国人口、经济发展等数据计算后忧心重重的说：

“其所有机器之数，……为八百四十有六。……

表4 各省铜元局设立情况

时间	厂名	设立官员
光绪二十六年(1900)	福州厂	闽浙总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	江苏厂	江苏巡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	湖北厂	鄂省张之洞设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	四川厂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	清江厂	漕督设立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	福州船厂	福州将军设立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	河南厂	豫抚设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	广西厂	桂抚设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	云南厂	户部奏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	贵州厂	黔抚设立

资料来源：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345

每年能溶铸铜块十万八千七百吨。每铜块一吨能制铜元十五万零一千枚。若次机器全数开工，则每年应制出铜元一百六十四万万零壹仟叁佰七十万枚。……每人应行用四十枚……况乎各省之纷纷续购机器者且未有已”<sup>[11]</sup>

因各省自行发行，全国制造铜元数量缺乏权威统计，学界对此存在争议。梁启超从进口铜料数量计算铜元发行数为“一百四十万万枚”。何汉威从英国官员记载中统计后得出结论为90亿枚<sup>[12]</sup>。清政府为集中财政权力派陈璧对地方铜元发行情况进行统计。陈璧通过仔细统计后发现，各地铜元在币材、发行数、铸造种类等方面差异较大，一省数厂现象较为普遍。

发行数而言，较多的江苏淮安清江浦厂1年之中即投放当十铜元7400805585枚。湖北造币分厂之铜币局次之，为2548327055枚。湖北造币分厂之银元局、江宁造币分厂铸造厂皆在10亿枚以上。其大部分厂发行额皆超过1亿枚，只有福建造币厂之西局、福建造币厂之闽关局制造量低于1亿枚，分别达到79059249和73791952枚。陈璧仅对大部分省份铸造情况予以记录，贵州、吉林、广西、云南、奉天等省尚未出现于记载中。同时，陈的记录为1905—1906年情况，此后鼓铸铜元省未能纳入。如新疆在1908年开始制造铜元，自然未出现于陈的记载中。清末铜元发行具体数量已难以考证，但在财政性发行诱导下，铜元过量投放则是不争史实。

铜元财政性发行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结构上亦有所折射。铜元因面值与重量差异，余利有所不同。经过实践，地方政府陆续发现当十铜元成为铸币收入最高的币种。1908年，度支部下令铸造一文新钱，“一文新钱铸数系按所铸当十铜元枚数加铸三

成”<sup>[13]</sup>。因一文铜元面值低于币材价格,造成铸造亏本,各省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直至1913年除天津、湖北、福建、江南、河南等省铸造一文铜元外,大部分省皆未按照中央规定发行。当十铜元则因利润较高,且易于流通而被大量铸造。这种货币发行结构客观说明货币政策依附于财政的特点。

铜元的过量发行另一方面体现为与经济需要的脱节。经济增长需要货币,但过量货币发行必然危害经济。学界对1900—1911年中国经济状况进行核算后发现,新政时期中国经济呈现曲折增长趋势,虽然总量增加22%,但年均增速较慢,部分年份出现负增长。经济低俗增长客观造成对货币需求量下降。地方政府过量发行与经济吸纳量有限形成矛盾,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恰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所言:“国家发行货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避免财政性发行,……市场上票子过多,就要引起物价的波动,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sup>[14]</sup>。

### 三、铜元和银元比价波动与铜计物价上涨

铜元无序发行引发银铜比价失衡、铜计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类似经济现象表面分析是经济失调的体现,本质是财政权力下移、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传统财政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戚戚相关。

伴随国际银价下滑,银钱比价由银贵钱贱变为钱贵银贱,铸造制钱甚至出现亏损。铜元的产生即与钱荒存在一定关联。铜元产生后因银价低落和群众猎奇心理,一度以高于官价流通。张家骥统计,1903—1905年初,铜元始终溢价流通,但是比价持续下滑,由1:80下降到接近官方价格的1:90。耿爱德对长三角地区银铜比价调查后总结“光绪三十一年以前(1905),铜元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同时安庆一元合九十五枚。1907年,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同时杭州合九十五枚。光绪三十一年,宁波平均合九十五枚,是年在上海则枚元合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行用时则在市面竟加升水自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sup>[15]</sup>。由此可见,1905年之前长江中下游地区银铜比价集中在1:95左右,苏州等少数地区低至1:88。甘博以北京为对象统计银铜比价后发现1906年之前北京地区铜元出现溢价流通。两者比价虽连续降低,但依旧保持在官方比价之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因各省财政性发行,铜元开始贬值,银铜比价逐渐超出官方价格,甚至出现一年之中比价不同的现象。1905年,除北京、胶州、芜湖等少数地区银元、铜元比价低于1:

100之外,其余多数地区已超过官价。铜元在沙市、宜昌、镇江则在1902年、1903年即已折价流通。1906年后,几乎所有地区银铜比价高于官方价格,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铜元贬值较早的沙市、镇江比价徘徊在1:200附近,大多数地区则在1:130左右。梁启超记录“光绪三十一年之内……(铜元)于是供过于需要,而价值遂一落千丈。”<sup>[16]</sup>安徽则在“三十一年铜币充斥”<sup>[17]</sup>。

铜元属于货币,具有一定支付能力。在对银元贬值之时,其相对物资购买力亦持续下降。何汉威指出“清末最后十年间铜元滥发,最直接的影响时给即已上升的物价起了催化作用,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率和速度”<sup>[18]</sup>。从横向角度分析,银计物价涨幅低于铜计物价,两者存在一定程度差异。

中国银计物价主要受制于国际银价。19世纪70年代后,伴随世界主要国家采取金本位,白银货币用途减少,银价逐渐下降。1875年后,金银比价剧烈下滑。由1875年1:16降低为1909年的1:40。1875年,紫铜每担价格16海关两,此后持续涨价。1902年达到每担25海关两峰值。受世界性白银价格暴跌影响,白银为核心体系的中国银计物价必然上涨。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银计物价居高不下。北京每百斤米平均涨价0.9两,白面则达到1.02两。浙江龙游生活物资涨幅基本在15%~30%。四川南溪县除少数纺织品有所下降外,其余生活物品持上涨趋势,其中棉花、枵柴上涨率超过100%。部分地区地方志专门记载银计物价上涨具体情况<sup>[19]</sup>:

南京:1902年米价每担为三元五角至六元不等;1903年米价一般在四元至六元之间,四年以后就增加到七元至八元了。

镇江:每百斤须洋四元,较之十年前约增十成之三。

苏州:1902年大米为每担四元一角,1910年为七元;1902年菜籽为二元九角,1910年为四元一角;1902年菜籽饼为一元,1910年为一元六角;猪肉每斤140文涨至280文;柴草由每担200文增至450文。

杭州:1902年大米为每担五元五角,以后几年为六元至七元,而现今已经是七元三角,十年来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宁波:米卖到八元五角一石(140斤)。……十年以前每石价格不超过五元。劈柴每担由五角上升到九角,猪肉每斤由一角上升到二角二分,鱼肉每斤由八分上升到一角二分。

广州:1902年,一块银元可以买25斤米或180斤柴薪。而到1911年只能买15斤米或100斤柴薪。盐价由每斤三分涨至五分。花生油由每斤一角五分涨至二角五分。

汕头:1902年,米价每担4元,现已涨到7元至8元,木柴和木炭价格增加了150%,房租由每月3元涨至5元。

南京:1902年,白菜每斤3文,而到1911年要10文。鹅蛋由每只5文涨至10文。

烟台:1902年,工匠每天花80文就够吃了,而现在在购买同等数量的食物必须付出200文以上。

表5 1882—1901年天津地区银钱物价对比表

	十年前价格(1882—1891)	现在价格(1892—1901)
米(每袋)	4元	8元
面粉(每斤)	24文	50文
麻油(每斤)	100文	200文
猪肉(每斤)	90文	200文
木炭(每斤)	20文	40文
木柴(每捆)	125文	250文
煤(每吨)	6元	10元

(嘉定县)光绪间,……一席之费仅需两千数百文……乡间俭者费数百文即可仓卒做主人……宣统时,……专席须三四千文……棉花,宣统间最贵每担十一千文,……其先每担以六、七千文为常价”

引文显示,记载地区银计价格涨幅维持在30%左右,少数项目达到100%,只有汕头木炭价格增速达到150%。同时期,铜计物价呈现相近趋势,且增速快于银计物价。表格显示天津地区铜计价格增速皆为100%以上,其中面粉和猪肉分别达到120%和104%,白菜则为惊人的233%。烟台铜计食品价格增速为175%。嘉定县宴席费用开销增涨约150%,钱计价格增速超过银计物价数据显示铜计物价增速大于银计物价。当银计物价以30%左右速度提高之时,铜计物价增幅达到100%以上。铜元购买力较之银制货币贬值较快。币种购买力差别本质是财政权力分散程度的差异。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物价受制于国际银价与地方财政权力两方面制约。以白银为货币体系核心的中国受到世界性金本位浪潮冲击,国内白银购买力逐渐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增速的缓慢,客观造成货币需求量增速较缓,形成通货膨胀。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很多国家使用一种商品做通货,任何造成该商品通货量增加的原

因可以影响到所有国家”<sup>[120]</sup>。铜计价格则受到中国政府铜元发行量影响,因中央政府缺乏必要控制,地方政府拥有较大发行权,财政性发行在各省陆续出现。铜元余利有效弥补财政赤字之时,单位货币购买力持续下降,在勉强维持数年后最终形成快速下降之势。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时期,银铜两种货币购买力发生不同程度下滑,铜计价格降幅大于银计物价。银铜购买力差别表面原因是清地方政府对不同币种控制力的差异,实质则是财权下移造成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当地方政府在财政危机压迫下被迫采用发行货币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之时,清中央政府缺乏有力约束机制。银计物价的上涨动力则源自于国际银价的下跌。中国对货币体系核心的白银价格缺少必要发言权,当国际银价波动之时,国内物价亦随之摇摆。因国际白银价格影响相对有限,清朝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无限制推行,造成铜计物价跌幅大于银计物价,形成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层级性通货膨胀。

铜元问题诱发的层次性通货膨胀表面原因是清政府财政权力下移与外移,本质原因则是清廷自身近代化程度较低,已无力承担推动后发国家近代化的角色。铜元自产生之日起,清中央政府即放弃统一管理权,为满足财政需要将发行权下放地方,并在制度层面予以承认。铜元贬值问题产生后,清政府虽然采取措施尝试控制地方发行却在地方的抵制下收效较小,铜元贬值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进而证明近代化程度较低的清政府无法完成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24册[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339.  
[2] 李文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314.  
[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961.  
[4]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中华书局,1958:5383+5587.  
[5] (清)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M].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423.  
[6] 刘师培.刘师培文选[M].李妙根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201.  
[7] (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商务印书馆,1955:

(下转第61页)



# 晚清安徽首笔地方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 刘杰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一、清季安徽首笔地方公债的发行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外来侵略势力的渗透,“及自咸丰,同治军兴,皖省实居要冲,供给频频,财政始为之弊”,近代安徽的财政开始入不敷出。随着外来侵略势力不断入侵,商业上的衰落,加之历经长期战祸,水旱灾害频发,安徽地区经济出现了持续性衰落,财政出现了长期赤字的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赔款剧增。于是清政府令户部向各省摊派。“地方财政与练兵、兴办实业所形成的财政需求之间矛盾加剧,地方政府掀起了举债的高潮。”<sup>[1]</sup>

1901年庚子之变后,清政府再次被迫进行大量对外战争赔款。孱弱的中央财力早已无力偿还巨额赔款,部分赔款只得由19省分摊,安徽1901年分摊100万库平两,1905年分摊50万库平两,两次合计达到150万库平两,与山东山西持平,但远高于广东、福建等财政收入较高省份。1906年安徽地方财政岁入3349000库平两,而庚子赔款额就达到了1500000库平两,也占到了岁入比重的45%,额外的摊派开支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安徽财政出现了长期的入不敷出的局面。在这样内外交困背景下举借内债开始了,客观条件也具备了。为了解决财政困窘情况,国内如直隶、湖北等省已开始使用公债这一筹款工具来补充地方财政。安徽省于是也借鉴临近湖北等省直接经验,开始“复制”使用公债这一工具作为财政筹资手段。

1909年12月,安徽巡抚朱家宝鉴于收不敷支,库款奇绌,奏请发行公债票。其实际上基本是复制它省事由和募集发行制度设计。发行地方公债奏折

由内阁抄出到部。在奏折里讲道:

“窃查皖省通年入款,向在500万两上下,而出款则在600万两以外,历年出入、收支,本已不敷,嗣后添练六军,增认海军经费、崇陵工程,益以冬、春赈抚,及咨议局、审判厅、劝业会等经费,并9年预备事宜,一切用款,均著重在一、两年内即须支出,预计又岁须100余万。此际若欲骤集巨金,舍贷款外,别无良策,惟募外债,其利息之轻重,既常受其挟持,而镑价之低昂,又复多所亏损,筹思再四,只有募集公债为弥补之计,尚无流弊。尝考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度,入款5万万两而公债7900万,占全体十分之一而有余。财政家言,则以公债为临时政府收入之门,与经常租税各款为对峙,既足昭国家信用之资,仍不增国民负担之累,法治国家,不轻加税,盖待此以为转输也。近岁各省逐渐仿行,直隶则创办于前,湖北则继募于后,均经部议核准有案。皖省事繁款绌,计惟援照直隶章程,并参酌湖北办法开募债票,以济军需。”

“兹经飭司通盘筹划岁就,司局两库筹款,约可得银29万两,计可贷公债银120万两,拟定大票每张库平银百两,小票每张十两,以六张为一套,按甲乙丙丁戊己六字列号,分作六年还清,第一年按七厘付息,每年递加一厘,加至第六年一分二厘为止。即以所筹之款备付逐年之本息,应请作为永远定案,责成臣与布政使并继任抚臣等妥慎经理,遇有更替,专案移交,一体遵守,不得违改定章,失信商民各等因。臣等伏查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间,直隶首行奏办公债票,当经奉旨允准,上年九月间,湖北援案试办,又经臣部奏准各在案。此次抚以安徽库款奇绌,拟援案试办公债120万两,原奏章程核与直隶、湖北办法大略相符,所筹抵款亦属有盈无绌,自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研究(1898—1937)”(18CZS031)。

应准予试办,以资要用。窃维近今理财,本不讳言称贷,然各国募集公债,大率用之于生利事业为多,间或因特别要需,借此为一时转输之用,近日风气渐开,各相互仿办。而求其募集之故,直隶则筹备饷项,湖北则弥补积亏,此次该省又以通年出入不敷为言,取办一时,舍此固无他术,然以常年不敷之款,辄恃公债为弥缝,若常此因循,殊非上策。各省疆臣,均有直接理财之责,现当宪政始基,不能不量入为出,嗣后当竭力撙节,务求预算适全为度,不得以募集公债视为常款,稍涉糜费,应请飭下安徽巡抚实力统筹,以惟永远。至所募公债,飭属认真经理,务坚民信,是为重要,所有遵议缘由。”(度支部宣统二年正月十六日具奏)

1910年正月十六日,经过清政府度支部议复奏准通过了《安徽省筹办劝募公债票章程》。章程第一条即明文确定了此次公债的发行额为银120万两。同年3月1日为第一期每期收银20万两,每月一期,至同年八月初一,共计6期。具体章程如下:

安徽省筹办劝募公债票部分章程

第一条 安徽省公债共募集银120万两

第二条 此项公债分六期收银。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初一日为第一期,收银20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初一日为第二期,收银20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初一日为第三期,收银20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初一日为第四期,收银20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初一日为第五期,收银20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初一日为第六期,收银20万两。

第三条 归还公债本息年限、数目如下:

宣统三年(1911年)第一期,应付七厘息,银8.4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宣统四年(1912年)第二期,应付八厘息,银8.0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宣统五年(1913年)第三期,应付九厘息,银7.2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宣统六年(1914年)第四期,应付一分息,银6.0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宣统七年(1915年)第五期,应付一分一厘息,银4.4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宣统三年(1916年)第六期,应付一分二厘息,银2.4万两,并随还本银20万两。

以上六年共还本银120万两,息银36.4万两,每期应得息银,均须扣足一年,方能付给。

第四条 此项公债票,每整票库平足银100两整,每零票库平足银10两整,各注明取本付息期限,每期字号按甲、乙、丙、丁、戊、己六字,依次分填。

第六条 由安庆省城裕皖官钱总局汇总收发兑收。

第七条 凡本省地丁、钱漕、关税、厘金、捐款、均

可以库平足色期满之票交纳,并将本期内应得足年未取之利息加算,均由承收署、局向官钱总局兑现。

第十条 凡各票主到期即向官钱总局领本取息,如他省及外埠,不便向官钱总局取用本息,可以期满之票在官钱总局指定代收局兑现现银。其在本省地方,可向地方官衙门及各税捐分局取现,该署、局即用以抵丁漕税捐,正款解库。

第十一条 此项公债票,无论何人准其转售转兑,认票不认人。

第十二条 收存公债票在5万两以上者,准其每年十二月初一日赴官钱总局呈验债票,满许以调查公债票备付款项。如收存不及5万两,可约集各票主凑成5万两,公举一人验票后,亦准其赴局调查。

第十三条 此项公债票,如经手大小官员、差役不遵章程,有留难、侵蚀等弊,一经查实,官员参革、差役监禁10年,仍将侵蚀之款加一倍追罚。

第十四条 筹备公债本息的款如下:

一、安徽藩库杂款,每年银14万两。

二、安徽牙厘局出口米厘项下,每年提银15万两。

第十五条 以上每年共银29万两,专备还债之需,无论何项紧急之款,不准挪借、动支。

第十六条 各署、局,每年认筹备还得款,须于每次应交之期,提前两个月,如数交官钱局存储,以免临时贻误。<sup>[2]</sup>

从上述章程可以看到,安徽首次地方公债发行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明晰了每次还本付息期,并且指定了还本付息规则。这比较符合公债发行程序。在公债设计上基本延续了先前天津、湖北等省发行债票的运作模式。

尽管看似较为完备,具有了近代公债模式,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安徽省首次公债发行以后因为认购者甚少,一年里仅销出10万两。安徽省为了推销完这笔公债,开始筹措将此笔公债委托转让给资金雄厚的外商。“于是在1910年10月,由英商怡和洋行购买110万两(按1:1.0960折合上海规元1205600元)。按照章程1911年第一期应付7厘利息。息银84000两库平银,并还本20万两,其中怡和洋行应得本息折上海规银为285325两,但是安徽并未付还分文。”<sup>[3]</sup>

辛亥军兴后,地方米厘收入拨充军饷,杂款收入也取消,由于没有还债资金的来源,经英使多次交涉,于1915年议定,每年分两期偿还规元银30万两,以七成还本,三成付息,所有以前到期未还各本息得加复利七厘。截至1922年6月30日,已还本息规元银174万两,尚欠规元银647589两,后由财政部承认

归还。“财政部承付后,支付时间一直不定,且数目也达不到15万两。到1926年,本金全部还清,但是所欠利息以及复利达到了837372两,后来一直停付,其本息增到1332534两,所欠利息又一次超过了本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31年10月才将此债归入整理旧债委员会整理,与其他项合并才得以了结。”<sup>[4]</sup>

## 二、晚清安徽首笔地方公债的偿还历程与内外债转化

中华民国建立后,安徽省政府开始停止偿还此项借款。1912年6月2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关于偿还这笔债务致安徽都督函详细阐明了纠纷由来。指出:“英商怡大行购买安徽省所发债票,去年西历十一月初三日,应还怡大行本息共计285325两,并未偿付。”但是时任安徽都督认为“此案事关国际,如果确有借付。皖省自无不承认之理。惟皖省叠遭变故,所有案卷毁失无遗,应请转行财政部抄录此案全卷寄皖,以凭核办”。财政部经复查得知此项借款于宣统二年间确有一事,经前外务部咨准前度支部声复“此项公债已经奏准,每年由皖省筹银29万两担保本息,并无不准洋商购买明文等语。”要求“皖省欠还怡大行之本息银两,请为立案注意,自应妥筹办法,以惟信用。”<sup>[5]</sup>

在中央与安徽省政府无法协商一致状况下,为了尽快促进相关机关办理借款归还手续,英国怡大行专门派出了两名人员代表到安徽省直接展开交涉还款事宜。据此时计算,安徽省怡大借款本息共欠达到了13848209元<sup>[6]</sup>。但是这次交涉无果而终。后经英使朱尔典出面交涉后,安徽省政府一次付给125000两汇票到上海,并要求再次商讨归还办法。在不断拖欠下,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因此怡大行要求中央政府来负担剩余本息。中央政府针对悬而未决的还款事宜咨询安徽省政府。

1914年6月7日时任安徽省政府都督的倪嗣冲给北洋政府发去《安徽都督兼巡按使倪嗣冲陈叙借款交涉情形复财政部咨》再次陈述了具体还款事由。倪在回复财政部函中称:“查怡大公债系前清宣统元年十二月,由朱前抚家宝专案奏办,二年正月经前清度支部议复准奏。用途既属政费军需,及凑解京部要款,所筹抵款复指明在司库及牙厘局提拨,所以宣统四年预算已将此项应还之款列入国家支出。即大部复核1913度国家预算,亦未将此款列入皖省岁出项下,其为国家外债,实无疑义。”<sup>[4]</sup>据此,安徽地方政府认为这笔公债虽然是安徽省发行,但是实

际债务主体是前清政府,民国建立后,国家已经将这笔债务划由中央负责,地方政府也没有该项预算支出,这笔债务按性质上来讲已经转为了国家外债。从债务人的主体来看,地方与中央就归偿出现了争端。因为这笔借款偿还中断,是年3月,怡大行再次派其代表艾克甫到安徽交涉还款事宜。最终在双方让步下议定:“本利分六年还清。自本年(指1914年)5月起每6月为一期,本年4月30日先付银十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二两八钱一分,订立合同,及分还利息清单。”<sup>[7]</sup>

当怡大行代表艾克甫将他与安徽省政府所定合同清单函交给怡大行,等伦敦中行核定后,准备按约进行。后将所订合同告诉英国驻芜湖领事后,得知安徽偿还确实是勉为其难。“皖省原因入不敷出,始行举债,当连年水旱灾害后”<sup>[7]</sup>,基于以上原因,于是报告给怡大中央银行后,欲不承认与安徽地方政府所订合同,要求与中央政府另立新合同。为协调还债事宜,安徽省政府基于以上情况,将政府与怡大行商议合同及清单上送到中央财政部。

1914年订立的合同随着怡大行以安徽省财力匮乏,无法偿还为由,公开反悔要求中央偿还后,中中央政府以“一切本利均需查照原定章程,按时筹付,不得延缓,并于每一期还本付息后,将已还尚欠数目,及还本利所动各款,并造清册送部备核。该省(指安徽省)所欠怡大行借款,系属地方公债,自应由本省自行筹还,以惟信用,以免交涉。”在这样政策下,此次合同不成立。1915年后,债权人怡大行希望再次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次悬而未决的借款。1915年5月11日,英国公使署费恩草拟定了一份清偿书,详细地列出了偿还计划如下:

安徽省公署立即付给怡大行银十五万两。

本年八月一日付银二十万两。

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付银十五万两。

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付银十五万两。

此后仿此摊还,以每年付银300000两为度,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惟借款利息,需按照原合同所订之率计算,安徽省公署不得议改。若能按此办理,则朱尔典公使允将安徽提出不列于短期债单之内,俾与赔偿余款摊还之案无涉。”<sup>[7]</sup>针对“安徽省公署每逢借款到期,延宕不付,屡次失信”朱尔典以“深恐将来安徽省仍借口于水旱灾荒,不肯如期付款”因此拟请外交部准备一份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声明“若将来安徽省公署不能如期付款,即由中央政府代付到期之款。”

由于偿还多次中断,1916年5月26日,怡大行



行致电倪嗣冲并派代表到皖继续索债<sup>[9]</sup>。1916年9月21日倪嗣冲致电外交部称：“怡大借款关系国家信用，惟该案既未定义，则此15万两为本为利仍属纠葛不清，除仍飭赶速筹措外，务乞鉴核施行。”<sup>[10]</sup>外交部复函倪嗣冲指出，怡大借款事，仍应照旧筹付本期应交之款。11月13日，外交部再次致电倪嗣冲，称：“怡大借款7月份应交15万两，前订本月底交付，转瞬已届期，希速筹备，万勿延误。”<sup>[11]</sup>试图继续通过中央行政权力来督促安徽省负责偿付这项借款。

针对省财政无钱偿债的情形，11月22日，为了继续筹还怡大洋行借款，安徽省拟发行短期公债240万，分六年偿还，每年还本40万元。第一年给息1厘，第二年给息8厘，第三年给息9厘，第四年给息1分，第五年给息1分1厘，第六年1分2厘。现拟定简章十四条，并息单一纸，连同怡大借款本息表一份，咨交省议会公决。11月23日致电外交部称“怡大借款关系外交、财政信用，皖虽库空如洗，万不敢不竭力筹措，惟前送偿还本息表，该洋行是否承认，乞再询明。”<sup>[12]</sup>安徽省一直在寻求解决债务之策。在此后安徽省与英领事协商“每年筹还规元银30万两，按6及12月交付，以七成还本，三成付息，其以前逾期未还之款，加付复利七厘，并请中央岁拨津浦南段货捐30万元以作偿还款。”<sup>[13]</sup>此款后经财政部第三年度预算案内核准，但是安徽省政府和怡大洋行达成协议后，屡次请求中央拨付，一直没有交付。后1915年安徽省政府积极与财政部商议“咨请财政部商之中、交两总行借一巨款，将芜湖米捐作担保品，以期将该款一次偿还。”但是这种方案一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财政部的回复和意见。于是“民国五年安徽又由厅奉军座面谕，募集本省公债，以便作一次清还”，但是这种试图借新债偿旧债的做法安徽省议会讨论时没有通过，“以债还债”路径偿还模式宣告失败。

而怡大公债借款还一直存在，利息仍然在不断增加。安徽省政府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寻求合适的方式来了结此项公债，并没有公开拒绝偿款。因此偿还行为也一直在继续并没有终止。从1918年7月时任安徽财政厅长刘鸿庆撰拟的《怡大公债节略》看到“皖省则自1914年起，已陆续将该款（指怡大借款一事）抽还，计自三年至六年共还本息规元银94万两，其七成还本，三成还息办法，并经英使承认，每年按6及12月为还期，始亦经英使允诺，照会外交部转由财政部咨皖有案。旋财政部复令皖省以每年1、7两月为还期，至今文电往返磋商未决，但已还之规元银94万两，“本银应摊65万8千两，息银应摊28万2千

两。其未还者，结至现今，本银仍欠547600两。仍应按年偿还。至每年所还之款，既无津浦货捐可资指拨，只有于应解中央专款项下扣抵。迭经由厅与部磋议，本年1月间已奉部令，承认本年四月部电，催解专款，复承认扣除前次借款，则此项还款已可谓之有著。不过每年即按6及12月分还，而指拨之专款以一五加征为大宗。在上半年青黄不接，收数无几，挹彼注兹，亦颇不易。是以民国六年应还之30万两，迟至1917年9月底始付75000，12月底始又付75000。直至1918年1月中旬，始找付150000两。”<sup>[14]</sup>

表1 安徽省长公署开列已还怡大洋行借款及尚欠数目表

（单位：规元银）

时间	还款具体数目
1914年11月	4万两
1915年9月	30万两
1916年9月	15万两
1917年1月、2月、9月、12月	30万两
1918年1月、7月	30万两
1919年1月	15万两
总计	124万两

注：按照原定七成还本办法，计已还债本八十六万八千两，再加上该行陆续算给回利三万二千余两，核与原购债票规元银一百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两，仍欠债本三十四万四千余两  
资料来源：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513页

按照原定还款计划，三成还息办法，计已还利息银372000两。自1911起至1916年止，利息逐年递增。从7厘息涨到了1分2厘。而从1916年后每年都按照1分2厘扣算，并且将1911年起尚未偿付的积欠的算起加算复利，除了已经还付了372000两外，仍然欠息银600000两之巨。

于是在当年2月24日，财政部在上海替安徽省政府垫付15万两，遂将省库收入拨解安武军军饷。此后的支付基本上是中央政府财政部在负责支付余款。1919年怡大洋行与北洋政府财政部商议，考虑中国参加了欧战，索赔之款得到了缓解支付，财政较为宽裕，并且当时世界性的英镑价格下跌使中国的外债从实际上减少了，基于财务收支考量，怡大洋行提议北洋政府财政部一次性的偿付未还款项，可以免利息之积累。怡大洋行提议发函给财政部后，财政部也迅速回复了这一提议称：“贵公司关于此事所作之提议，为双方面之利益计，不胜感激。此款订定

每年付还二次(1月与7月),每次银15万两,前次一月之期款,由敝部代安徽省垫付,兹因中央财政异常困难,敝部不能将此款一时还清,至于安徽省之无能为力不待言矣。是以敝部仍请照贵国公使与敝国外交所订之原约办理。敝部(每半年1月及7月)付银150000两,直至此款完全付清为止,实因财政拮据。”<sup>[12]</sup>

经财政部复函后,怡大借款仍然一直拖欠悬而未决。中间中央财政断断续续支付。1921年11月3日,怡大洋行再次给财政部致函提请还款事宜。“为安徽借款积欠不还一节,迭经敝行及英国公使与大部函商,1915年商定新办法,由敝公司放弃债票上注明之利息久经过期者一大部分,查该项新办法,大部允将该借款于6个月内全数还清,每月拨出银150000两。起初数期,确由大部或该省拨付敝行。惜乎不久,即行中辍,继由大部于1919年4月2日来函,改定每半年拨付银150000两,至还清之日止。敝公司深信大部必能履行该约,以坚敝公司信心。不料1920年7月期之150000两,只得50000两,而本年之正月及七月两期分文无着。敝公司已经放弃1911年至1915年四年半之利息,不料大部仍延期不拨。近闻大部拟将发行特别省库券,以偿该项债券。”<sup>[13]</sup>尽管怡大洋行前后三次公开致函北洋政府商议偿债事宜,也试图通过外交照会来公开解决,但是北洋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相互推诿,特别是第二次合同后,北洋政府财政部多以“实因财政拮据”无法偿付为由,断断续续支付。

怡大借款长期未决,针对中央与安徽省互相推诿不负责偿还的情况,北京怡大洋行经理拉的·克利夫在1923年3月1日致财政部《北京怡大洋行陈叙借款始末情形要求迅予清结财政函》中详细回顾了争端始末,提到了两次修约后情形:“夫中国政府请敝公司仍照原约办理,则必自以为照原约办理为名誉矣。但两次与中国政府结约,一则为印于债票背面之原条约,一则为特别优待中国政府之修改条约,敝公司皆按照约办理。但中国政府则不然,就第一次条约而言,前四年之内,本利不付。而为本借款抵押品之省收入并不拨充为还款之用。就第二次条约而言,中国政府自1921年8月之后,视为具文。然则中政府不履约而行,而谓敝公司独能履约而行乎。仅利息之推算,而利率又减轻,而谓能作屡不履行之赔偿乎。中国政府承认照付之款,屡次请求延期,有如前信之所引述者,而谓敝公司不当请求赔偿乎。”<sup>[14]</sup>实际上自第二次订约以后,财政部也一直没有停止,直至1921年8月,最后一次仍然付给了12500

两。怡大洋行也与安徽省政府继续接触,但是“虽安徽省有募集地方公债付还之浮泛提议,省长与鄙人直接交涉,再谋延长此款之提议,然适足以证明为延宕之遁辞而已。”<sup>[12]</sup>

在这次交涉之后,债款基本上是由北洋政府财政部来支付,但是数额不定,时期未定,也达不到第二次约定的15万两。直到1926年,本金全部还清,但是因延期偿债而形成多年积累的利息却不断复利后增加,达到了837372两,后增到了1332534两,利息又一次超过了原始借债本金。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集中清理历史积留的各项内外债,设立了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来全面负责国家债务的清理工作。于是晚清安徽政府所举借遗留的公债并入了国家财政整理旧债预算中集中清理偿还。1933年公债司编制了关于怡大洋行借款概况说明书。

表2 怡大借款逐年偿还本息细数表

偿还年月	偿还数目	备注
1914年11月18日	规银4万两	由上海财委会交付
1915年9月8日	规银30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6年4月14日	规银1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7年1月22日	规银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7年2月22日	规银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7年9月28日	规银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7年12月20日	规银7.5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17年12月27日	规银15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18年8月20日	规银15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19年1月6日	规银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9年1月28日	规银3.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9年2月2日	规银3.7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9年2月24日	规银15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19年3月21日	规银500两	汇上海交付
1919年7月25日	规银3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19年8月5日	规银4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19年11月	规银8万两	由北京财政部拨付
1920年2月5日	规银3.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20年4月23日	规银3.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20年6月30日	规银3.75万两	汇上海交付
1920年7月30日	规银18550两	汇上海交付
1920年10月12日	规银18550两	汇上海交付
1921年5月30日	规银7500两	汇上海交付
1921年8月31日	规银1.25万两	汇上海交付

资料来源:安徽省财政厅,《安徽财政史料选编》(第三卷),皖内图书馆非正式出版字(92)第65号,第512页;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518—519页

具体如下:

省份 安徽

债权人 英商三妙尔公司(即怡大洋行)

借款数目 规银一百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两

订借及期限 自宣统三年起,分六年清还

利率 年息七厘,按年递加至一分二厘为止

担保 藩库杂款年十四万两,牙厘局米厘年十五万两

用途 据皖省咨称为崇陵工款及添练新军等用

经过情形 辛亥后本利未付。民国三年由省府议定每年抽还三十万两,七成还本,三成还息。以前欠付之款加付七厘复息。至十五年三月底,本金业已还清,当时尚欠利息及复息八十三万七千三百七十三两八钱七分。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底,单开结欠规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五百三十四两一钱九分。二十年十月奉皖院令第五五一八号,经提出国务会议决议,送整理内外债委员会。<sup>[15]</sup>

### 三、晚清安徽地方公债转化的历史影响

怡大借款从偿还到偿清历经20余年。本来仅是安徽省地方性的公债,但是由于地方财力枯竭,募集短缺,只得通过外商买卖,变为私人包销<sup>[6]</sup>。由此转化为外债。由于国内政权的频繁更迭,债务主体实际上也发生了变更。国内政策的变化使得这笔借款最终沦为了中央与地方互不认可的旧债。内债向外债的转化,随之而变的债务主体变更,为持续的交涉埋下了伏笔。

北洋政府建立后,财源有限。“本来就是破落户的破产财政,它除了依靠海关总税务司分润一点关余和盐余来维持正常开销之外,其余则完全靠举债过日子。据统计,北洋政府统治的16年中,共发行各种内债27种,发行总额定数达8.77亿元,实际发行额6.12亿元。中央政府借债度日,财政困窘,根本无力顾及地方债务,因此偿还不断延期也可以理解了。

怡大洋行借款耗时20余年的偿还过程,期间数次交涉,债权纠葛不断。在中国近代地方性公债发行史上是不多见的。从内外公债发行偿还来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安徽省地方政府募债不力,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建立可靠地偿债基础上发行大量公债券,在本国募集不力下,又转向通过外国借款以求完成募债计划。可以说这笔债务已经完全的超过了自身的清偿负担水平,造成了本息不断增大,最终地方无力偿还。另外一方面源于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动,本身的借款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加上没有合理的界

定债务主体,偿债方式和义务,造成安徽省与中央政府不断推诿扯皮。此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外国对华借款的高收益,他们为了这样的经济利益,不惜屡屡动用外交压力”<sup>[17]</sup>。怡大洋行借款数额不大,竟然让英驻华公使屡次向中央和地方施压来保证特殊经济利益的维系。安徽省地方公债由发行到最终归还落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无款还债成为了最大的障碍,这也反映了晚清民初时期地方政府财力的虚弱。而转化为外债后,外国债权人也趁此不断加息勒索,获得了高额的债务利息。■

### 【参考文献】

- [1] 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29.
- [2]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04-507.
- [3] 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33-335.
- [4]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03.
- [5]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07-508.
- [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717.
- [7]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09.
- [8] 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M].黄山书社,2010:120.
- [9] 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M].黄山书社,2010:133.
- [10] 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M].黄山书社,2010:139.
- [11]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11.
- [12]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17.
- [13]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14.
- [14]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16-517.
- [15]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三卷)[M].档案出版社,1989:519.
- [16] 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33-337.
- [17] 马陵合.北洋时期安徽三大外债剖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3):87-94.



# 简述中国古代与现代钱币上的传统民俗文化

■ 骆宏漠 骆事畴 骆衡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钱币学会)

笔者在几十年的收藏生涯过程中,收集了几十枚大大小小、几个朝代的铸有民俗文化的包括吉祥文化、辟邪文化等钱币,现展示给钱币收藏爱好者。

民俗是与人类共存亡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祖先生存经验、生存智慧的总结,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观念,自古以来形成的群体性文化,正是通过民俗的样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人的生命是由生物DNA和文化DNA两部分组成的话,那么强健的体魄是外在的,可以一目了然的,而文化的基因主要存在于民俗文化中,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从古到今的钱币文图蕴涵的内容极为丰富,堪称中华民族民俗风情的历史长卷。压胜钱是与我国民俗、民风渊源关系最紧密的一类钱币,作为钱币文化的衍生产品。一方面是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的承载物,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符号,传递着无法用其他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概念和信息,如辟邪、吉祥、健康、平安等等。钱币上的民俗文图展示了先民们对大千世界的独特理解与感悟,也充分反映了祈求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思想感情,也从中透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性、民俗和宗教信仰,是浓缩的典故、传统、仿佛无声的述说着中国百姓祈福、求喜、安宁的生存主题,向我们透露着超越时空的信息。

民俗钱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大都是人们为了辟邪、祈福、供养、传承生命、纪念记事等而特铸的,是专供佩戴、悬挂、摆放、礼赠等之用。其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如诗如画,每枚钱币上的图案都表现一个故事,一个涵意,虽不是流通货币却被人们视为特殊灵物,赋予类似宗教或巫术的文化功能,世代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 一、辟邪类

此类是人们为了保身求胜,祈求免受伤害,表达

了人们长吉远凶的良好愿望,开创了中国民俗事项赖以表现的压胜钱体系,古钱上的一些宗教神学观点解释儒家经义,中国文字本身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加之人们对文字的崇拜带来的神秘感,使文字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

1.辟邪花钱:为方孔圆钱,正面方孔右侧辟,左侧邪,背面图案为七星、龟、蛇、剑。如图:



2.山鬼雷符花钱:为圆孔圆钱,从右到左书写,文字为山鬼雷霆,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保神清,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雷符,背面八卦图。如图:



3.山鬼符咒花钱:为方孔圆形,正面上下左右为四组山鬼符咒图,背面为本命星官图。如图:



4.崇宁通宝刻花钱:为圆形方孔钱,正面崇宁通宝旋读,背面七星龟蛇剑。如图:



中国钱币上的生肖文化,生肖纪年相传是汉代东方朔首创的与动物图腾有关。十二生肖的源头连着古代天文学。我们的祖先在观天象时,将昼夜分为十二时辰,依照十二种动物的十二种习惯和活动时辰,确定十二生肖,这样一天的时辰和动物搭配就排列下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分述如下。

1.圆孔圆形花钱:正面十二生肖对应图,背面八卦图。如图:



2.圆孔圆形花钱:正面十二生肖对应图,背面神仙、天狗吠日图。如图:



## 二、祈福祝寿

自古以来,人们对永生长寿有着强烈的愿望,长寿富贵、福禄寿喜、吉祥语钱,中国古代的吉祥图案,往往以瑞祥的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这些动物、植物或以其谐音、或以其象征意义表示吉庆和美好的愿望如:鹿谐音“禄”、蝠谐音“福”、螭谐音“喜”、再如龟、桃、灵芝、松柏等象征“寿”、“福禄寿喜财”吉祥语,用来祝贺人长寿,遇喜进财等等。另如国人以牡丹形容花开富贵,素有“花中之王”的美称,历来被认为富贵吉祥,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象征,人们对牡丹的赞赏,有诗为证“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竟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唐代皮日休《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从古到今人们都以花开富贵来形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圆形圆孔福寿花钱:正面不同形式不同字体分内外两圈排列24个福字,内圈8个福字,外圈16个福字,背面24个寿字,内圈8个寿字,外圈16个寿字,寓意24福寿,对应一日24时辰,一年24节气,每时每刻福寿相伴。如图:



2.明代崇祯通宝刻花钱:正面崇祯通宝四字对读,币边老刻花,有多种花纹,葫芦、蝙蝠,寓意福禄,背面上方为贵,下方为富,左右两侧为鱼,币边刻花有圆钱、花形等,寓意花开富贵、连年有余。如图:



3.清顺治通宝刻花钱:正面顺治通宝四字对读,币边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背面方孔右侧汉文



东,左侧满文东,币边三组如意刻花,寓意三生如意。如图:



4.清饷银五钱:正面中心珠圈内饷银五钱对读,外圈四组维文饷银五钱,背面坐龙图,外围四只蝙蝠,寓意赐福。如图:



5.清饷银五钱:正面中心珠圈内饷银五钱对读,外圈四组维文饷银五钱,背面坐龙图,上方一只蝙蝠,寓意添福。如图:



6.清代长命百岁银花钱:圆形方孔形,长命百岁四字对读,寓意人们能够健康长寿,这种良好的愿望通过花钱世代流传,背面字迹不清。如图:



7.清康熙通宝刻花钱:正面康熙通宝对读,币边刻花,上下为两组如意刻花,左右两侧为寿字,寓意如意长寿,背面满文宝泉,币边刻花,上下各一只蝙蝠,左右各一寿字两朵小花,寓意福寿,四季花开,传承人们的美好愿望。如图:



8.清康熙通宝刻花钱:正面康熙通宝四字对读,币边刻花,四组牡丹花卉,寓意花开富贵,背面满文宝泉,币边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把人们的美好愿望通过钱币与民俗文化的结合代代相传,流传于世。如图:



9.清康熙通宝刻花钱:正面康熙通宝对读,币边上下两组花卉,左右各一组团寿图,两组钱币图形,寓意花开富贵,长寿,背面满文宝源,币边刻花多子多福,这种宽缘钱币比较珍稀。如图:



10.清康熙通宝宽缘刻花钱:正面康熙通宝四字对读,币边刻花上下两组花卉,左右各一团福,两枚钱币图形,寓意花开富贵,四季来财,背面满文宝源,币边刻花多子多福,这种宽缘钱币比较珍稀。如图:



币边刻花,两组牡丹,两组佛手,寓意花开富贵,多子长寿。如图:



11.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币边刻花,上下两对如意,左右两朵牡丹花,寓意如意富贵,背面满文宝泉,上下两朵牡丹花,币边刻花,四朵牡丹花,左右两枚钱币图案,寓意荣华富贵。如图:



12.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币边花卉,背面满文宝昌,币边刻花三组如意,寓意花开富贵,人生如意。如图:



13.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老朱砂红,币边刻花,上下两组牡丹花卉,左右两组团寿图案,四组寿字,寓意花开富贵,长寿,背面满文宝源,币边三组如意图案,寓意吉祥如意。如图:



14.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四字对读,币边刻花四组牡丹花开,寓意花开富贵,背面满文宝福,币边刻花,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如图:



15.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币边刻花四组牡丹花开,币面有老朱砂红,寓意花开富贵,背面满文宝源,币边刻花,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如图:



16.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上下两组如意,左右两个寿字,寓意长寿如意,背面满文宝晋,这种宝晋局钱币稀少,币边刻花,上下两只蝙蝠,左右两个寿字,四朵小花,寓意福寿,四季花开,花开富贵。如图:



### 三、供养钱

如安史之乱后,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都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其中铸造了精美的、流通最广的要属后周“周元通宝”。这种钱是后周柴荣下令毁佛寺3336座,毁掉了一尊尊佛像铸成的,因而中国古代一直传说这种钱十分神奇,能治病助产,这就是民俗文化世代相传的精神所在,如还有一些传说,崇祯年间,明王朝濒临灭亡,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铸造崇祯通宝,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钱币背面铸有奔马图案,钱币界称为“跑马崇祯钱”,民间附会“一马乱天下”的故事,有人传言此钱暗寓奸臣马士英使国家大乱,王朝灭亡,民间传言此钱征兆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李自成自称“闯王”,“闯”字从“马”从“门”,一马进门是李自成推翻明朝之图谶,就是这枚崇祯奔马图案的钱币承载了一段历史文化的记载,还有一些神话传说如刘海戏金蟾、八仙过海等。

1.淳化通宝供养钱:正面淳化通宝四字旋读,背面左右两尊佛像,为庙宇供养钱。如图:



2.后周一元通宝钱:正面周元通宝四字对读,背面下星,此币铸造非常规整漂亮,有唐开元通宝的风范。如图:



3.后周一元通宝钱:正面周元通宝四字对读,背面右侧一大圆星,此币较少见,铸造规整漂亮。如图:



4.崇祯通宝奔马钱:正面崇祯通宝对读,背面方孔下一奔马图案。如图:



### 四、道教花钱

八卦是中国传统文化,象征天地万物的基本符号。相传是由人类始祖伏羲发明的。“太平御览”记载,八卦是由“一”(阳)、“--”(阴)两种符号组成,后又演变为八种,名称分别为乾、坤、震、巽、兑、艮、离、坎依次象征天、地、雷、风、山、泽、火、水八种自然现象。八卦又以两卦相叠,演变为六十四卦,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与结合,推演宇宙万事万物,人们佩戴“八卦钱”借以镇压邪气,免灾免祸,祈求平安,清朝中后期民间风俗还把“八卦钱”缝缀在小孩的衣帽上,保护小孩平安生长。中国的八卦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周边韩国、日本沿袭使用。圆形圆孔八卦钱,如图:





## 五、商业文化

几千年来先祖们的聪明才智,发辉的淋漓尽致,把钱币文化与民俗文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世代相传,如花钱所示,一本万利、生意兴隆、对顾客要讲信誉,诚心诚意,以诚相待,自古经商之道,“生意诚为本,诚招天下客”,这对我们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民俗文传承到现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图:

1.招财猫秦半两花钱:正面秦半两上一只招财猫,寓意招财进宝,财源滚滚,背面平素无文。如图:



2.一本万利花钱:圆形方孔钱,正面一本万利对读,背面日进斗金,满载而归,寓意生意人的良好愿望。如图:



3.宋崇宁通宝花钱:正面崇宁通宝旋读,背面右侧仙人祭宝,下方聚宝盆,左侧摇钱树。如图:



4.康熙通宝刻花钱:正面康熙通宝对读,中间有老朱砂红,币边刻花,上下牡丹花开,左右两侧各一朵团形寿字,寿字上下各一个篆书寿字,背面满文宝源,币边刻有21枚钱币图形,寓意钱多多。如图:



5.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币边刻花,上下两只蝙蝠,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寿字,上下两朵十字形小花,寓意长寿,花开富贵,背面满文宝源,币边刻花有21个钱币图形,寓意钱多多。如图:



## 六、科举文化

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和荣誉,如清代诗文钱“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表现了殿试中状元后飞奔报捷的那种喜形于色的心情,钱币上的吉语如“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状元及第”“五子登科”等都是古代科举取士制度的生动写照。

1.状元及第花钱:圆形方孔花钱,正面状元及第对读,背穿上“福”穿下梅花鹿,寓意“禄”状元及第,福禄双至。如图:





2.清代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币边刻花,背满文宝泉,穿上下两条鲤鱼,币边刻花,有牡丹花开、蝙蝠、钱币图案,寓意鲤鱼跳龙门,一举成名,花开富贵等良好愿望。如图:



3.宋崇宁通宝鎏金刻花钱:正面崇宁通宝四字旋读,背一帆风顺,鲤鱼跳龙门,一举成名等吉祥刻花。如图:



4.清乾隆通宝刻花钱:正面乾隆通宝对读,币边万字刻花,背平板满花,一帆风顺,鲤鱼跳龙门吉祥图案。如图:



5.五子三元银质刻花托钱:正面五子三元圆形托架钱,五子三元四字对读,寓意五子登科,连中三元,背花开富贵。如图:



## 七、中国现代吉祥文化金银币

中国吉祥文化源远流长,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吉祥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吉祥文化纪念金银币自2015年开始发行,作为一个系列项目包括,健康长寿(五福拱寿)、生儿育女(瓜瓞绵绵)、美满婚姻(并蒂同心)、吉祥幸福(年年有余)四个主题金银彩色币。

1.五福拱寿:金银币。如图:



2.瓜瓞绵绵:金银币。如图:



3.并蒂同心:金银币。如图:



4.年年有余:金银币。如图:



## 八、结束语

钱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东方色彩的货币体系,无论是钱币形式的演变,还是钱币制度的进步,都体现了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古人把钱币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巧妙结合,才能以钱币为载体,将民俗文化、吉祥图案、吉祥用语等,书写于钱币之上,民俗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才得以传承至今,使我们的民俗文化世代相传。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时

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民间流行风尚、习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俗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的各民族中,都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以上为笔者多年来收藏的有关民俗文化钱币、吉语钱、辟邪钱、祈福祝寿类钱、道教花钱、供养钱、商业文化钱、科举钱等等,供同道鉴赏,笔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上接第35页)钱,而是为筹措伐吴的军需。当物资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而这种交换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就是百姓为贪图小利,往稻谷里加水,或是将绢织薄,虽有典章也不能禁止。倒是谷帛交易更好地防范了蜀吴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冲击,最终魏国经济得以恢复。东吴孙权之所以铸造“大泉五百”,主要是对蜀汉的强烈反应。后来还接连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面值却膨胀了好几倍。由此可见,曹魏采取谷帛为市的货币制度,虽然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倒退,但其大量屯田,发展生产,避开货币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恢复稳定了经济。而蜀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仅大打军事战,也打货币战,最终害人又害己。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记录了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变化。从三国最终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看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

然的。为此,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和物价稳定,可以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要解决好通货膨胀问题,需要货币政策支持,良好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货币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支点。■

### [参考文献]

-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 戴志强.中国钱币收藏鉴赏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 王永生.三千年来谁铸币[M].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 [5] 汤可可.中国钱币文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6] 中国历代货币编辑组.中国历代货币[M].新华出版社,1988.
- [7]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 [8] 刘建斌.古钱币收藏与鉴赏[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古钱币上的崇龟习俗

■ 叶真铭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

龟,俗称乌龟,泛指龟鳖目的所有成员,是现存最古老的爬行动物。其外形特征为身上长有非常坚固的甲壳,遭受袭击时,乌龟可以把头、尾及四肢缩回龟甲内。大多数乌龟为肉食性动物,以蠕虫、螺类、虾及小鱼等为食,亦食植物的茎叶。乌龟既能在陆地,也能在水中生活,这是大多数动物所不及的,亦有长时间在海中生活的海龟。在中国古代,乌龟则被视为一种神圣的祥瑞之物,它跟龙、凤、麟三者并称“四灵”或“四神”,倍受人们崇拜。在历代发行的钱币上也可以找到古代崇龟信仰的痕迹。

中华民族的龟崇拜,源远流长,由此积淀而成的崇龟信仰文化蔚为大观。从考古出土资料看,中国人对龟的崇拜,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如山东大汶口、河南贾湖、浙江河姆渡等墓葬中,都曾先后发现龟崇拜的遗存。在安徽凌家滩遗址中,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玉龟实物。据专家考证,这种玉龟是作为祭祀品使用的。古人为什么选用龟来祭祀呢?《礼记·礼运》提供了破解的密码:“麟体信厚,凤知治礼,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所谓“兆吉凶”,就是说龟具有了解未来发展的非凡智慧,而龟的智慧神力直接来源于其独特的生理结构。对此,《礼统》曾加以解释:“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黝文交错以成列宿,五光昭若黝锦,运转应小时。长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洛书》也说:“灵龟者,黝文五色,神灵之精也,能见存亡,明于吉凶。”《史记·龟策列传》谓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

正因为乌龟有先知先觉的功能,所以在夏商周时期,用龟甲占卜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商代既是龟卜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系统卜法的形成时期。商人占卜都要把卜事记录下来并书契于龟甲。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就是刻在乌龟的板甲上的文字。西周是龟卜文化继续发展时期。周人“敬畏天命”已为世所公认,龟卜既为大事,周代诸王“灼龟观兆”,以决诸疑,决不亚于殷商。《尚书·大诰》云:“宁

王遗我大宝龟,昭天明即命”。宁王即周文王,他留给后人的是传达天意、象征国家安危的大宝龟,只有在国家危难之时,才可以动用宝龟来占卜。《礼记·礼器》说:“家不宝龟”,是说卿大夫家不能私藏宝龟。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设有专门的职官,执掌龟甲占卜之事,如太卜、卜师、龟人、占人等。《诗经》亦有多篇描写龟卜的情景,从周代先王古公亶父“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周文王、周武王“考卜维……维龟正之”,直到周幽王“我龟既厌,不找告犹”,龟卜之事就从未间断过。龟卜的内容、对象甚广,举凡祭祀征戎、宴饮祝祷、生死存亡、婚丧嫁娶、建居宫室、农业渔猎等等,皆在龟卜之中。春秋时期是龟卜大普及的时代,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以至于家臣,无不用卜。

夏商周盛行的龟卜现象到汉代以后已非常少见。当时人们预测吉凶祸福,不一定非用龟卜不可,但乌龟作为祥瑞之物,依然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古人认为乌龟就是一个小宇宙,是缩小了的天地,具有天、地、人之象。汉刘向《说苑·辨物》:“灵龟文(纹)五色,似玉似金,背阴向阳。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磐衍象山,四趾转运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脰,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变。”其一,天是圆的,乌龟的背甲是隆起的圆形,龟甲覆盖着躯体的下半部,就如同圆形天空笼罩着大地。天空中布满日月星辰,龟背甲上也有纵横交错的天然花纹,如同天上的星宿;其二,大地似一块平坦方正的棋盘,龟腹甲平整如方,具大地之象;其三,天是由四根柱子支撑着,而乌龟的脚就象征着支撑天的四根柱子。《淮南子》上载女娲炼石补天时,“断鳌足以立四极”。高诱注:“鳌,龟也,天废顿以鳌足柱之。”其四,乌龟头部的外形及动作形态如同人类男性的男根,所以龟自然就具备了人象。因此,汉代以后乌龟崇拜较为盛行。在汉代画像石中,龟与蛇结合体的玄武是常被表现的对象。到唐代,官府与民间充满了带龟的名词,如官场的龟衣、宫廷的龟袋、军事上的龟符、寺庙前的



龟趺、佛教的龟藏、道家的龟息等,甚至当时的人也多取名龟年。在古代发行的钱币上也不难找到崇龟信仰的历史痕迹。

## 一、最早的实物货币

一般认为,货贝是中华先民最早使用的实物货币,其实,上古先民们最早使用的原始实物货币还有龟甲。远古时期,龟甲曾经和贝壳、珠玉一样,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在市场交易中发挥交换媒介的作用。龟甲的使用,推进原始物物直接交换过渡到依靠“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为商品交易和货币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最早的时候生产力低下,剩余物品不多,偶尔发生的交换是以物易物直接交换。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物品越来越丰富,物品的交换也就越来越频繁,直接交换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在众多商品中逐渐分离出一些可以与其他一切商品都能交换的商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等价物”,如龟甲、贝壳、皮革和齿角等。后来,商品交换的品种进一步增加,数量不断扩大,频率继续加快,为了交换的便利,在交换中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种类不断减少,逐渐集中并固定在少数几种经常使用并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商品上。这些在商品交换中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就成为了原始的实物货币。

龟甲基本上同贝壳一样,具有成为实物货币的天然优势。一是龟甲比较坚固,经久不坏;二是龟比贝少得多,不易得到,其价值也比贝大;三是龟甲比贝壳大,可用人工分割。由于龟甲具有这些特点,帝王贵族以它作为宝藏手段。龟甲作为货币,史料典籍上很早就有记载。如《礼记》说的:“诸侯以龟为宝”。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又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班固也认为,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可见,中国古代曾经以龟甲作为实物货币使用。梁启超《中国古代币材考·龟币》:“古代用龟币,以全龟为之者固多,然割裂之者亦不少,盖势之所趋,不得不尔也。”

龟甲作为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为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基础,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及风俗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称谓远古时期的货币,常常

是“龟贝”并称,“龟”尚排在“贝”前,如前引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等典籍记载。西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货币中就有一种仿龟甲形状、呈椭圆形的龟币(下文将专门介绍)。公元7年至14年,新朝王莽托古改制,连续实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货币体系,先后发行了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共28品货币,其中就有龟货四品:子龟、侯龟、公龟、元龟,元龟值2610钱、公龟值500钱、侯龟值300钱、子龟值100钱,但目前尚未发现新莽龟货实物。由此可见,龟甲作为货币对后世的影响。

## 二、汉代白金龟币

西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困窘,其中军费开支最为庞大,同时中央政府与拥有大量财富的诸侯们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于是汉武帝听从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以“检约奸邪”“摧浮淫并兼之徒”为名进行货币改制,发行三铢钱,同时铸造“白金三品”货币,解决财政危机,弥补用度不足,并以此来削弱诸侯实力,强化中央集权。汉代发行的“白金三品”中就有一种椭圆形龟币。

“白金三品”始铸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事在《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均有记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根据史籍记载,“白金三品”是以银锡铸造的铸有龙、马、龟纹样的三种货币的总称。这三种货币形态各异,龙币为圆形,重141克,径55.2毫米,高13.5毫米。其正面凸起,纹饰为一长嘴、独角、长脖的腾云驾雾之飞龙。背面内凹,周沿有一圈铭文,铭文译读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中间有两个方形戳记,戳记铭文为“少”字。马币形状约为正方形,重20克左右,边长30毫米左右,厚2毫米左右。正面是一马纹图案,这四马挺胸昂首,三蹄着地,一蹄抬起,神采奕奕、气势昂然。钱背略凹,有一个5×5毫米的方形戳记,戳记铭文为“少”字。龟币为椭圆形,重12克,正面纹饰为鳞甲状,上有一个方形戳记,其铭文为“少”字,背面平,有似篆字样图形。这三品钱上都有方形

戳记,铭文为“少”字,一般认为“少”为“少府”之意,标明这类钱币是由西汉王朝掌管皇室财政、铸钱的机构“少府”统一铸造的,正好印证了《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史书所记载“少府”造“白金三品”的史事。

现今发现的“白金三品”货币(包括龟币)多为铅质或陶质,而根据史书记载“白金三品”是以银锡铸造的,因此长期以来钱币收藏界对西汉铸造发行的“白金三品”货币材质主要成分问题存在争议。《收藏界》2013年第4期有文章披露,近年陕西西安市北郊已改道干涸的渭河古渡桥下出土一枚龟纹银币,呈椭圆形,下端有浇注遗痕,长40毫米,宽21毫米,厚处3.1毫米,重10克(图1)。银币正面呈圆弧状,中间较厚,边缘薄,表面有蜂窝状龟纹,并有一“少”字印记。银币背面有两个篆字,钱币学家、古文字学家黄锡全先生曾撰文释读为“垂光”,并论证“垂光”为:光辉普照,恩泽人间之意。西安龟形银币的发现,可称得上是钱币界的重大发现,使西汉“白金三品”千年之谜,及多年的西汉“白金三品”币材之争尘埃落定。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史书记载“白金三品”是以银锡铸造的,因此“白金三品”银质龟币是当时真正的“白金三品”龟币,出土或民间发现的铅质、陶质的“白金三品”龟币都只不过是仿造的殉葬品或当时民间的仿制品。



图1 龟形银币正(背)面

### 三、长寿的象征

中国古代,龟被看作祥瑞之物,它跟龙、凤、麟三者并称“四灵”或“四神”。《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凤龙龟,谓之四灵”。宋代《十三经注疏》也载:“象物,有象在天……麟、凤、龙、龟谓之四灵。”在所

谓的“四灵”之中,龙、凤、麟都非现实存在的神话动物,而龟却是其中唯一现实存在的爬行动物,它性耐饥渴,是长寿的动物,自然环境中超过百年寿命的,被认为是介虫之长。龟的寿命长,一种生活在赤道地区岛屿上的象龟,可以活三四百年。所以古代的人认为龟的活动空间大,阅历长,是长寿的象征。《洪范·五行》曰:“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者也。”《淮南子》说:“龟之千岁。”《论衡》云:“龟三百岁大如钱,游华叶上,三千岁则青边有距。”任昉《述异记》:“龟一千年生毛,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都盛赞乌龟为长寿之物。

龟为什么会长寿?其奥妙在于龟的颈。龟伸颈可以吞气,可以延生,缩颈于壳,可以避险。乌龟缩在坚硬的甲壳里不动,很少吃东西。乌龟的肺可贮大量的空气,呼吸缓慢,因而体能消耗极少。中国人素来注重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如《养生论》《养生主》《养性延命录》等古书,都是延生益寿的理论秘方。中国道家在学习乌龟方面是最成功的。道家以乌龟为典范,提出了“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的养身理论。一般动物都靠饮食维持生命,而龟则不吃不喝,靠调气也可以生存。道家发现乌龟这些习性后就创造了独特的养生法。故道家养生,讲求“气”,认为“气”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也是生命之源。道家气功,即有龟息之法。“龟息”,就是说练气功时,要象乌龟那样缓缓地呼气。《云笈七签》五八云:“精气充溢,不饥不渴,龟龙胎息,绵绵长存。”《抱朴子·对俗》云:“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所谓“龟息”“龟鹤导引”都是指仿效乌龟行气的。道家的辟谷功也是模仿龟行事的,并有一专门术语“龟肠”。所谓“龟肠”,是说人们的肚肠要尽量像乌龟那么空着,这样才能长寿。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乌龟来象征长寿。古代民俗钱币上经常出现刻铸有“龟”字祝颂长寿的吉祥文字,如“龟鹤齐寿”(图2)“龟龄鹤寿”(图3)“鹤算龟龄”“龟鹤遐龄”等,取其吉祥顺利之口彩,来表达长寿青春永驻的祝福以及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龟形图案也成为历代民俗钱币上经常出现的象征长寿的传统吉祥纹饰。存世有一种民俗钱币,正面为“龟鹤齐寿”四汉字,背面穿上有一只展翅高飞的仙鹤,穿下有一只缓慢攀爬的乌龟图案,以长生不老的龟鹤图案来表达长寿的祝福(图4)。还有一种“长命富贵”背龟鹤图案花钱(图5),可能铸于明清时期,正面为“长命富贵”四字,楷书对读,其中“富”字最上方的一点确失,取“富贵不到头”之寓意;背面穿上下分别铸有乌龟和仙鹤的图案,穿左右还



有北斗七星、太阳等图案,表达健康长命的祝福。



图2 “龟鹤齐寿”吉语钱



图3 “龟龄鹤寿”钱



图4 “龟鹤齐寿”钱(背)



图5 “长命富贵”背龟鹤钱正(背)面

#### 四、玄武崇拜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四种灵兽,即所谓“四象”,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圣兽。作为传统文化中“四象”之一的“玄武”,亦称玄冥,其外貌形态奇特,为龟和蛇合体的形象(图6)。从先秦时代开始玄武就是代表北方七宿的神兽。《经稗》:“斗牛女虚危室璧七宿有龟蛇体,故曰玄武。”《左传》:“玄武在北方也。龟、蛇二虫共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虚危之星也。”玄武后逐渐成为道教所奉祀的水神、北方之神,成为长生不老的象征,称为“玄天上帝”。到了宋代,为了避赵宋皇帝祖先的名讳,玄武改名“真武”,宋代帝王还多次赐予封号。因此

玄武在宋代身价倍增,并被人格化,成为地位显赫、掌管人间善恶生死、司察神仙功过的大神,被尊奉为“真武大帝”。至元代又被晋升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时地位更加显赫。



图6 玄武石像

至于为何将龟蛇合体称之为玄武,并视之为神奇灵物呢?古人把北方七个星宿想象为龟蛇相缠的形象,称为“玄武”。《礼记·曲礼》中有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唐孔颖达疏:“玄武,龟也。”《楚辞·远游》:“时暖(日逮)其曛莽兮,召玄武而奔属。”宋洪兴祖补注:“玄武谓之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汉代蔡邕曰:“北方玄武,介虫之长”。《后汉书·王梁传》中说:“玄武水神之名”,李贤为此又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有关真武大帝的传说中,又皆称龟蛇乃六天魔王以坎离二气所化,然被真武神力蹶于足下,成为其部将。后世称之为龟蛇二将。

古代人们认为,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四灵),具有安定四方、避邪除秽及驱逐魑魅的功能。因而,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常以“四象”(四灵)的图案作为纹



图7 玄武瓦当



饰。如汉代制作的瓦当上极为流行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种动物的图形作为纹饰,被称之为“四灵纹”(图7)。尤其在民间对其的运用更是广泛,主要表现在家用器皿,如:铜镜、漆器等各种工艺品,以及石刻和建筑砖瓦的装饰上。其中,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古代钱币上也常常可以找到玄武崇拜的痕迹。

存世有一种“五行大布”背玄武图案花钱(图8),正面为“五行大布”四汉字,玉箸篆字体,钱文对读;背面穿上铸有一条呈盘旋状的蛇,穿下为一只乌龟,左铸北斗七星,右铸一柄利剑图案。“五行大布”钱铸造于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以一当十,与布泉、五铢钱并行流通,其钱文及制作均极为精美,为著名的“北周三品”之一。还见有“大泉五十”“大泉当千”“永通万国”“常平五铢”“唐国通宝”背玄武北斗七星钱。



图8 “五行大布”龟蛇七星剑钱正(背)面

图9为一枚明清时期的吉语花钱,直径51毫米,厚3.4毫米,重48.1克,青铜材质。正面铸“富贵长寿”四个变体篆书文字,也有人认为穿上下是道教符文。背面穿上是北斗七星图案,穿下是龟蛇合体玄武形象。钱币上铸有道家所尊崇的司命之神—玄武大帝图案,强烈表达了祈望玄武大帝保佑长命富贵的愿望。



图9 “富贵长寿”背玄武北斗七星钱正(背)面

还有一种圆形圆孔的玄武大帝民俗钱币(图10),也是清代铸造,一面为道教符文:“太上咒曰,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神到处,万鬼灭亡。急急如律令,敕”,两旁各有一道符篆;一面穿右为玄武大帝手执宝剑、脚踏龟蛇,立于海水之上的图案,穿左有道教符篆图案、穿上为太极八卦图。同样表达了对玄武大帝的信仰和崇拜,祈求降邪祈福的愿望和追求。



图10 “玄武大帝”背太上咒花钱正(背)面

“真武大帝”在元代又被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故也称为“元天上帝”、“玄天上帝”或“北极玄天上帝”。存世有“元天上帝”花钱(图11),是广东潮汕地区特有的民俗钱币,所见有大样和小样之分,主要版别有背八卦、光背者,亦有背八卦并文字者,还有合背钱,是广东潮汕地区玄武信仰崇拜盛行的实物见证。



图11 “元天上帝”花钱正(背)面

## 五、龟形银锭

中国铸造银锭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根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记载,民国11年(1922年),山东青州府东门外曾出土1件汉朝银锭,上刻有“中元(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二年,考工所造”八个阴文文字,重403克,可惜实物已流往日本。银锭形制在汉代虽已出现,但当时其用途仅限于皇帝赏赐或官府库存贮藏,并不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及至唐宋,白

银渐渐被广泛地用于交易或缴税,且宋人喜窖藏银锭,视为财富。直至明清,实行大额用银、小额用钱货币制度,银锭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普遍流通使用。不但商业买卖汇兑用银,且政府税收、支出、发薪等,均指定用银。后来满清政府更干脆规定国家货币以银为本位。银两之风行,直到民国22年(1933年)废两改元为止,在一千多年时间内,银锭一直是人们物质生活中不可少的东西,赏赐、赋税、买卖等都少不了它。

银锭是一种秤量货币,并没有面值,它的价值随其重量和成色高低而定。一般以两为单位(一两约为36克),故俗称“银两”。至于银锭的重量,则视乎需要而定,并无准则,大至可分为大、中、小锭,大锭一般是五十两左右,中锭十两,小锭则一两至五两不等。一两以下,概称为碎银。历代对银锭的铸造及发行都没有统一的严格规定,允许自由铸造。只要适应当时的流通环境和民间习俗,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银锭造形无统一规定,导致银锭造型繁多,因朝代与地域而异。特别是从清代开始,银锭的器形更加多样,各省各地各有千秋。清代银锭最普遍的形状是船形,即通常所称的马蹄锭或元宝形。但许多省份却有各自的独特造型,如四川的圆碗锭、江西的方宝、云南的牌坊锭和广东广西的砵码锭等等。

清代湖南省通行的五十两银锭,形状也很有特色,圆首弧底,双翅较低且外翘,锭面光洁,腹及底部呈椭圆形,看上去极似龟甲,将其倒置,活像一只乌龟,所以人们称之为“湖南龟宝”。锭面一般砸有四个戳记,内容为地名、纪年、银号或银匠名之类。咸

丰、同治、光绪等纪年均发现有发现,铸地遍及湖南30多县,是湖南各地官府的上解银锭。“湖南龟宝”是湖南特有的银锭,和“江西方宝”银锭齐名,存世量稀少,较为罕见。图12就是一枚清代湖南龟宝五十两银锭,重量1854.9克,锭面宽阔,丝纹清晰,面钤盖“湖南省”“光绪十八年”“光绪十八年”“傅聚顺”四个戳记,背部呈椭圆形,底部分布许多蜂窝状的气孔,自然且泛淡金色的光泽,品相绝佳,状态完美。龟宝上的地名戳记大多为湖南省内的州县名,直接钤盖“湖南省”字样戳记的非常罕见。此银锭为北京诚轩2008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品,估价人民币65000~95000元,经过激烈竞拍,最后以123200元人民币成交。■



图12 “湖南龟宝”五十两银锭

(本文附图来自网络,特此向作者及收藏者致谢!)

(上接第41页)

8276-8277.

[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2.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上册)[M].中华书局,1964:651-652.

[1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上册)[M].中华书局,1964:873.

[11] 沧江.各省滥铸铜元小史[J].国风报,1910(5).

[12]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3):389-494.

[13] 财政部钱币司.币制汇编第4册[M].1919:174.

[14]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财政科学出

版社,1982:2.

[15] (美)耿爱德(E.Kann).中国货币论[M].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29:390.

[16] 沧江.各省滥铸铜元小史[J].国风报,1910(5).

[17]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5:375.

[18]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3):389-494.

[1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9-272.

[20] 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财政科学出版社,1982:10.



# 从底纹看纸币

■ 郑悦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

纸币从印刷上可分为凹、凸、平三大方式,面额、图案、机构组织等纸币要素,从主次关系上可分为主图、边饰和底纹。一般而言,人们注意的是凹版手工雕刻,如人像、风景、建筑等,或者观赏精密的机刻花纹,以及醒目突出的防伪标识,如水印、全息烫印标志、全息条带、光彩光变图文等,而甘当绿叶的底纹则往往被忽视。实质上纸币底纹发挥着重要的装饰作用,其纹路的复杂、多变与防伪正相关。尤其现代纸币根据应用技术不同,可以分为色彩套印英法式、边框加底纹的美元式和多色接线印刷的中俄式几个大类。目前,法国式(图1)的凸印底纹纸币随着欧元使用目前已经消失,其他几大类纸币的底纹也不再固守原本的技术,统统实现了壁垒打通,达到防伪、美观的完美统一。

## 一、纸币底纹及其作用

大部分人会关注纸币上的墨色浓重区域,对点状组成线条的主景抑或是网状边框花纹、团花感兴趣。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纸币除票面上的主景和面额文字以外,起到陪衬效果,用来衬托主图和面值、暗花或文字,采用胶印或凸印工艺的色调较为清淡的复杂纹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纹。

我国古纸币,没有现代货币意义上的底纹,只用边框装饰,采用连续花卉、龙纹图案,如元、明宝钞,清代户部官票等。这种形式影响到了后来的本土货币的设计。民国时期有很多地方性货币,采用传统竖式纸币,分别在边框内印有文字,例如《三字经》《前赤壁赋》《千字文》《大学》等传统文化启蒙读物,并印有人物绘画,等传统吉祥纹样,如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印有《大学》(图2)文句。自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西方纸币样式传入我国,如中国首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纸币,就采用凹版边框、主景,配以胶印底纹的纸币设计形式。而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政权货币也多采用单一颜色边框配以色彩丰富的底纹的设计方式,使用了镰刀锤子等红色政权符号。同时,底纹的色彩往往淡雅,并不给人以混杂感,反而能与主图、边框、面额文字数字和谐的统一

起来。如果底纹不精致就会造成混乱、拙劣的感觉,如罗马尼亚1966版纸币(图3)。



图1 印有孟德斯鸠 图2 印有《大学》的吉林永衡  
的法国200法郎 官银钱号



图3 罗马尼亚1966版纸币

由于纸币上的主图和面额、背书机构才是其重要的核心内容,是供人们识别、判断和熟悉纸币面额和版别的主要标志。因此,专家在设计纸币时,会千方百计地把纸币上的主图和面额设计得清晰、醒目,具有艺术性的同时兼顾直观效果,而巧妙、新颖、复杂的底纹服务于衬托和突出主图作用。那么没有底纹可不可以呢?实际上外国早期纸币也不使用底纹,只有边框、面额。很晚才出现了以美国伯金斯基为代表的大面积凹印印钞法,实现凹印人物、风景图案纸币,后来逐步演化出以美国钞票公司为代表的凹印边框、胶印底纹的纸币。反观,著名的“白英镑”(图4),即使用简单的文字印刷在水印纸表面,惨白的纸、简单的面额、行名,效果上真是属于极简主义。这种不重视底纹防伪,英国为此付出惨重代



价。时间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除了大开杀戒,还开动了金融货币大战,以国家力量调用专业印钞设备、印钞人才,疯狂伪造白英镑,并投放出去,给英国货币金融造成大混乱。可见采用色彩丰富、线条复杂的底纹,不仅提高了纸币本身的美观和艺术欣赏价值,也使得纸币的防伪效果大大提高。



图4 英格兰银行发行的1938年版英镑

底纹的存在弥补了主图单一效果,所以也由单纯装饰开始肩负起了防伪功能。底纹曾是原始的重要装饰手段之一。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诸多先进的防伪措施的运用,底纹结构越来越复杂,实现了由网状团花,到防复印底纹,由简单套色到,单线、接线套印、多色套印、白色油墨层叠等混合使用的技术演进。让普通的伪造或者更高仿的技术都无法完全伪造现代纸币的底纹色彩、网纹结构。

## 二、纸币底纹的样式举例

纸币底纹多复杂图形。这类图形结构复杂,线条交织精巧,为网纹组织的结构,以平铺、放射性、积聚性、区块式展现图案。大概有民族纹饰、花卉纹饰、卷草纹样、浮水线字样、团花符、组索网纹、防复印底纹等。同时,也有与大面积网纹交织线条的纹样配合的组合式底纹。多色套印底纹的运用使得纸币的美观度大为提高(图5至图7)。随着纸币印制



图5 伊拉克老版第纳尔装饰底纹

技术和防伪水平的不断发展,出现由各种防复印同心圆细线、色块组合,或者大面积色彩组合、精细变化的图案底纹(图8)。



图6 老版英镑底纹装饰



图7 奥地利先令上的套色网状底纹



图8 瑞士现行50法郎多变纹样底纹

## 三、人民币底纹特点

目前,我国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这些纸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设计者的心血,凸显了红色基因的传承,人民币底纹也有着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民族纹饰,具有欣赏价值。

第一套人民币因诞生于全国解放前夕,印制条件和纸张都较差,防伪手段也相应落后,尤其受到民国时期纸币设计结构的影响。底纹以网纹、交织线网纹、简单几何图案网纹为主要使用手段,同时在面额数字下使用套色团花,由于采用边框式设计,在边框外为白边不设置底纹。第二套人民币开始至第三套人民币,在底纹设计上均采用团花、几何图形网纹、等形式。尤其第三套人民币在印刷上采用色彩组合方式,最突出的就是底纹采用了多色接线工艺,加之与凹版接色技术的配合,使中国印钞技术获得非常大的提升,该套人民币样式整齐、色彩瑰丽、简洁大方(图9),令人爱不释手,是不少人心目中具有艺术典范效果的一套纸币。从第四套人民币开始,



图9 背绿一角的交织线式淡雅底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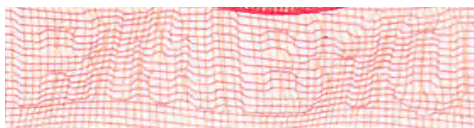


图11 1999年版壹佰圆人民币使用的底纹



图10 多色接线底纹与凹印配合



图12 2019年版伍拾圆人民币的精细接色底纹

底纹又有一些变化:陪衬主图和面额的底纹均采用各种民族纹饰或富有中华民族传统风格的吉祥图案,如拾元的“凤凰牡丹”、伍元的“仙鹤松树”、贰圆的“绶鸟翠竹”、壹元的“燕子桃花”等等。另外底纹分布亦有变化,除50元和100元券正背面均为满版底纹外,其他1角至10元券正面为满版底纹,而背面边框外为无底纹的白边,更增强了整体票券的综合防伪性和艺术观赏效果。如1990版的人民币五十元背面左侧,中国青铜器饕餮纹样就是配合黑色暗

花凹印使用的,把青铜器的青铜质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图10)。第五套人民币继续采用四版人民币底纹留白的模式,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出更为复杂的纸币底纹,设置了微缩文字底纹、套色、网状底纹等,如增加了浮水线底纹(图11),这种底纹有一定的图文隐藏效果,特定角度会显示出面额数字和面额汉语拼音字样;2019年版纸币底纹精细程度和色块组合水平更高(图12),人民币底纹的防伪性能和美学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增强。■

(上接第10页)纳珍、招财、利市五神为五路财神,此说出自《封神榜》。其中,中路为武财神赵公明,东路财神招宝天尊萧升、西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南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北路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

“五路财神图”中的文字为:

“光绪乙巳夏月,师新泰法为义元主人雅属,梅子山民写。”

光绪乙巳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说,该钱票背面石印版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泰法”指当时新发展起来的西方石印技术。梅子山是汉阳名山,虽然海拔不高,却是当年风光秀美的旅游胜地。因此,该图案的绘制者梅子山民,可能是汉阳人。

义元钱庄的地址,小关帝庙,如今已不存在。当时,小关帝庙位于汉口熊家巷、张美之巷之间以及正街(又称官街,后称汉正街)以北地区。

又据宣统三年(1911年)《最近汉口工商业一览》中的记载,义元钱庄地址在,汉口花楼街。花楼街今在,位于汉口江汉区中山大道中段南侧,东起江

汉路,中段穿民生路、民权路,西衔二盛村。清末成街,正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前后。是时,汉口市场下移,商业畸形发展,此地近邻租界区,富商名绅蜂拥于此,建房置产。数年之间,店铺林立,楼房栉比;皆砖木结构,雕梁画栋;门堂廊柱,多饰以花鸟鱼虫雕花图案,人称花楼,花楼街故此得名(今江汉路至民生路一段)。与此同时,形成的黄陂街下段,当时也有花楼之称;故自民国以后,今黄陂街下段,称前花楼,而此街称后花楼街。

此处是汉口商业繁华之地,钱庄、当铺、金银首饰、京广杂货、五金绸布、酒楼戏院等无所不有。终日熙熙攘攘,灯红酒绿,直至解放前夕,熙攘之状不减。

义元钱庄设于此地,不无原因。

综上所述,利生厚记钱号、衡康钱号和义元钱庄等三张清代钱庄票,不仅为湖北民间钱票增添了新的品种,也成为湖北清代钱庄纸币的典型代表,而且还是清代汉口高度发达印刷业其印刷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因而值得收藏与鉴赏。■